

人物

人物春秋

65 罗瑞卿在抗大(下)/ 陈宇

百岁黄埔老人

71 百岁黄埔同学张鸿茂 / 吴龙龙

黄埔人生

74 非常之人

——记兰州市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组长王进华 / 张遵道

我的黄埔前辈

80 血战黄河大铁桥

——纪念外公詹化球诞辰 119 周年 / 邹霄勇

历史

黄埔家书

84 耄耋老人的一封家书 / 葛辉

黄埔收藏

86 中央军委致燕京大学实寄封 / 单补生

黄埔日历

93 1926 年 3 月 25 日, 陈铭枢、白崇禧作为广州国民政府代表
抵达长沙, 与唐生智举行会谈 / 贾晓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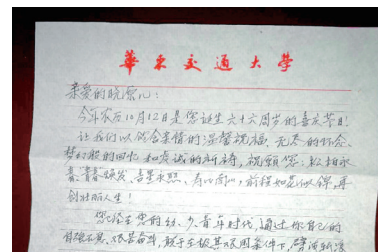
双月刊 单月 1 日出版
2020 年 第 5 期 总第 194 期



2 世纪跌宕人生 别样黄埔风景



71 百岁黄埔同学张鸿茂



84 耄耋老人的一封家书

扫码下载
《黄埔》杂志 APP



Android



ios

世纪跌宕人生 别样黄埔风景

——贵州百岁黄埔同学风采录

□ 杨震环

百年人生,本就是一段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画卷,当添上黄埔、抗战的色彩,自然成了一幅弥足珍贵的别样风景。在贵州,年逾百岁的黄埔同学有整整10位,年纪最长的106岁。他们分别是14期到18期同学,均亲历了抗战。为记录这一特殊群体的抗战岁月和人生故事,留下他们的别样风景,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特别推出“贵州百岁黄埔同学风采录”。

贵州是一块与黄埔有着深厚渊源的南国热土:黄埔军校在大陆建校25年间,数以千计的黔中儿女走进黄埔军校摇篮,如“黄埔军校牺牲第一人”蔡光举、红军杰出将领周逸群、开国上将杨至成、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抗战全面爆发,大量政府机构、军校等内迁黔地,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在贵州三都、独山、湄潭等地办学达7年之久,都匀炮兵学校、麻江通讯兵学校、龙里辎重兵学校、贵阳防空学校等为黄埔代训青年学生,贵州高原倾力接纳并培养出了大批黄埔军人。改革开放后,约1300名黄埔同学先后加入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继续发挥余热,投身到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和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列中……

今年以来,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机关同志分别赴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毕节、黔东南6个市州,采访拍摄10位百岁黄埔同学,用文字、图片记录他们的百岁人生。同时,刚果(金)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热心人士积极参与,倾情加入到慰问看望百岁黄埔同学的行动中。

贵州百岁黄埔同学,是怎样一群人呢?我们试图寻找答案:黄埔学堂里,犹记得铜鼓井的四分校军歌声,忘不了炮校代训的贵州高原情,经历着黄埔生到军校教官的华丽蜕变,还有那些专注认识通讯器材、认真学习步兵操典的年轻目光;抗战疆场上,白山黑水出走乡关,南国热土阻击倭寇,九江无畏护弹药,浴血金华保卫战,鏖战石牌“国门”,亲历“立马九岭”,或远赴印缅异域扬威,或走出国门越南受降;新中国建设中,参与家乡建设,投身社会工作,联络同学情谊,促进黔台交流,感恩时代社会,乐享晚年生活……我们发现,除了记录和关注,答案本就无需找寻。

我们谨以图片和文字,记录10位百岁黄埔老人的非凡人生,讲述他们风雨百年的人生故事,追忆那段抗战峥嵘岁月,铭记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久弥新的黄埔精神!





战时军中“顺风耳” 晚年续写黄埔情

——访十四期同学郭学圣

□ 华廷凯



郭学圣，又名郭经华，男，1916年农历四月初八生，黑龙江哈尔滨人，黄埔军校14期通信兵科毕业。抗战期间，作为通信技术人员奔赴浙江、湖南、广西等抗日前线，亲历第二次长沙会战。历任通信兵排长、连长。在西南游击干部培训班、贵州独山黄埔军校四分校任通信教官。长期在部队从事招募和训练新兵、通讯和教学工作。1949年，在兴仁随贵州西南绥靖公署司令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安顺市多个部门工作。现为民革党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安顺市黄埔联络组负责人。

享有军中“顺风耳”之誉的通信兵，是首长的耳目，军队的神经。如今，生活在安顺市已104岁的黄埔老人郭学圣，当年立志报考黄埔军校步兵科，却考入黄埔军校通信科，成为一名通讯兵。随后，他驰骋于长沙会战的抗日疆场，在西南游干班、四分校的课堂上讲授通讯知识。晚年，又将一腔黄埔情倾注在促进黔台交流和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中。

从学校宣传抗日到只身勇闯山海关

“当时，我正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县立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阳被日军轰炸的消息传遍整个学校，尽管学校还能照常上课，但紧张、愤怒的气氛已在校园内弥漫开。”郭学圣回忆。

1931年11月，齐齐哈尔市爆发了由马占山将军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了自九一八事件以来的“国人抗战第一枪”，抗日的烽火四处蔓延。郭学圣加入了学校的抗日救国宣传队，到学校、机关、公园等群众经常聚集的地方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日本侵略

中国的罪行。他还向身边同学传播抗战前线的新消息，并鼓励同学们加入抗战队伍，帮助部队从后方运送粮食到前线、搭建呼兰河桥等。

1936年冬，抗日救国宣传队引起了日军特务的注意，他们开始在学校大肆调查、逮捕抗日分子。郭学圣成为抓捕对象，他被迫登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开始了流亡生涯。12月11日晚，火车到达山海关站，化装成农民的郭学圣逃过了日军的严密盘查，侥幸过关，到达北京后，在北平兢存中学短暂求学。

黄埔受训 练就军中“顺风耳”

郭学圣回忆：“七七事变爆发后，经常看到天上不时有飞机飞来飞去，城外的枪声也愈发密集，北平局势越来越紧张。我就想报考军校，待学成本领就杀回老家去。”

1937年，经南京的同乡会和东北流亡学生青年救济处推荐，并得到马占山将军秘书的帮助，郭学圣报考黄埔军校。“当时入学考试很严格，因我国文（语文）、英语等科目成绩都很好，



/ 1931年，郭学圣(右)与堂兄、姐夫合影。

英语提笔就能写，所以很有信心。面试过程中，现场考核军官军服笔挺、皮靴锃亮，腰挂佩剑，神气威武，对考生要求也很严格，考试时只要坐姿不端正就会被取消考试资格。”当初报考军校的情景，郭学圣至今历历在目。

10月，经过严格的初试和复试，郭学圣考入黄埔军校14期通信兵科。通信兵所负责的任务技术性、专业性、保密性、时效性都很强，军校要求严格、训练紧张。后因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学校被迫西迁成都。郭学圣经过一年多的学习训练，掌握了过硬的通讯技术，成为一名优秀通讯生。由于战事日益紧张，加之抗战前线需要，郭学圣军校毕业后，被分到通信兵团，成为部



/ 青年郭学圣。

队的“千里眼”“顺风耳”。

两位黄埔生的战地婚姻

有一种爱情叫相濡以沫，而历经抗战烽火洗礼的爱情，更加

神圣忠贞、弥足珍贵。

1939年底，郭学圣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新兵。培训班上有一位女学员名叫汪雪芳，出生于安徽皖南书香门第，父亲惨遭日寇打伤致死。身负国仇家恨的她，15岁就参加新四军领导的抗日剧团，后加入共产党。同年考入郎溪战地服务团，次年考入军训部办的战士3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女兵。1939年底，被保送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

在“西南游干班”学习期间，汪雪芳与郭学圣相识。情窦初开的汪雪芳与帅气英武的教官郭学圣在训练过程中相互倾慕，最后坚定地走到一起。1940年11月21日，这是郭学圣铭记于心的日子。这一天，在部队军官同事的见证下，他们正式订婚，后来在抗战前线举行了朴素而又热闹的婚礼。

从1940年结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9年间，正值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容不得他们有过多儿女情长，两人聚少离多，每次相聚的时间也非常短暂。他们分离期间常牵挂着对方，担忧对方的安危。“那个年代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唯一的联系方式只有写信。可部队随着战事发展，工作地点并不固定，即使写信也不知道往哪写。我们有个默契，没有消息就是最好



/ 郭学圣(右)、汪雪芳(左)夫妇合影。



/ 郭学圣(右)与汪雪芳(左)合影。

的消息。”回顾这段经历，老人依然幸福而甜蜜。

如今，汪雪芳老人已去世好几年，郭学圣仍将两人的红绸订婚书视若珍宝。历经岁月洗礼的小小红绸订婚书，已成为这对黄埔伉俪跨越70多个年头忠贞爱情的见证。

亲历第二次长沙会战 担任军校通讯官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郭学圣在国防部直属通信兵第2团第4营13连任准尉见习官。接到部队紧急赶赴长沙执行抢运重要通信器材的命令，郭学圣立即带领一个连的战士冒着枪林弹雨渡过湘江到达长沙城，

将从德国进口的电话机、皮挂机和电台发报机整整20多箱通讯器材运往码头，水运至湘潭后再趁天黑送上火车，最终将通讯器材完好无损地转运至大后方。

战役中，郭学圣经常和战友深入前线，保障通讯畅通。据郭老回忆，当时我军的武器、通信装备都不如日军先进，但我们的作战方法灵活，敌人来了就躲进山里，然后伺机包围反击，并歼灭他们。

郭老说：“我们通信兵经常在架设电线的地方，采用技术手段窃听日军电讯。有时漆黑的夜里，就趴在地垄上，在日军眼皮底下窃听情报。根据长时间的作战经验，我们能从听声音、辨脚步来判断敌情。日军来了，我们就趴下，待日军从面前走过后再爬起来继续窃听。”

1942年，郭学圣受命再次踏入黄埔军校的大门，继续学习军事技能和通讯知识。培训结束后，回湖南衡阳归队。后考入独山黄埔军校四分校担任通信教官，其间，不仅承担军校的培训任务，还到当地的独山中学担任训导主任、体育老师和童子军教官，为当地的教育事业、体育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44年底，“黔南事变”爆发，黄埔军校四分校迁址继续办学。郭学圣随军校师生向贵阳、遵义等地撤离。

郭老回忆自己的从军生涯时说：“当年自己原本打算报考步科，不想却成了一名通讯技术军人，未能和日寇面对面交锋。但抗战过程中，我发现无论敌前还是敌后，承担的使命都是一样的，是缺一不可的。我们通信兵就像指挥官的‘眼睛’和‘耳朵’，获取的信息和发出的命令，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后来，又进军校当通讯兵教官，将自己所学贡献给抗战事业。如今回想起来，未能当上步兵有些许遗憾，但能成为一名通信兵，我倍感自豪。”

黄埔情注黔台交流

抗战胜利后，黄埔军校四分校被裁撤，郭学圣先后到遵义第4军官总队、黔西南绥靖公署司令部等任职。1949年，随部队在兴仁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学圣定居安顺，充分发挥自己专长，积极投身和服务国家建设，先后在安顺工商联、国营无线电厂、安顺地区邮政局、民革安顺市委等单位，长期从事无线电维修与管理、载波通讯和人才培养等工作。

1985年，他加入了民革，之后，又担任安顺民革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8年之久。他始终秉承黄埔军校同学会“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



/ 郭学圣的军礼照。



/ 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杨震环看望郭学圣。

帮助协调解决当地黄埔同学实际困难，积极联系在台胞弟郭学文等亲属和在台同学、同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劝说他们经常回大陆走走看看。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断加强和海内外黄埔同学的联系沟通，为团结海

内外中华儿女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促进祖国统一发挥了纽带作用。

今年，104岁的郭老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继续走在他钟爱的黄埔事业大道上。■

难忘铜鼓井的军歌声

——访四分校十七期同学杨瑞堂

□ 高林 彭文



杨瑞堂，别名杨整军，男，1920年7月出生，江苏金坛人。1939年8月，在军政部汽车第2队当文书，后到贵阳江苏同乡会工作。1940年，入黄埔军校四分校17期步科学习。1942年毕业，分配到贵州保安第6团负责新兵征训，先后任少尉、中尉分队长、上尉中队长。1943年，到镇宁、黔西等地执行任务。抗战胜利后，在江苏金坛县警察局工作。1947年，回贵州平越县（今福泉县）任自卫总队少校总队副。1952年，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第3期学习，后在荔波等地参加土改工作。1953年，任平塘县粮食局保管员。1954年，带职学习改造。1957年，在都匀钢铁厂工作。1975年，到贵阳市五交化公司工作直至退休。

2015年，杨瑞堂首次向我们提供了他亲手誊写的《黄埔军校在铜鼓井》的歌词，后来歌词收录在《黄埔军校分校概览》中。5年后，杨瑞堂为我们现场哼唱了这首上世纪40年代四分校在贵州独山办学时的军校歌曲。显然，这首军歌已深深镌刻在老人的记忆深处。在杨老低沉的曲调里，隐隐浮现出当年四分校师生刻苦学习操练的办学场景，默默诉说着他流亡他乡、报国图存的沧桑岁月。

流亡途中 遭遇长沙大火

1920年农历七月初九，杨瑞堂出生在江苏金坛县。当时家境不好，但还能勉强供他读私塾。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7岁的杨瑞堂开始了一路向西的逃难生活。“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不愿当顺民，就和我二姐开始流亡生涯，一路上见到的都是逃难的人。到达高淳县时，头天都还很平静，第二天早上情况就变了，当地的汉奸把日本太阳旗悬挂起来。我们见情况不对就赶紧往安徽芜湖走。我们到芜湖时是下午三四

点钟，日本飞机轰炸后刚刚离开，市区里很多人被炸死了，有的尸体还挂在电线杆上，惨不忍睹。一天晚上，听说有船到汉口，我们就来到江边乘船（那时都是海轮）。因听说船只到安庆，有些人不愿意坐。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只要朝西方向开的船，我们都坐。由于上船的人太多，有3个人还被挤落江中。旁边的人赶紧用铁索救助，但海轮甲板离江面太高，救到中途又掉下去，最后仅救上来一人。船到达安庆后，不久又继续航行。大约11月份，终于到达汉口，我们随即住进了难民收容所，虽然生活艰苦，但还是勉强能解决温饱。日本飞机三天两头就来轰炸一回。大约一个星期后，日本飞机在汉口的空袭越来越频繁，我们又不得不坐火车继续向长沙流亡，后来在长沙市罗新田的红十字会难民收容所住了一年多。当时在难民收容所里，生活还比较平静，时不时有华侨捐献的西装等物资救济。一天，难民救济处凤凰教养院院长黄湘到教养院来喊我填写简历，看到我字写得较好，就安排我到教养院去。于是，我坐

船经沅陵、溆浦去凤凰，二姐继续住在长沙。途经溆浦时，我还观看了抗日剧目演出。第二天继续坐船到凤凰。半年后，黄湘院长调走，我失去了工作，又回到长沙，继续和二姐住在岳麓山锦江河边。”回忆这段经历的过程中，杨老几乎没喝一口水，看得出，那段一路向西的艰难流亡生涯，让他至今无法释怀。

1938年11月的一天，杨瑞堂到难民救济处领东西，有人告知日本人要进攻长沙，长沙马上就要放火烧城，赶快拿东西离开。于是，他连忙来到江边，没有空船，就见有些人跳入水中扒在满载的船边，得以冒险过江。杨瑞堂和很多无法过江的人一起等到第二天天亮还没等到船，不得已只能顺江边往下游走，好不容易等来一条船终于过了江，晚上，幸运地和二姐会合。回头往长沙方向看时，长沙城上空已是火光冲天，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轰轰”的爆炸声。当时的杨瑞堂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心里除了担心害怕，更多的就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当时为阻止日本人进攻，蒋介石下令在长沙实施的焦土政策。

别无他法，杨瑞堂只得继续流亡，先后到过湖南芷江、怀化等地。在怀化一个叫榆树湾的地方，杨瑞堂加入了三民主



/ 青年杨瑞堂。

义青年团，从事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可是好景不长，当地土匪闹得厉害，虽有宪兵（当时宪兵司令是谷正伦）保护，但力量不足，时常遭到土匪骚扰。一次，一位宪兵排长还被土匪剥皮示众，他们的活动没法继续进行。1939年8月，杨瑞堂到达贵州贵阳，流亡生涯终于告一段落。

铜鼓井旁难忘军校歌声

在贵阳期间，遇到军政部汽车第2大队驻贵阳扎佐，恰好有江苏老乡在那里工作，经介绍，杨瑞堂被安排当板筋学徒，后又当文书。不久，广西战事吃紧，汽车第2大队到广西执行抢运任务，杨瑞堂一行4人驾车前往。驾驶员因刚学驾驶不久技术不好，结果途中翻车，当场死

亡，杨瑞堂也受了伤。伤愈后，杨瑞堂又到贵阳江苏同乡会从事职业介绍工作，主要为在贵阳的江苏同乡服务。不久，四分校教育长张振镛到贵阳，经同乡会推荐，杨瑞堂一行7人报考四分校。1940年，杨瑞堂在贵阳市电台街的大坝子参加入学考试，并如愿考入四分校17期24总队步科。

不久，20岁的杨瑞堂到军校报道。由于军校于1939年底才陆续迁到贵州，配套设施不完善。报到学生只得暂住旅馆，军校开学后又借住当地百姓家中。接下来的3个月，军校组织师生自己筑土墙，到独山城外的山上伐木，再锯成木板当屋顶，终于建成了队部讲堂和宿舍。同时，24总队还花了一整天时间修通了从军校到县城的连接路，命名为黄埔路（该路一直保存至今）。“尽管学校条件艰苦，但随后就开展紧张的学习训练。课堂响起了读书声，操场上到处是紧张训练的身影，机械、体操、铁杠、木马、劈刺等科目，一样都不能少。同时，军校教官还着重教授我们到野外山上进行实战训练，挖散兵坑、交通壕等。”说到这里，杨老拿出笔，一边回顾当时教官讲解的情景，一边画阵形图。“此外，还有野外测量、绘图、夜晚行军和夜间教育等内容，训练要求严格，自己的收获也非常大。当时，四分校17期共



/ 杨瑞堂的军礼照。



/ 杨瑞堂在写信。

招收5个总队，校部驻铜鼓井。23总队驻独山县基长镇。24总队驻扎在独山县城飞机场的北边，离校部二三公里的地方。26总队驻飞机场南边。26总队是华侨总队，当时，招收侨生是四分校的一大特色，许多海外有志青年回国受训，四分校先成立华侨大队，后奉命扩充入伍生团，并改为17期26总队。此外，5、8总队驻三都县大河一带，比我们提前半年毕业。”

杨老说：“抗战时期的四分校地处大山深处，物资缺乏，加上战事吃紧，生活异常艰苦，军校经常组织学生步行到周边荔波、三都、平塘等县运粮。没有运粮工具，大家就脱下裤子当米袋，装好米后两头打上结扛在脖子上。有时，往返一趟就要两三天。学习期间，白崇禧等军政要员到过军校视察讲话。毕业前夕，我们23、24、26总队在独山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毕业演习。”

在四分校，除了艰苦的生活、紧张有序的学习训练，军校师生也开展一些文娱活动，组织演唱戏曲和军歌，为贵州高原深处的军校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杨老印象最为深刻是黄埔军校的校歌和那首由政治部主任余拯创作的《黄埔军校在铜鼓》。

筑城贵阳 乐享幸福晚年

1943年，杨瑞堂军校毕业分配到贵州保安第6团（时驻黄平县旧州），为抗日前线训练新兵。后随部队到镇宁、清镇、黔西、遵义等地，曾驻清镇鸭池河负责“黔南事变”后的疏散工作。杨老回忆道：“1945年，听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们正好在鸭池河执行任务。大家奔走相告，并召开联欢会庆祝，我还受邀到师范学校讲话。”抗战胜利后，杨瑞堂在江苏金坛县警察局工作，后又回到贵州平越县（今贵州福泉市）任自卫队少校总队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瑞堂进入革大第3期学习，后任土改工作组组长在荔波等地参加土改工作。再后来，他先后到平塘县粮食局、都匀钢铁厂、福泉磷肥厂、贵阳市五交化公司工作。1985年，65岁的杨老正式退休定居贵阳。

如今，杨老四世同堂，在家颐养天年，偶尔外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我们离开杨老家时，他特别嘱咐：“上次记录的《黄埔军校在铜鼓》有几句重复，请记得把它改过来。虽然谱子我记不清楚了，但大概旋律我还记得，记下来，也算是对四分校在贵州办学期间的一点记录。”笔者一句句做好记录并念给他听，深信这应该是纪念四分校贵



/ 杨瑞堂在翻看相册。



/ 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机关干部看望杨瑞堂(中)。

州办学时期那段艰苦岁月的一份珍贵礼物。

临别时，回头再次凝视这位两鬓斑白却身板挺直的百岁老人，耳旁又想起他低沉而有力的军歌声：

黄埔，黄埔，黄埔军校在铜鼓。

铜鼓惊醒了中华民族的灵

魂，

铜鼓敲碎了日本军阀的心灵。

收回了黄埔，收回了黄埔。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平等与自由，

恢复了中华民族的锦绣河山与版图。

戎装虽卸心犹在 一入黄埔一生情

——访炮校代训十六期同学李文华

□ 杨晓海



李文华，原名李中仁，1914年12月25日出生，现年106岁。1935年，考入南京炮兵学校受训，后被保送到炮校下级干部训练班学习。1938年至1940年为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20总队学生。曾任炮10团上尉连长、突击总队炮兵连长、第8军少校副营长等职。曾赴卢沟桥配属29路军执行任务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贵阳。2015年，获得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6月30日，笔者见到了今年106岁的李文华。老人视力尚好，思路清晰，精神矍铄。跟随他的回忆，我仿佛坐上了时光穿梭机，走入他刚毅果敢、豁达淡然的百年人生。

男儿立志出乡关

“1935年2月，南京炮兵学校到山东泰安招生。那年我上高三，听到招生消息后，我心里就一个想法——我要报名参军。”李老坚定地说。

李文华出生在泰山脚下泰安县城郊凤台村，兄弟姐妹四人，他在家排行老大。父亲李培伦为兖州邮政局职员。李文华在兖州上学，直到高小毕业转回老家泰安萃英中学（现泰安一中）读高中。在泰安萃英中学就读期间，听闻日本人在济南制造的五三惨案和屠杀中国军民的罪行。从那时起，李文华就萌生了报名参军的想法。后来，李文华顺利进入南京炮兵学校，开始学习通讯，后调整为瞄准手。

李老回忆道：“炮校的训练特别严格，每天一操二课，晚上补习普通科学。周六上午擦洗

武器，下午整理内务，周日上午测试单杠木马等。两年时间里，学习了普通学科包括微积分、三角几何等科目，术科课程包括炮兵操典、步兵操典、射击、观测、通讯、兵器等。最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了炮10团的一名炮兵。”至此，李老进入了被誉为中国炮兵中天之骄子的炮10团，开始了他14年的军旅生涯。

抗战一线建功勋

李老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20总队学生，还得从抗战爆发开始说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重炮10团分赴抗日各战场。“抗战期间，日军对炮兵重炮部队日夜不停地侦查轰炸，我们炮10团实际上有时是分割成营，再分成连、排作战，采取打一炮换一个地方的办法，避开日军的轰炸。”李老说。李文华当时担任炮10团2营4连炮长，随部队从南京到邢台，从邢台到卢沟桥。在卢沟桥时，还配属29路军执行任务。就这样，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后来又从卢沟桥到苏州……



/ 青年时期的李文华。

最后到达江西九江要塞驻防。

1938年，日军集结在九江地区的湖口地带。此时，日军距离民国政府临时驻地武汉仅一步之遥，日军只要拿下九江就可以逆流而上，直达武汉城下。中国军队跟日军在九江战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这场战斗中，李文华随部队从武昌乘轮船到达江西九江要塞驻防。当时，运送弹药的军舰抛锚在江边。部队立即组成敢死队，掩护装有弹药物资的军舰不被日军发现进而被截获或炸毁。敢死队由李文华带队，他们顺利登上军舰后，争分夺秒拆卸军舰上的重要标识、标志，隐藏重要物资。

“完成任务后，我们刚刚上岸，就听见日军水上飞机的声音。随即，爆炸声在我们身边响起。我喊大家‘趴下’，然后，



/ 李文华在中缅边境打洛留影。

我们就一动不动地趴在紧靠着军舰的江岸边，直到日军轰炸结束。后来，我去叫大家撤退，发现他们都牺牲了。”说起这段经历，李老眼里噙满了泪水。“但我就是不怕死，就是死也要保护好船上的物资。”在这场战斗中，装有弹药物资的轮船虽被击沉，所幸没有被引爆，完好无损的物资后来被成功打捞上岸。

1938年，李文华因在江西九江执行任务时表现突出，被部队推荐到炮校下级干部培训班学习一年半。其间，由于中央军校炮科招生，李文华由炮10团推荐并考入中央军校炮校代训16期。这是李文华第三次进入炮校受训，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20总队学生。

“炮校校址从江苏南京、湖南零陵一路迁到了贵州都匀，和我同期考入黄埔的还有孔祥夫、吕品，我们都是20总队的学生。因为战事吃紧，学习非常紧张，我们这一期在学校学习2年就毕业了。”李老说。1940年，从黄埔军校炮校代训第16期毕业的李文华，再次回到炮10团3营8连任见习官。半年后，担任排长，先后驻湖南沅陵、郴州等地，负责训练炮兵。不久，部队开赴昆仑关参加广西会战，李文华则调入驻湖南祁阳的突进总队山炮连任连长，担负训练任务。突击总队由英国政府提议成立，主要为中国编训部队，归李默庵将军指挥。后来英军撤回印度，英军突击总队编练合作计划



/ 刚果(金)统促会人员看望李文华(中)。



/ 杨震环秘书长(左二)陪同刚果(金)统促会人员看望李文华(左三)。

也基本结束，李文华又回到炮10团3营。1944年，炮10团随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进驻保山支援滇西作战，配属各军师。其间，李文华还经保山远赴缅甸密支那，承担接收并运送美国提供的两门榴弹重炮等任务。后来，李文华随部队驻安徽休宁、浙江

杭州等地，直至抗战胜利。

硝烟散尽存本色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设计主题，也是李老百年人生的写照。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

李文华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李老用满是皱纹的双手爱惜地抚摸着 he 心爱的纪念章，仿佛也在触摸他一百多年的人生。过了一会儿，李老一边向我们展示 he 收藏的《黄埔》杂志，一边说：“这里面登有我和我的战友们的故事。”

抗战结束后，李文华随部队驻连云港、云南元江等地。后来在云南向陈赓部队投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文华定居贵阳，在马车队工作，后来靠手艺为生。改革开放后，在贵阳经营小卖部，直到90多岁才在家人的劝说下，放下自己的店铺回家安享晚年。

在跟李老交谈的过程中，老人始终保持标准的坐姿。采访快结束时，笔者想给李老拍张照片，“我们给您拍一张敬军礼的照片好吗？”李老立马起身，挺直了腰杆，抬起右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采访中讲到高兴处，李老还不时冒出几句英语。告别时，他又用英语跟我们说“Goodbye”，军人本色和邻家爷爷的可爱在李老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如今，106岁的李老对过去很多事情的记忆都已模糊。唯独对于 he 就读黄埔、参加抗战的这段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黄埔

那段“立马九岭”的无悔青春

——访五分校十六期同学黄文礼

□ 罗永生 高林



黄文礼，男，1921年9月22日出生，云南弥渡人。1939年，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昆明）第16期步科第18总队学习。1940年10月军校毕业，分入湘鄂赣地区国民党第1集团军58军新11师32团1营1连任少尉排长，驻守在湘鄂赣边区通城，参加过多次战斗。1941年7月，在通城九岭战役中受伤致残，伤愈后转入广西泉州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七临时教育疗养院疗养。因战事紧张，随疗养院迁至贵州安顺。1952至1954年，参加区秋粮征购工作。1955年，在织金猫场粮管所任会计等工作。1976年12月退休。现任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2017年8月的一天，黄文礼老人的儿子黄浩在网上看到《楚天都市报》刊载了题为《“立马九岭歼顽敌，屡教倭奴弃甲还”——重立“立马九岭”抗战纪念碑》的报道：在从106国道通城县马港镇往湖南平江方向的路边，立起了一块硕大的石碑，上面写着“立马九岭”四个遒劲大字。据介绍，这是通城百姓为纪念当年长沙保卫战中九岭大捷而建。黄浩之前听父亲多次向自己提起这段经历，那是一段父亲挥洒青春热血的时光，那里更是父亲抗击倭寇受伤致残的荣光之地。黄浩立即将立碑一事告知父亲，年近百岁的黄文礼老人没有言语，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看得出他的目光里交织着对那段岁月的肯定与淡然。黄浩不再多问，只是自己反复阅读，并珍藏在手机里。

投考军校奔赴抗日前线

1921年9月，黄文礼出生在云南弥渡。时值抗战军兴，滇军部队相继编组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58军，投入抗日战场。在艰苦作战中，滇军基层军官伤

亡很大，中央军校和其他兵科学学校分配来的毕业生远远不敷使用，而军团长卢汉希望尽量用云南籍人员来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卢汉迫切希望能够在后方培养一批云南籍的初级军事干部，训练完成后送往前线。1939年，卢汉任命第60军参谋处的李韵涛为第30军团干部大队大队长，返回昆明筹备招生。第1集团军干部总队下设3个大队，训练期一般为一年左右。为了让这些学生取得正式的军事学校学籍，也为了能从中央领取一些办学经费，总队派人前往重庆与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交涉，军训部最终批准这个总队隶属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列为第16期第18总队，同时任命邱开基兼任第五分校副主任。因此，这个总队有了“第1集团军干部总队”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6期18总队”两个番号，高中毕业的黄文礼通过考试成为其中的一员，从此走上了从军报国之路。

1940年10月，黄文礼从军校毕业，与同学们一起步行前往湘鄂赣地区抗战前线第1集团军总司令部报道，随后被任命为

58军新11师1营1连少尉排长，从此投身于抗日洪流。其间，部队主要驻守湘鄂赣边区通城至崇阳侧面的狮山阵地与日军对峙，黄文礼随部队先后参加过多次战斗。

“立马九岭”右眼受伤致残

1941年，日本派兵从鄂南突击，欲沿湘鄂公路进犯长沙，途中必须经过通城县九岭。当时，驻守九岭的第10师溃不成军，九岭失陷。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电告58军，命令副军长鲁道源立即赴前线督战收复九岭。黄文礼作为58军新11师32团1营1连少尉排长，与该军将士一起参加了这场残酷的九岭阻击战。经浴血奋战，九岭重归中国军队手中，鲁道源当即题词“立马九岭”。每每回想起这些经历，黄文礼老人倍感自豪。

同年7月，在湖北通城的九岭争夺战役中，黄文礼的右眼不幸被炮弹碎片击伤，经长沙湘雅医院、湘潭兵站医院、衡阳94后方医院、湖南东安165后方医院、桂林第8陆军医院等多家医院治疗，受伤右眼未被保住，眼球被摘除。黄文礼被定为二等伤残军人。经过半年的治疗后，伤愈的黄文礼被转入广西泉州军政部的荣誉军人第七临时教育疗养院疗养。

随着战事紧张，第七临时



/ 中年的黄文礼(前排左二)与家人合影。



/ 黄文礼(第二排左三)与家人合影。jpeg

教育疗养院迁至贵州安顺，黄文礼一直在该院疗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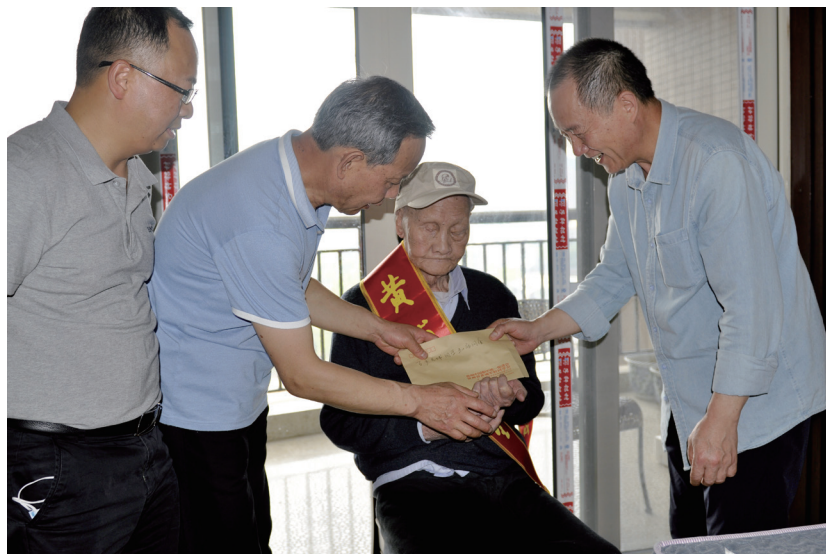
定居贵州安享幸福晚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文礼被短期劳教管制，后来从事秋粮收购工作。1955年，

在粮管所任会计。他充分发挥特长，工作积极突出，多次获得单位好评。1976年12月，黄文礼退休。

如今，在家颐养天年、四世同堂的黄老常说：“儿女孝顺，晚辈成才，有的还远渡重洋到英国留学，连曾孙也上大学了，这是我最开心幸福的事。”他时常关注新闻，收看电视节目，出门散步时也不忘买上一份当天的报纸。近年来，尽管身体状况欠佳，但他仍保持生活规律，天气好就外出活动健身，平常与家人一起打打麻将、拉拉家常。为了方便儿女们对他的照顾，他还常常往来于省城贵阳和织金县城之间。

79年后的今天，从湖北通城县马港镇往湖南平江方向106国道旁立起的“立马九岭”大字石碑，正默默述说着“九岭大捷”的悲壮抗日故事。战役的亲历者黄文礼，即将步入他的百岁人生。老人记忆力下降，对往事的记忆逐渐模糊，仅有的左眼看东西也感觉越发吃力了。但是，面对晚年的幸福生活，这位百岁黄埔老人自豪地说：“尽管自己过去饱经沧桑，但能活过来就不易，我对今天的生活感到十分满足！”这应该是黄老对自己当年无悔青春的最好注解。



/ 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机关干部看望黄文礼(右二)。



/ 黄文礼的军礼照。

腾冲战役立功 远赴越南受降

——访五分校十八期同学李茂德

□ 华廷凯 李政德(黄埔后代)



李茂德，又名李文涛，1921年11月生，贵州盘县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18期步科毕业。1943年6月，在云南暂编23师任骑兵连排长，随后被调往工兵营，驻守云南昆明飞机场。1944年春，主动请缨参加腾冲战役。1945年8月，赴越南河内接受日本投降。1949年5月，任第6军1016团代理副团长。12月，参加云南起义，部队改编后，任解放军暂13军少校炮兵连长(副团级)，多次受到卢汉嘉奖。后来因请假回家探亲后无法归队，留乡执鞭任教。现为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年少历苦难 不屈读书郎

李茂德出生于农民家庭，祖辈以务农为生。4岁那年，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土匪，父亲侥幸逃脱，李茂德和其大伯被带回土匪窝。李茂德亲眼目睹土匪们用皮鞭抽、用烧红的钳烙、用枪顶着脑袋等方式恐吓大伯，年幼的他被吓得哇哇大哭。有一天，匪首带人出门抢劫，只留一个土匪看守，趁看守土匪睡熟之际，李茂德悄悄帮大伯松了绑，大伯成功逃脱。大伯回家告知情况后，李茂德父亲借了15块大洋找人把他赎回了家。

7岁那年，土匪再次祸及他家，这次不仅抢光了家里的财物，还杀害了他的祖父与父亲，放火烧毁了房屋。此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到了39岁的母亲身上。有人劝说母亲改嫁，都被母亲婉拒。就这样，母亲早出晚归，一个人抚养他们兄妹四人长大成人。

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李茂德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每天干完活，他就去寨上的学堂窗外隔墙听讲，偷偷跟着学写字。后来，这件事被母亲知道，母亲

便与族中兄长协商，让他去兄长家跟着他家请的先生学习。1934年，李茂德终于进入梦寐以求的学堂正式上学。之后，他每天早早做完家务就去学堂，放学后继续帮助做家务。后来，他被送进水塘文庙高等小学学习。两年后，李茂德越级考入昆明南英中学，因家境贫困，后转到盘县省立师范附中就读。在此期间，渴望学习的李茂德更加刻苦努力，暗暗自学高年级的知识。

几经周折终进黄埔

1941年，李茂德怀着报国安民的心愿报考昆明黄埔军校第五分校。由于中学尚未毕业，没有中学毕业证，按照规定不能报名。李茂德便弄了一个假毕业证到军校报名。李茂德说：“我原名叫李文涛，当时为了顺利通过审核，便化名李茂德造假证。但是在报名时，审核军官发现我的毕业证是假的。我如实相告，并强调我是个爱国青年，一心想报效国家。审核军官不同意我报名，他让我去当兵，说当兵同样可以上战场杀敌报效国家。我对审核军官说：我知道军校是

培养人才的地方，当兵只能以一个人的力量去打日本人。进入军校学到本领后，如果我是一个连长，我就能带领一个连的人打日本人，如果是营长就能带领一个营的人打日本人。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审核军官终于松了口，同意我参加考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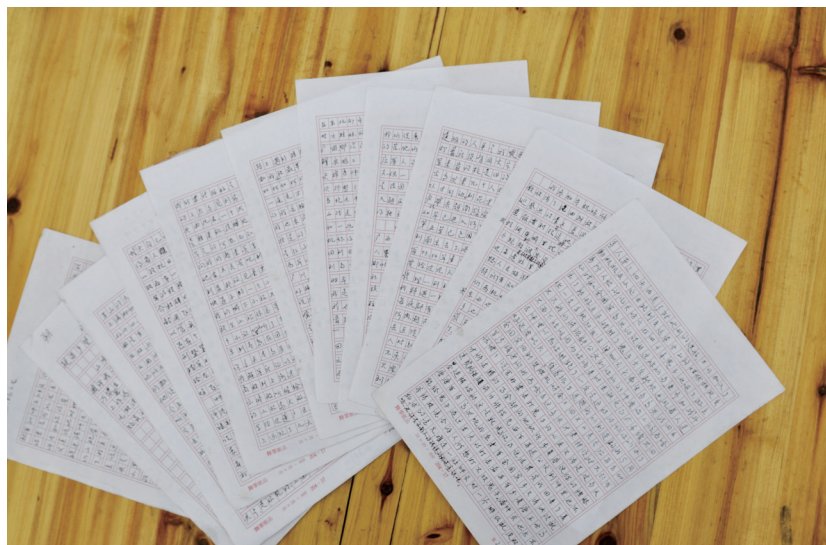
10月，李茂德终于如愿考入黄埔军校第五分校第18期步科，从此踏上了从军报国的道路。在第五分校就读期间，学习了步兵操典、战术学、筑城学、兵法、规章制度、武器射击、陆军刺刀、兵种操练、战略战术应用、军事指挥基本理论等。学习期间，由于成绩优秀，获得了军校奖励的孙中山先生全套著作。

主动请缨抗战 腾冲战役立功受奖

1943年6月，李茂德从黄埔军校五分校毕业，分配在云南暂编23师（师长潘朔端）任骑兵连排长。接着，师部为提高连排干部的作战能力，成立干训班，李茂德被任命为干训班的区队长，与刘盖雄、夏天方在中队长李馥堂的带领下对营以下干部进行培训。之后，跟随李馥堂调往工兵营，驻守云南昆明飞机场。

驻守昆明期间，李茂德从报纸上看到云南腾冲战事吃紧，便萌生了上阵杀敌的想法。

1944年春，李茂德请假到



/ 李茂德回忆抗战经历的手稿。



/ 李茂德写毛笔字。

昆明买药，偶遇60军的原军校同学余国宾（云南文山人）。两人聊到当前战事，回想起上军校的初衷就是到前线参加抗日，而今却没有机会上一线杀敌。两人一拍即合，决心不管受到怎样的处分，也要到前线参加战斗打日本鬼子。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到腾

冲，找到友军说明身份及来意。征得友军的同意后，他们立即参与察看地形、敌情。随后，李茂德向友军张连长报告并提出了作战方案。张连长说：“作战方案我同意，但是部队接到的命令是坚决固守阵地，兵力不能分散，你们两人可与我们的两个



/ 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机关干部看望李茂德(中)。



/ 李茂德(右三)与家人合影。

连长共同指挥战斗。”但李茂德、余国宾坚持上一线，经张连长同意，两人要了两挺机枪上阵当机枪手。同时，另外请部队安排两

名机枪手带上两挺机枪一同行动。第三天，天刚麻麻亮，李茂德、余国宾二人就到前线观察地形、修筑工事，一切准备就

绪。大约9点多钟，日军大部队过来了，集结在一块大凹地前布置阵地，准备向中国守军进攻。此时，早早埋伏的四挺机枪向日军猛烈扫射，顷刻间，敌人纷纷倒地，乱成一团，渐渐后撤。后来，四个人与主力部队向敌人进行合围，经过四天四夜激烈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在这场战斗中，敌人伤亡3000多人，我方缴获山炮、轻重机枪、步枪等战利品。中午回到主阵地后，孙师长对李茂德、余国宾进行了嘉奖。二人向孙师长提出想留下来继续参与战斗的想法，但因部队纪律严明未能如愿，最后二人分别领了1000元国币、一支手枪及50发子弹，返回了原部队。

远赴越南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李茂德所在部队。14年与日本侵略者的艰苦作战终于宣告结束，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李茂德高兴得热泪盈眶。随后，所在部队奉命编入第一方面军奔赴越南河内接受日本缴械投降。部队由云南蒙自经河口到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接收日本山炮营的军事装备，顺利完成受降任务。

多年后，李茂德回忆起抗战的峥嵘岁月与赴河内接受日军投降的经历，仍心潮澎湃，写下了一首诗：

自愿抗日雪国耻，
南征北战远离乡。
长风破浪追穷寇，
直到越南去受降。

随部云南起义 返乡桃李满园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茂德任第93军炮兵连少校副连长等职。1946年秋被调往东北四平、锦州等地。1949年5月，在第6军1016团任代理副团长。12月，李茂德在军长龙泽汇的率领下参加了云南起义。起义成功后，原国民政府军队改编为解放军，李茂德任解放军暂13军少校炮兵连长（副团级）。

1950年，李茂德接到家中母亲病危的书信，请10天探亲假回家看望母亲。回家经过火铺杨家坟时，遭遇土匪抢劫，同车10余人除李茂德外均被打死打伤。随后，李茂德步行回到盘县（现为六盘水盘州市）家中，精心侍奉母亲，直到母亲病愈。由于在家照顾母亲的时间超过假期，加上当时通讯不畅且道路不通，李茂德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在亲友的劝说下，李茂德便先后到司寨、水塘、鸡场坪等地，手执教鞭，教书育人。

退休后，李茂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更热心为家族之事奔走（修家谱、为先人树碑立传等）。他80多岁时还多次赴云南等地，为家族修谱忙碌，因此深得族



/ 李茂德（前排右二）与家人合影。

人尊重。2014年，94岁的李茂德还到盘县板桥镇乡村找到失散多年的族人，完成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如今，李茂德居住在盘州市民主镇大厂荫村。他坚持学

习，在家读书看报学书法；热爱运动，每天清晨坚持走近3公里路；生活节俭，看淡得失。继续用自己不息的脚步，诠释着一位百岁黄埔老兵追寻不止与甘于奉献的人生意义。■

黄埔师生在髻髻山抗战

□ 王琰 尹向东

髻髻山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海拔1524米，当地人以髻髻山形如少女发髻，故称髻髻山（当地人称“髻髻山”）。明代《苑署杂记》称髻髻山为西山之祖，是北京西山大岭系列主峰之一。

1937年8月18日至9月15日，这里曾发生过一场中日平西大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中国驻屯军无法像东北一样在华北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于是直接把一场地方性的军事事变

转变为国家间的全面战争，察哈尔战役（又称南口战役）从8月10日至9月18日历时40天，双方参战兵力26万，这也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中日首次会战。

察哈尔战役南口作战

1937年8月初，日军第5师团、第6师团、第10师团等部队陆续在天津大沽口登陆。8月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向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华北会战最后修正计划》。

根据该计划，中国驻屯军向南口大规模集结兵力，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奉命于8日、9日连续向南口发动试探性攻击。8月9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了《中国驻屯军华北会战最后修正计划》，命令中国驻屯军立即进行平绥路东段作战。日军投入平绥路东段作战（日本称察哈尔作战）兵力共14万人，拥有火炮450门，坦克120辆，作战飞机300架。

8月5日，中国陆军第7集团军第13军主力经铁路输送到平绥路东段怀来车站，全军28000人



/ 髻髻山(髻髻山)全貌。



/ 卫立煌。

及装备紧急开赴南口前线，在地幅240里的宽大正面上布防。第7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汤恩伯指挥的作战部队共约6万人，加上张垣第7集团军以及察哈尔军，投入平绥路东段作战的中国军队总计12万人。

8月1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估计关东军10天后当自热河进攻张家口，遂电令卫立煌从安徽出发在保定以北集结所部第14军，限10天内前出南口战场协同汤恩伯部作战，歼灭南口日军，拊日军华北方面军之背，进而收复平津。因此，察哈尔—平西战役在国民政府军委会这一战略指导下，客观上发展成为两个衔接战役阶段：第一阶段南口作战，主战场在南口、居庸关；第二阶段平西作战，主战场在平西髻髻山。

8月10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15000人遵照参谋本部9日下达的作战命令，在4个小时炮兵和陆军航空兵猛烈火力突击

后，向抢防南口的中国陆军第13军大举进攻，南口战役全面打响。

8月26日凌晨，汤恩伯被迫下令各固守点自行突围，向察南撤退。

8月27日，居庸关守军突围北去后，日军主力才得以越过这道“铁门”深入察哈尔。

卫部驰援南口

8月16日，卫立煌第14军先遣支队（第83师第249旅一个轻装团）从房山县周口店出发，受命进入周口店谷口走间道经水峪东大尖峪儿鞍进入宛平县（今属北京），经千君台、庄户向大台、王平一线搜索警戒。

8月18日午后，先遣支队出南港沟前出到千君台、庄户。先遣支队一部在东板桥村口与日军第36旅团牛岛支队前锋遭遇，杀退日军并控制了谷地左边海拔1524米髻髻山和海拔1300多米桃玉山，日军则控制了两峰对面海拔1528米的清水尖。

8月19日午时，第14军第10师由涿县出动，受命经张坊、野三坡沿西奚古道进入门头沟，过梨园岭、龙门口、沿河城向镇边城、黄老院进发。

同日，第14军第83师由房山县周口店出发进山，该师第249旅受命由红煤厂经瞧煤涧、王

老庙、北台子到达千君台。后续师部和直属部队、第247旅则由红煤厂走玉河古道北段，经大安山、花园沟再翻越大贝梁下通州峪进入斋堂川向镇边城、黄老院进发。

8月20日，第14军第85师从涿水县出发，受命经张坊、野三坡、高窝铺、奴才岭，出奴才沟进入张家庄、杜家庄一带。

当日，第85师前出到拒马河畔蔡家庄，恰逢山洪暴发水涨流湍，遂被迫绕行涿县渡河，22日到张坊。此后山路倾斜狭窄，更兼连日秋雨，溪流纵横，十分难行，25日方到达高窝铺。又接总司令电话命令，第255旅连夜急行军赴髻髻山、桃玉山前线接防。

8月23日，陈武将军（黄埔1期）率领第83师第249旅主力到达千君台，即在髻髻山、桃玉山、庄户一线投入激战，连续击退日军5次攻击。

8月24日，陈牧农将军（黄埔1期）率第10师第28旅到达沿河城，永定河暴涨不能徒涉，遂折向下游青白口过河，于行进间攻占太子墓、下马岭，走芹峪四十五岭古道，当夜攻占平西要地大村。

8月25日，第28旅北上收复马刨泉村。当日，李默庵中将（黄埔1期）率第10师师部和谷乐军将军（黄埔1期）的第30旅到

达沿河城、青白口一线，却屯兵右岸不进。第83师第247旅则越过第10师主力徒涉过河，追踪第10师第28旅北进。

是日，第83师第249旅在庄户桃玉山一线与日军第23联队展开激战，日军溃退，遗弃重要机密文件甚多，包括日军《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

8月26日，第10师第28旅在马刨泉村西北击败前来阻截的日军一个联队。日军向西北山地败退。据我们见到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军情战报电报档案，8月26日黄昏，第28旅已前出至镇边城和横岭城，均未见一人，横岭街上唯见散落的弹药和遗弃的粮秣。汤军、日军已经出里长城北去，卫部驰援失机，南口作战大势已去。

是日9时30分，第85师第255旅的先头部队石鸣珂（黄埔1期）510团经一夜急行军到达大寒岭，当即分兵增援第83师第249旅，投入保卫桃玉山、髻髻山的战斗。至21时，郝家骏将军指挥第255旅完成对第83师第249旅阵地全部接防任务：510团守御第一线左地区髻髻山、桃玉山阵地；谷熹（黄埔4期）509团守御第一线要冲东坟上、庄户和右地区铁柱山阵地；旅部驻千君台。

8月27日凌晨2时，第85师师长陈铁将军（黄埔1期）率领师部和师直属部队进驻大寒岭吕



/ 陈铁。

家村。

同日下午，卫立煌率领第14军司令部和直属部队翻越大安山、大贝梁下通州峪来到西胡林，把司令部设在西胡林。命令第85师第253旅改作军预备队，配置在东胡林、大寒岭一带，旅部驻东胡林。19时后，陈鸿远将军率领第253旅陆续就位。

同日，第83师第247旅、第10师第28旅归建。

8月28日，第83师第249旅主力归建。

同日，卫立煌下令全军就地由攻势转入防御，大体沿永定河建立防线：沿河城至青白口一线为李默庵中将第10师阵地；傅家台至河南台一线，法城沟口至髻髻山左侧山地一线为刘戡将军（黄埔1期）第83师阵地；大台谷地髻髻山、桃玉山、东坟上、铁柱山一线为陈铁将军第85师阵

地，髻髻山是全军防线重心。郝家骏将军第255旅守御该师防线一线、二线阵地；军预备队第253旅505团、506团在千君台、大寒岭、杨家村作纵深梯次配置，拱卫军部，支撑战线重心。全军对来自察哈尔、北平方向之敌构成坚固防御。

卫部恢复的这道平西战线西北部遥接晋绥军防区，东南部与位于房山的第2集团军第26路孙连仲部防区衔接，崩溃的华北战线得以重建，危机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9月12日，由察哈尔战场转进下来经过匆促整补的朱怀冰第94师北上到达里长城麻黄峪、旧庄户一线对西警戒布防，增强了平西战线左翼的稳定性。卫部只要迅速不断地得到大本营的切实补给和兵力兵器有力加强，坚守住以髻髻山阵地为重心的平西战线，就能居高临下瞰制日军华北方面军，使之跋前疐后，不能一心南顾。一旦力量足恃，卫部将北上收复察哈尔平绥路东段，然后东出南口，拊日军华北方面军之背，伺机收复平津。卫部驰援南口虽然迟缓失机，但迅速重建华北战线，鏖战平西，对稳定华北战局，抗击预期的华北会战日军大举南下，极具战略意义。可惜，拥有重兵和充足军实的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但作壁上观，对卫部不发一兵一弹，只运去180包大

米，更不积极出兵阻止日军西进压迫卫部，使卫部无从展布，大有被封闭于群山之中全军覆灭之虞。在华北会战开始后刘峙居然不事抵抗，所部一溃数百里，如非军委会及时电令南撤，卫部必然无幸。

察哈尔战役髻髻山之战

8月26日上午，符昭骞将军（黄埔1期教官，14军军部参谋处长）受命从大安山行军途中辗转来到千君台，与陈武和郝家骏背着卫立煌策划了一个出击计划。由第249旅旅部上校参谋主任魏巍（黄埔4期）率梅展翼（黄埔4期）团主力乘夜暗从千君台迤南绕出敌后，在群山中潜行至王平口关城迤东隐蔽，次日22时见信号弹腾空即从东向西对王平口、板桥一带日军发起攻击，第85师第255旅510团1营见信号弹即从桃玉山阵地向当面之敌出击。

8月27日20时，守御髻髻山阵地的第255旅510团2营夜袭清水尖日军，与从龙王庙来袭日军在西山大岭两峰间狭窄岭脊右侧山地遭遇，激战至午夜，将敌杀退返回阵地。

同日，傍晚时分，第85师师长陈铁从师部来到千君台。21时，符昭骞、陈铁、陈武、郝家骏四位将军联手登上千君台一制



符昭骞。

高点遥望板桥、王平口，藉月光观战。22时，信号弹腾空，一片杀声爆炸声震天动地，板桥、王平口之敌突然受到夹击，顿时溃不成军，辟易七八千米到桃园犹立不住脚。

8月28日，出击的第249旅梅展翼团主力胜利返回，且颇有斩获，卫立煌检视战利品后大乐。当日该团主力奉命归建。

8月29日，西板桥之敌增至一个旅团规模，遂大举向髻髻山、桃玉山、东坟上进攻，均被守军击退。傍晚时分，髻髻山守军第255旅510团2营电话报告发现一日军纵队由清水尖北侧向西北运动，一个半小时方通过完毕。第85师师长陈铁判断，日军一个大队正绕行潜出傅家台永定河以南山地，企图偷袭髻髻山左翼阵地。于是下令利用夜暗隐蔽前调预备队第253旅505团1

营，埋伏在髻髻山左侧后方，静待深远迂回日军攀登至髻髻山山腹时再突然纵兵侧击。505团1营和髻髻山顶510团2营由253旅副旅长花实秋统一指挥。

8月30日13时，由清水尖绕行偷袭髻髻山左翼阵地的日军陷入法城沟口505团1营、魏家岭东南一带高地第83师第249旅493团守军火力夹击之中，弃尸百余具逃窜。

是日，第255旅509团1营东坟上南端阵地持续受到日军猛烈炮击和反复攻击，多次展开肉搏战，师长陈铁以该营伤亡过重，命预备队第253旅506团1营营长率该营1、2连接受第255旅旅长指挥。

9月2日，第253旅505团3营夜袭8月30日偷袭失败逃至髻髻山西北侧高地据守的日军，激战两个多小时消灭敌人百余，残敌逃向清水尖。

9月5日，庄户当面之敌10时开始炮击髻髻山守军，以观测机随时修正弹着点，16时仍未停止。敌新赶修的怀来野战机场近在咫尺，故虽仅有9架轰炸机却能在炮击的同时反复凌空轰炸。敌步兵亦向髻髻山左右翼阵地轮番进攻，激战直至天黑。第85师第255旅509团阵地受到日军炮火集中打击，人员伤亡和工事破坏十分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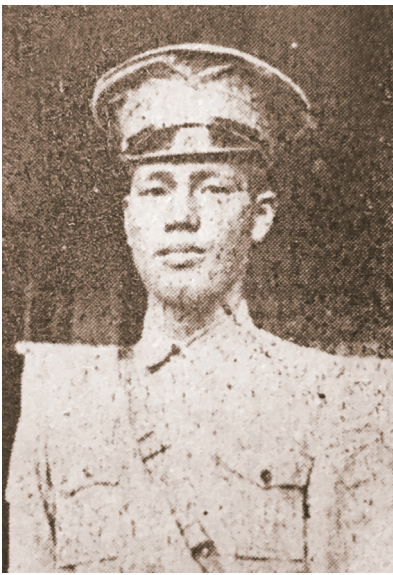
9月6日，庄户当面之敌8时

起继续轰炸，炮击髻髻山、桃玉山、东坟上第85师主阵地。经过连日残酷厮杀，守军伤亡过大，特别是509团2营及3营之7、8两连官兵伤亡几尽。23时，军部命令510团放弃东坟上至桃玉山阵地，固守千君台北端高地，与髻髻山阵地、老官帽山阵地左右连接为第一线阵地。第85师自8月26日以来血战两周，牺牲重大：第255旅509团官兵伤亡四分之三，510团伤亡二分之一，第253旅505团伤亡三分之一。该师重创日军的同时，自己也有5个建制营失去了战斗力。

9月8日清晨，第255旅510团集中全团迫击炮轰击占领桃玉山之日军阵地，日军死伤甚重。18时许，日军炮击髻髻山左翼505团阵地，发射大量黄十字化学毒剂炮弹，致使许多正在工事里休息的中国军人身亡。这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日军无视国际公约在察哈尔—平西战役中第四次使用毒剂作战。

是日，第85师第253旅505团激战至深夜后退出战斗，将髻髻山阵地交由第83师第249旅498团（曾宪邦团）接防。

9月13日，日军第36步兵旅团向髻髻山阵地发射炮弹2000发以上，该山表面尽成焦土。498团浴血抗击，双方反复争夺主峰阵地，团长曾宪邦（黄埔4期）腿和腹部负伤后拒绝后送，继续



/ 曾宪邦。

指挥作战，直到头部再次中弹壮烈殉国。战至午时，该团军官伤亡殆尽，残存官兵仅能编为一连，虽由第10师、第83师抽队增援，髻髻山是日午后1时终于失守。守军不甘失败，不顾力量对比悬殊，一再反攻企图夺回髻髻山核心阵地，殊死战斗持续到22时仍未停止。

9月14日，符昭骞连夜编制了一个以1390高地为防线重心的坚守计划，卫立煌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就在此时，髻髻山失陷后的平西战线周边军事形势发生巨变：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2军从长辛店、静海一线提前发起保定—沧州作战，其中4个师团合击保定；而坂垣师团第5骑兵联队主力已占领蔚县和涞源以北，21联队进占山西广灵，掩护第5师团主力南下插向保定；

卫部后方房山佛子庄附近上下英水、大小营9月2日即被日军占领，迫使卫立煌9月6日急调第10师58团在红煤厂、寿领子一带构筑阵地。事实上卫立煌军已处于日军战略包围之中。

此时卫立煌第14集团军（新改编）困惫已甚。第2集团军既没有派出有力部队牵制日军西进，也没有为卫部建立最低限度的后勤保障。贫穷的平西人民拿出了自己所能拿出的一切可吃的食品供军队采购，4万多人最终还是不免乏食，全军陷入绝望的饥寒危境之中。9月山区气温下降很快，一次夜间大雨夹杂冰雹袭来，致坚守在1000多米高山上已经20多天敝衣枵腹的官兵冻死甚众，仅12日，刚到的经过整补的第94师（朱怀冰部）就冻死500多人，冻伤者尚未计。

同日，军委会来电命令卫部立即撤往石家庄整补。

9月15日22时整，卫部在暗夜掩蔽下分四路同时撤往石家庄、获鹿一线。按计划军部和第85师走东道，出周口店谷口，向满城、曲阳方向撤退。第83师走中左道，经大安山、红煤厂、张坊出山，转趋涞水、曲阳。走中右道经斋堂、杜家庄、奴才岭、野三坡至张坊的第10师亦取道涞水向曲阳方向撤退。走西道的第94师经奴才岭、野三坡、紫荆关、南唐涓向曲阳方向撤退。

9月17日黄昏时分，军部和直属部队刚走出周口店谷口，日军已迫近谷口外白塔山，枪炮声响成一片，仅先敌一步出谷，但第85师大队尚在谷中，被封闭在合围圈内就歼的命运似乎已是不可避免。正危急间，突然天降大暴雨，从明治建军起即无雨具列装的日本部队，此刻竟然都忘记了“日本武士何惧风雨”的信条，急忙停止了攻击前进。卫部东路军才得以乘机全数出谷，于是不顾两昼夜翻山越岭急行军的极度疲劳，冒雨连夜向西南撤退。

9月18日上午，卫部东路军到达涞水县东郊进入树林休息。未几，日军轰炸机群低空飞来，野蛮往复密集投弹轰炸，县城几乎夷为平地，遍地尸体和残肢断臂。卫部空腹再西撤易县。

9月19日清晨，卫部南下满城，竟奇迹般地跳出了日军的战略合围。

髻髻山之战地点之争

在对全面抗战初起历史的研究中，平西作战一直湮没无闻，甚至被误认为是忻口战役的一部分。从以上可见，察哈尔—平西战役的范围在察哈尔省平绥线东段和河北省西北部宛平县地域（今属北京），与山西省忻口无涉。

符兹治先生（符昭骞将军次子）查证《北京市区域地质志》相关资料证明，在门头沟地区有火山岩地貌，分布于“百花山、髻髻山”等地。而在山西忻口地区，却查不到相关的地理名称，也见不到火山岩地貌。作为京西特别的地质奇观“向斜山”，恰恰是在永定河把髻髻山切出的大片剖面中，褶皱山最低的向斜“核部”，如今却挺立在山顶；背斜“轴部”，反而落到了山体的低处。于是地质学家把这种颠倒的地质构造叫“向斜山”，又叫“地形倒置”。为此，地质学上特别规定了一个“髻髻山组”岩系。由以上佐证可见，髻髻山确实形成于京西西山大岭而不是形成于山西忻口云中山。

遗憾的是，由于髻髻山战斗亲历者叙述详细战事经过的著述非常罕见，目前能够见到的史料，仅有笔者发现的符昭骞将军《抗日战争中门头沟庄户战役纪要》一文手稿。

手稿中引用的一封电报《元亥电》，是卫立煌在元日（13日）髻髻山失守当晚亥时（22时）拍给大本营何应钦部长的特急电：

千君台当面新增之敌，为牛岛旅团及大炮二十余门，昨申时直至今晚，向我李师及刘师曾团步炮联合猛攻，向我髻髻山阵地集中发射在二千发以上，该山全

成焦土，我曾团浴血猛抗，争夺激烈，现该团长曾宪邦殉国，官长伤亡殆尽，剩存约一连，由李、刘师抽队增援，刻仍激战中。

《元亥电》所记述的髻髻山激战情况与曾宪邦殉国日期（9月13日），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卫立煌致蒋介石等密电》之《删午电》的内容和时间完全符合。笔者12年前有幸在北京四中老同学符兹治家中偶然看到了符将军这一未完成的遗稿，发现了平西之战，笔者当时连称遗稿珍贵，因为据笔者所知，当时尚没有一本书、一篇学术论文正式记载研究过这次作战。我们决定立即研究这次作战，把符昭骞这篇未完成遗稿从内容到文字迅速订补整理出来，并去门头沟联系有关方面共同到战场考察。笔者这里要说明的是，手稿中提到并引用的这封《元亥电》，清楚无误地写明该电是卫立煌在髻髻山失守的当晚即9月13日亥时（22点）拍给大本营的特急战报。这封电报表明，虽然当时从下午1点到深夜10点守军多次反攻失败，仍在组织力量与日军激战不已，企图夺回平西作战这一核心阵地。

符昭骞将军遗稿记述髻髻山战斗的文字，直接摘录于他本人1937年战地电报笔记手稿，具

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附：髫髻山抗战黄埔师生录

符昭骞：黄埔1期教官，第14军军部参谋处长。

刘 戡：黄埔1期，第83师师长。

张际鹏：黄埔1期，第83师副师长。（或为补充团团长）*

吴伯华：黄埔1期，第83师参谋长。

陈 武：黄埔1期，第83师第249旅旅长。

魏 巍：黄埔4期，第83师第249旅参谋。

曾宪邦：黄埔4期，第83师第249旅498团团长。

梅展翼：黄埔4期，第83师第249旅497团团长。

陈权武：黄埔4期，第83师第249旅497团3营营长。

杨光钰：黄埔1期，第83师补充团团长。（或已经调走）*

龚思齐：黄埔4期，第83师辎重营营长。

李楚瀛：黄埔1期，第83师第247旅旅长。

周建陶：黄埔1期，第83师第247旅副旅长。

李纪云：黄埔4期，第83师第247旅493团团长。

余锦源：黄埔2期，第83师第247旅494团团长。

陈 铁：黄埔1期，第85师

师长。

傅正模：黄埔1期，第85师副师长。（或83师副师长）*

石鸣珂：黄埔1期，第85师第255旅510团团长。

刘眉生：黄埔5期，第85师第255旅510团副团长。*

谷 熹：黄埔4期，第85师第255旅509团团长。

李默庵：黄埔1期，第10师师长。

彭杰如：黄埔1期，第10师副师长。

杨文珪：黄埔3期，第10师参谋长。

黄德仪：黄埔3期，第10师参谋。

陈牧农：黄埔1期，第10师第28旅旅长。

刘嘉树：黄埔1期，第10师第28旅副旅长。

马叔明：黄埔3期，第10师第28旅56团团长。

刘明夏：黄埔1期，第10师第28旅57团团长。

谷乐军：黄埔1期，第10师第30旅代旅长。

邱企藩：黄埔1期，第10师第30旅副旅长。

刘建修：黄埔4期，第10师第30旅58团团长。

王声溢：黄埔4期，第10师第30旅59团团长。

曾 鲁：黄埔2期，第10师补充团团长。

周一寰：黄埔5期，第10师工兵营营长。

郑庭笈：黄埔5期，第10师第28旅，营长。（郑的回忆录）

（带*者当时军中职位尚待考证）

参考文献：

1. 马仲廉《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2. 政协北京市门头沟区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京西军事遗址》，中国博雅出版社出版。

3. 政协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西古道》，银河出版社出版。

4. 符昭骞、符兹治《门头沟庄户会战纪要》，《门头沟文史》24辑，政协北京市门头沟区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北京艺术与科学出版社出版。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感谢北京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贵州遵义陈铁纪念馆、湖南桃江县委宣传部和北京门头沟政协副主席顾慈阳、北京门头沟致公党支部主委郭俊琴、北京门头沟文史委主任石建山等对本文写作的支持与帮助。

郑坡忆远征缅甸

□ 洪永珊 汪校芳



/ 郑坡。

郑坡（1902—1973），出生于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丰岭岙村，毕业于黄埔军校1期，历任宪兵团营长，国府警卫旅参谋长兼第2团团长，特务团团长，警卫军第4旅旅长。1930年弃军从农，在奉化、三门及上海等地兴办大华农场。抗日战争期间重返军营保家卫国，任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办公厅主任，缅甸第2集练处处长，远征军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总指挥，授中将军衔。

最近，笔者找到了郑坡先生的部分手稿，其中说到他远征缅甸的经过。此文根据郑坡手稿整理而成。

远征缅甸的背景

1941年8月，日寇饭田祥部在越南西贡登陆，中国调第10集团军关麟征部防守中越交界的马关一带，因滇越路有近300个铁桥和隧道，日寇一时不敢轻进；珍珠港事变后，日寇山下奉文的14方面军侵入泰国；木村兵太郎部侵入缅甸，中国从西北调宋希濂部，并扩编为第11集团军集中昆明待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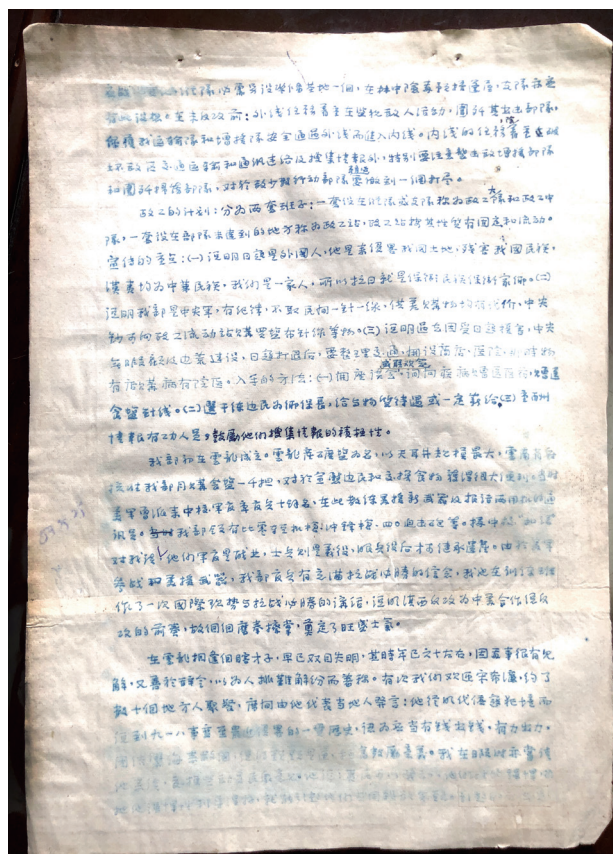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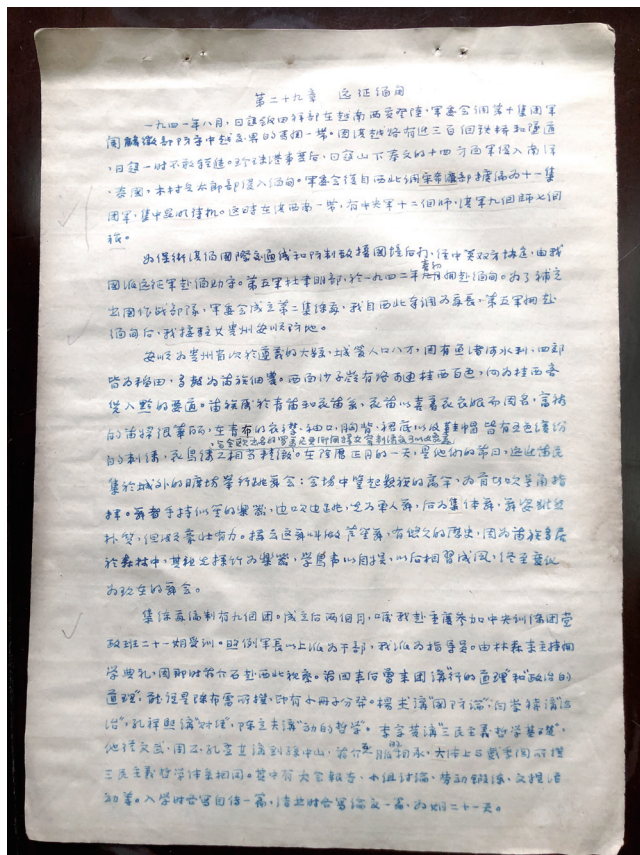
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夺取缅甸、法属印度支那等地，切断美、英等国援华国际通道，威胁中国正面抗日战场的中心西南大后方，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摆脱中国战场困境。

保卫缅甸就是保卫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守住缅甸意味着粉碎日本的战略目标。这一区域多是英国侵占或渗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本由英军防务，为此，中美英于1941年12月商议，中国出兵缅甸。12月13日，中英双方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组建中国远征军。即时，中国方面派出10万远征军进入缅甸抗击日军。

有战争必然有牺牲，为保证出国作战部队的兵源，配套成立第2集练处专为第5军训练新兵，并将在甘肃平凉主要为胡宗南第34集团军补充兵员的第14补充兵训练处处长、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办公厅主任郑坡，调任第2集练处处长，驻军贵州安顺防地，编制9个团。

英军出于殖民缅甸的疑忌，迟迟不同意中国军队迈过缅甸国界，拖到1942年2月底，才答应杜聿明的第5军进入。虽然第5军由装甲兵扩充而成，是中国当时唯一的机械化部队，但此时中国军队已失去战机，再加上美英中三国叠加而混乱的指挥系统，打了一场没有主动性又缺失准备的被动战，腊戍危在旦夕。此时，蒋介石急电郑坡支援，令5天内到达腊戍。郑坡甚至连配备新兵的武器也没有，就率刚训练完的4个团急急赶赴腊戍。

郑坡率部抵达滇缅边境遮放时，杜聿明部的防线已被日寇突破，援军没有了意义。郑坡联系上退到遮放的参谋团主任林蔚文，参谋团是为协助远征军作战而设的。林蔚文告诉郑



/ 郑坡手稿。

坡，参谋团预定计划扼守畹町，阻敌不入国境，从目前战况看，这一目标已无法达成。以后做两种打算，一是阻敌于龙陵；二是如果龙陵不能阻敌，只好扼守怒江。并令郑坡关注军情，见机行事。

因杜聿明部还没有退回国境，战况不明，腊戍已被敌军占领，郑坡的部队无法获得武器装备，就下令先集中武器编成一个战斗团为后卫，其余徒手士兵编为运输团，抢运美援物资。因

为这一带是美援物资的待运站，崎岖的路上，除了运输美援物资的车辆，还有溃退的部队要突围，华侨及其家眷在逃避战祸，后面又有日军的机械部队在紧追不舍，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是如何混乱。时任滇缅公路运输工程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缅运输总局局长的俞飞鹏，眼看敌军逼近，不得不下令烧毁军用仓库内的汽油和弹药，一时火光耀天。

因11集团军无法及时到达，

林蔚文退守国境线畹町的计划无法实施，甚至连龙陵也无法扼守，只有凭怒江天险阻敌了。此时，郑坡临时组织的这个后卫团，利用龙陵山地构成工事，及时阻击连续进犯的日军，经过激烈的战斗，一时令敌人的进攻速度迟缓下来，营长袁国铨在战斗中牺牲。

郑坡率领的运输队两天没能开火做饭，急急退过怒江后，炸断连接怒江东西两岸的惠通铁桥，终于扼敌于怒江，使中日

两军处于对峙拉锯状态，大理、昆明得到了保全。敌人滥炸保山，还投下细菌弹，我方死伤万余人。

扼守怒江，保住昆明，也就保住了从印度到昆明的空中军事物资运输航线，在滇缅公路被阻断的时候，这条运输航线成为唯一的国际交通线。郑坡率部不但抢运大批军用物资，更为扼守怒江立了首功，获得了上级的褒奖。

当时，一个最大的疑问是杜聿明的第5军到哪里去了？原来腊戍失守后，中国军队南北受日军夹击，缅甸公路被切断，撤退军队仓促北退贡山，绕道碧江而入国境。因英国军队的一段防线被日寇出其不意地攻破，以至杜聿明部退入国境的后路被截断，造成杜聿明所率15000人出走野人山的惨剧，师长戴安澜和副师长胡某阵亡。

后在美国顾问团建议下，又从国内空运一批新兵，名谓驻印远征军，以孙立人为军长，中国军队在兰姆伽受训后，扩成新一军和新六军。毕业于黄埔1期的郑洞国为总指挥。杜聿明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驻防昆明，并兼任昆明警备司令。在印度，由美国总统直接派遣的史迪威任总指挥。

滇康缅边境游击战的战略与作战

原则

1943年，中国重新部署滇西防务。一是在楚雄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初任司令长官为陈诚，继任为卫立煌。除原有11集团军外，复调第9集团军霍揆彰部。二是在大理成立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调郑坡为总指挥。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属远征军第11集团军作战序列。

建立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的战略意义

据郑坡的回忆手稿，之所以要成立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原因有三：

一是抗日战争的总形势从防守转入攻势。1943年初，美军在太平洋转入攻势。2月，中、美、英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三国会议，中国方面有何应钦参加，共同商讨反攻缅甸、恢复交通线的具体计划。滇康缅边境的战略反攻部署是，中国远征军从滇西出境反攻密支那，中国驻印远征军可以从印度取道利多出击，从两面包抄夹击，彻底歼灭日本占领军。成立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是战略反攻需要。

二是在滇康缅边境有广阔如一个省的区域，包括自怒江北部缅甸境内密支那、拖角，中缅边境片马、固东、江苴街、腾冲、龙陵、芒市、陇町等地，其中有的是属于中缅未定界，有的是英

帝国主义侵占或渗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还有的是日寇占领或控制的地区。这么大的一个地域，地势与气候又非常复杂，到处是崇山峻岭，雪域与热带气候并存。居住地区的民族又复杂，有汉苗杂居，更多的是土司控制下的独立王国。其中较大的少数民族有荣山、蒲曼、俅夷、怒夷、摆夷、傈僳、康巴等。在战略反攻前必须团结各少数民族部落，协调和解决许许多多现实问题，以保证战略反攻的实施。

三是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的反攻，牵制、干扰敌军，防制敌人向滇康边境逃窜。

游击总部设参谋、副官、政治、军医、军需5个处。下设5个纵队，其中第4纵队为戴笠成立的滇西挺进纵队改编，其余都是郑坡的援缅部队所扩编。随部队行动的有美军联络参谋组，美军医疗队，军令部二厅情报电台，国际问题研究所，缅甸情报站等。可见，此游击战是武装现代化的游击战，是中美合作并肩作战，是一支既能游击战，又能防制战役，还能阵地战的游击部队。

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初设于大理洱海三塔寺。1943年秋驻云龙，位于片马和大理之间，更便于指挥游击区的作战行动。后再移到鲁奎。鲁奎是片马入滇的重要渡口。对江的鲁掌离日占地

片马仅60里。

郑坡的游击作战七原则

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一建立，作为总指挥的郑坡第一件事就是招收边境青年300名，举办滇西游击干部训练团，组织地方武装。郑坡自任干训团团长，副团长是李根源，教育长是宋荫团，副教育长董仲篪（滇康缅游击副总指挥）和夏日长。邀请西南联大的潘光旦、费孝通、田汝康等教授前来授课。总指挥郑坡亲自讲课，阐述游击作战七大原则。

一是游击战的定义。游击战是流动性的攻击战。始终以进攻为着想，防御也是为再进攻的准备。离开进攻的思想，就失去游击部队生存的意义。

二是游击战的任务。发挥辅助正规军攻击、防御、退却的功能。具体任务有扰乱敌后，破坏交通运输，袭击增援部队，牵制前进力量，收集情报。

三是游击战的战术。“聚，散，转，动”四字诀。“聚”就是集中攻击；“散”就是分散扰乱；“转”就是转移兵力；“动”就是灵活行动。以四字诀保持作战主动权，计划出神出鬼没的战斗方案，如布疑兵声东击西，迂回退却诱敌围歼，反复包围内外夹击，截击成段各个击破，分进合击捣敌据点。游击战必须确保通信联络，规定行动时

间地点，做到聚得拢，散得开，转得活，动得快。

四是游击战的战略。游击战的战略属于持久战，战术属于速决战，每次速决战后继续乘机再战。多行巧战，不打硬仗，保持战力。敌强我避，敌少我歼，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动我袭，敌息我扰，积小胜为大胜。避不是不击，退不是逃跑，是化被动为主动，为再进攻作准备。

五是游击基地的建立。基地就是游击队的后方，粮弹装备的补给站。补给库应分散隐藏。建立基地的首要条件是便于封锁，如与敌区有隘口、渡口相隔，若能通大后方则更理想。力求避免在基地附近作战场以求隐蔽。

若基地遭敌围攻，集中兵力歼其弱路，挫其锐气；分散兵力扰其强路，阻其前进；转移兵力反歼于有利地带，使其合围解体。如基地被敌占领，则断其交通补给，先扼敌于孤立，再反包围解决之。

六是游击政工的开展。游击区的民众是游击队的耳目和手足，民众靠政工去动员。获得民众信任的前提是严明纪律，要尊重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禁止占民众便宜；要言而有信，运输伏行程最多不超过3天，并给予待遇；要求民众帮助时以鼓励替代强行，充分考虑他们

的困难。用事实揭露日寇暴行以同仇敌忾。政工员应先部队而到，后部队而退，或留部分做各地联络。

七是游击部队的编训。游击区就是我们的训练场，游击部队的训练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每次战斗结束都要分析成败原因，奖励有功者；在新兵只粗知作战基本常识的现实中，新兵主要靠老兵帮带，编队须新老兵夹杂；绝对禁止对新兵粗暴，当地新兵架屋的土办法能使我们随地安营，他们爬山越险的特有技巧更适合本地行军作战，他们熟悉当地，是最好的向导，新老兵优势互补才能提高战斗力，只有让新兵感受到部队的好才可能引来更多的新兵。

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部队在战略反攻前的工作

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初建时，总体战局是敌我力量势均力敌，也意味着我军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临近。郑坡作为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总指挥，从军事和政工分别作出战略部署，以迎接主力部队的战略反攻。

军事部署

将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分为内线和外线，腾冲、龙陵、上下猛连等为内线，主要任务是破坏敌军交通运输及通信联

络，收集情报，袭击敌增援部队。敌军为了确保交通与通讯畅通，必须出来扫荡，我们乘机围歼敌扫荡部队，务必一网打尽。内线由副总指挥董仲篁指挥四、五两个纵队。

马片、拖角、罗孔、浪漾等为外线，总指挥郑坡在总揽全局的同时，指挥外线的一、二两个纵队及步兵一个团、一个营。游击总部留一个团的机动部队，以防敌军穿越怒江扰我后方。

外线有辽阔的后方，主要是监视敌军的活动，围歼其出击部队，保证我运输队和增援队安全通过外线而转入。外线的敌人，除了日本鬼子，还有英国殖民军队及其雇佣军。从缅甸蚕食滇康是英国殖民者的一贯野心，英国殖民者认为这是英国的土地，他们蛊惑边民与游击部队对立，又武装袭击游击部队，给游击战争的开展带来许多阻碍，也给中国军队带来一定损失。

郑坡多次到昆明与英使馆武官交涉无果，又通过外交部照会英方，才使英方不致明目张胆。尽管英帝国主义施用各种两面派手段，由于纵队政工队“做了宣慰工作”，才把各土司管辖地区安定下来，确保外线长达 200 余里运输线的通畅。

每个纵队设有永久基地，支队设有临时基地，这些基地都

以村落为主。为适应战略反攻，纵队增设准备基地一个，在深山老林的险要处预搭帐篷，支队也有对应的部署。

政治工作

为更好地开展政治工作，游击总队专门建立了两套班子，一套设在纵队或支队，称为政工大队和政工中队；另一套设在部队未达到的地方，称为政工站，政工站有固定和流动两种。宣传的重点，一是说明日寇是外国人，是来侵略我国土地，残害我国民族的，我们是中央军，都是中国人，抗日就是保卫民族保卫家乡。二是中央军有纪律，不取民间一针一线，供差、购物均有代价，中央钞可向政工工作站购买盐布针线等物。三是宣传日寇打退后，还要整理交通，开设商店、医院，那时物有店购，病有院医。

政治工作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开座谈会、联欢会，询问疾病赠送医药，赠送食盐针线等。二是选干练边民为乡保长，给与物质待遇或一定薪给。三是重酬情报有功人员，鼓励他们收集情报的积极性。

为增强政工的有效性，郑坡还走访讨教精于人情世故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建议是：边民注重现实，感情鼓动比民族大义更有效，要多给予钱财资助，特别是他们送来东西时一定

要加倍酬物，这样一传二，二传三，自然会有很多边民来亲近拥护。郑坡发现这一招确实很灵。

郑坡手下有一名张校尉，在日军占领区收集情报时遭日军逮捕，当地一老人得悉后说是他的儿子，要日军放人，日军说没法证明，不予放行。老人回家带 6 岁的孙子去喊张校尉为爸爸，才救了出来。这则故事表明游击总队政治工作的扎实，并记入了《曲石诗录》选集：

欲救张校尉，
姑且当儿呼。
老人义与智，
可编教科书。

为了做好土司等地方首领的工作，郑坡邀请了曾在班禅行辕负责招待的刘家驹先生，通过宗教开展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游击总部最终成功收编不少由地方土司为核心的部队。其中鲁奎土司段浩支人数达 800 人，郑坡曾住在他家。还有德钦海正涛支队、维西支队、碧江支队、老街独立大队、中甸独立大队、贡册独立大队、福贡独立大队、贡西独立大队（由岗房古浪合编）。其中鲁奎段浩支队（六库支队）、碧江支队、老街独立大队为后勤运输部队。

政治工作的美好成效，为随即而来的滇西反攻奠定了必不可



/ 本文作者洪永珊(右)与汪校芳(左)。

少的根基。

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部队在战略反攻中光复片马

1944年8月5日，反攻滇西开始。蒋介石电：“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系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全局扭转之所系，务希各级将领，竭智尽忠，达成使命。”此电文表明当时反攻滇西战役的重要战略地位。

为更有利于指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也由楚雄推进到保山。反攻滇西的战略部署是分三路进军：

左路为宋希濂的11集团军，攻惠通桥至龙陵；中路为关麟征的第9集团军，攻惠人桥到腾冲；右路由郑坡率游击部队中的

正规军，目标为片马、拖角一带。

为适应游击战到阵地攻击战的转变，郑坡对所率部队作重新编制，未能完全成立的二、三两纵队并入于第一、五两纵队。

郑坡的目标非常明确，必须攻下日寇的片马据点。这是由于片马是缅甸入川、进滇、过藏的要道，西面有路可通密支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旦攻下片马，腾冲的敌军会受到我军侧背包围。

片马就是敌军务必死守、我军务必攻下的必争之地。可片马的地形特征是一个垭口，易守难攻，前临千仞峭壁，视野开阔能瞭望数十里，只有山间曲折小道可行，部队无法展开进攻。

郑坡只能利用地形死角率部队接近敌据点。先于夜间拔去敌军在道上所埋的用以替代地雷的迫击炮弹，拂晓以纵队连续冲击。中国军队异常英勇，一度占领垭口。但日寇利用起伏地带构成纵深梯形阵地，并在周围各个要点筑上大小土石，子母堡垒，凭险固守，占领垭口不久又被敌从后面制高阵地消灭，进攻多日仍无进展。

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官兵非常勇敢，前线伤员不断送到茶坡美军野战医院治疗。突然，野战医院给总部送来一份备忘录，宣称所收官兵伤员，伤不在前身而在后背，显系官兵退逃致伤，总部派人到医院仔细核对，在70多名官兵中，有8人伤在背后。此系第一支队谢晋生游击区支队长刘知仁支队所属。后经查明，刘知仁求胜心切，他连番组织敢死队猛攻，官兵在敌人阵地匍匐向前，日寇居高临下向我军射击，故致背部受伤。美方理解后纷纷赞夸中国军队的勇敢精神。总指挥与野战医院的美方医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直接攻下片马的难度实在太太大，只能采用迂回战术。郑坡命一个团不断佯攻监视正面敌人，亲率余部沿江东岸北行30余里，绕道贡山北部，越过中马侧背，自阿兴地过怒江而至山麓称夏。

称戛江水奔腾，木船无法渡江，只能利用当地人的溜索济渡。溜索就是用竹或藤结成的绳子挂在两岸岩间，人赖卡于索上的溜板往来。

在称戛休整一个晚上，发现这处只有数十户傈僳族居住的小村，英国人建有教堂，还有居民无人不知其名的牧师，可见英国人渗透的深入。第二天一早，部队急行军越过山巅接近片马，沿途既风景如画又危险异常，不时有官兵失足落险而牺牲。越往上登气温越低、行进越难，马匹也没法通行，一切武器弹药全靠人力运送，从山下的炎热到山上的严寒，这样的山道上一天只能行进70里。翌日，进途更加艰难，但必须行进100里方可宿营，经过一个千仞峭壁，湿滑的岩崖间仅有一条尺许宽的岩驳冰道，滑溜异常。向导告知，前进途中不能驻足久息，不然会身体僵硬直接冻毙；不能低头俯视，不然腿一软就粉身碎骨。牺牲了若干官兵，终于穿越峭壁，眼前已是银峰环立的雪山了。

终于负重登上了4075公尺的垭口山颠，点燃一支烟，住口即熄，表明空气异常稀薄。部队不敢久停，急急向山的阳面下坡。阳面多是久年流水裂成的半圆岩块，即使是倒身逆爬而下也很不容易，常常一足伸出抵不到下一岩块，真是上山容易下山

难。

半山腰有居民20余家，地名叫沙湾，部队就地宿营。后再推进至古浪，离片马仅二三十里了，古浪有茶山族居民四五十家，生活比较富裕。

郑坡的作战思路是全线发动，各点围攻。一是派遣小分队搜索英帝地方武装，将其阻止在围攻线外，以防捣乱。二是密切关注密支那，防范敌军反包围。密支那是缅甸铁道北终点，东行300里即到片马，交通顺达。三是拖角、罗孔、浪漾各地与片马同时发起攻击，以防敌军相互增援。

敌军对片马的布置是，垭口为第一道防线，垭口后三四里高地为主阵地，这一阵地可控制东西北三面的射击，高地下即村落，村落后为警戒阵地。守片马的为桃源少佐所率的一个大队，属缅甸派遣军腾冲分遣旅团。

郑坡的部署是分东北西三路合击。北路主要是攻击敌军的主防阵地；东路攻击垭口，目标是摧毁敌军的前进阵地；西路为阻断敌的退路。考虑到敌军有炮兵中国军队没有，阵地战对中国军队不利，西路和北路又有广阔的外围阵地，擅长于游击战的郑坡，让全军官兵达成统一，收复片马采取的是“吃瓜儿”战术：先耐心地一层又一层把瓜皮（外围阵地）刨

光，再一口一口地把瓜肉（核心阵地）吃下。以小分队在夜间摸索袭击敌人的各个散兵壕，同时扰击他们的核心阵地。后敌军也分遣搜索队对付我们的搜索队，时常发生遭遇战，每次遭遇战死伤大概为我三敌一的比例。

如此刨了两个星期瓜皮，敌军兵力消耗严重，终至中国军队进占了村北的高地，其核心阵地在中国军队的瞰制下，敌军恐被中国军队合围聚歼，于当夜放弃片马，向腾冲溃逃。中国军队捡获敌遗弃迫击炮弹数十箱，士兵则剥得其尸体呢大衣数十件，并在尸体中捡得其家书及照片等，译阅后知其国内人民生活已到穷途。

片马克复后，随后拖角、罗孔、浪漾一线亦相继克复。攻罗孔为黄燮堃支队。黄燮堃为南洋华侨，抗战初自日本士官学校辍学回国参战。他曾用日语喊话，宣告片马已攻下，马上有大军集中来围歼，寇兵无心恋战而自撤。

全线战役经过20天结束，中国阵亡支队长吴若龙等以下官兵200人。吴若龙是攻克片马的杰出英雄。

这时得到第9集团军通报，红木树、惠人桥等敌沿江据点均为中国军队收复，中国的内线交通已完全畅通。

从黄埔军校第三分校走出来的几名抗日将士

□ 钟燕林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各地青年的爱国热情高涨，积极要求抗日，为培养更多抗日将士，黄埔军校开始在各地设立分校。1938年9月，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在江西瑞金设立。学员学习的课程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还有步兵操典、陈中要务令以及三民主义，等等。至1945年11月，第三分校奉命裁撤，在校受训的第20期学生并入成都本校第21期继续受训，学校随之停办。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创校时间虽短，但规模比较大。抗战期间物资缺乏，办学条件艰苦，但全体师生怀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习得了过硬的军事本领，锤炼了刚强的意志，在战斗中英勇杀敌，成为抗日战场上的骁勇战将。

黄启东：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黄启东，1891年生于湖南省平江三阳。保定军官学校第1期毕业。历任四川新军巡阅官、参谋官，江西吉安县长，师教导队教育长，黄埔军校三分校上校大队长，第2旅参谋长，国民革



/ 黄启东。

命军少将旅长，23师少将参谋长。

1938年，沪宁失守，日军数十万之众企图进犯徐州。国民革命军23师奉令扼守豫东、鲁西之郛城、菏泽一带，防线较长，所部团、营、连长多被抽调至武汉受训。23师参谋长黄启东昼夜巡查，督促全师将士百倍警惕，坚守阵地。5月，敌军精锐师团及一旅团，在空军配合下，以装备的绝对优势倾巢来犯。黄启东与师长李必蕃率部血战数昼夜。后因伤亡过大，23师奉令转移至菏泽整补部队，并继续阻击敌人。

这时，日本侵略军乘23师余部刚到菏泽部署未定，驱其步兵、骑兵、炮兵、化学队和摩托

车队，在坦克和装甲车掩护下，发起突然袭击，层层逼进，气势汹汹。黄启东与师长李必蕃抱定与菏泽城共存亡之决心，临危不惧，迅速变更战术，实行坚壁清野，主动分兵阻击，鏖战数昼夜，在枪林弹雨中，死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不久，日军大批援兵蜂拥而来，23师粮尽援绝，情况十分危急。黄启东在师长李必蕃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慷慨陈词，力主死守不渝，牵制敌军。

激战至5月15日，李必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自上阵指挥正面抗击。黄启东率领工兵营和特务连独当一面。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李必蕃腹部中弹，流血不止。部下急将他抬下战场，行至城南王庄时，伤势恶化，李必蕃以兵败城陷，悲愤欲绝，勉强挥笔书下遗言：“误国之罪，死何足惜，愿我同胞，努力杀敌。”乃自杀殉国，尽了军人天职。黄启东愤不欲生，以爱国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身先士卒，率余部与敌血战到底，冲锋十余次。在喊杀声中，他头部中弹，犹不退却，命卫士陈烈（湖南湘



/ 黄埔军校第三分校旧址（瑞金象湖镇杨氏祠堂）。

潭人）背负，坚持在前沿指挥。其时，该师野战医院院长、平江同乡李少甫带领救护队，一再催促黄启东快上担架，黄启东坚决不从，摆手示意李少甫快去抢救其他伤员，并吃力地用微弱的声音对李少甫等人说：“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未几，黄启东终因流血过多，为国捐躯。临终怒目而视，死不瞑目，时年46岁。

平江文史专家彭以达称：“当时噩耗传回，平江举行盛大追悼大会，由黄宪藩作词的歌曲广为传唱：‘屈子汨江，忠义之

乡；抗战最烈，黄参谋长；壮士誓死，热血满腔；愿吾后起，复仇兴邦！’”

黄启东治军严谨，富有正义感，同情劳苦大众，禁绝官兵扰民。1930年冬所部驻江西泰和，“以其暇督兵修公园马路，读书习字，日有常程”。他平生治学也很勤敏，酷爱古籍，公务之余，常钻研孙武兵书、诸子百家。黄启东堪称少有的文武兼资之将官，人称“儒将”。他为国捐躯的噩耗传至三湘四水，省长长沙和故里平江各界人士，怀着对他深深的敬意，纷纷集会，隆重追悼。湖南各界为追悼李必

蕃、黄启东发表了大会宣言。宣言中说：“陆军23师李故师长必蕃、黄故参谋长启东，此次在山东菏泽一役，英勇殉职，其死之惨，牺牲之烈，固然值得我们悲痛，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看，也值得我们欣慰，我们歌颂。”“一部民族史，可说是几千个忠义士的成仁史。”“菏泽一役，忠勇殉职，与其说他是牺牲，毋宁说他是成就，而这种成就，不是他两个人的成就而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成就。”

1985年，平江县政府报湖南省政府批准，追认黄启东为抗日烈士。



/ 黄埔军校第三分校旧址（瑞金象湖镇杨氏祠堂）。

过镇中：抗日疆场方显黄埔军人本色

过镇中，1922年2月26日生于江西抚州。1938年夏季，日本侵略者进犯抚州。过镇中加入抗敌宣传队，与同学一道在抚州各地号召群众参加抗日。他耳闻目睹日寇的暴行、抚州大地民不聊生，决定投笔从戎。1938年秋季，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第17期步科。一年后，过镇中随校迁到江西省瑞金县，重新编队第17期步兵科，在学校系统学习军事科目。1943年春季，过镇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上饶抗日第三战区国民军第100军19师55团8连当政治指导员。

1943年夏，过镇中所在部队

被调到临川区东馆镇驻守。当时，日军第11集团军7个师团、1个独立混合旅团、4个伪军师团大举进攻湖南常德，国民党第九战区以16个军的兵力进行顽强抵抗。由于常德战役吃紧，过镇中所在的第三战区第19师官兵从临川区东馆镇调至常德参加会战。

在常德会战中，过镇中大大小小经历了20多次战役，他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在湖南湘西与日军激战3昼夜的一场战斗。当时，过镇中所率领的只有不到一个营的兵力，与兵力数倍的日军遭遇。在战斗中，日军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中国军队阵地，企图攻占战略要点，过镇中与300余名官兵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战斗到最后，由于

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差，兵员疲惫，300名官兵只剩下18人。

在日军的炮火之下，过镇中将18位勇士召集过来，发现已是弹尽粮绝。过镇中与战友上好刺刀，准备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就在这时，增援部队赶到，将日军杀得尸横遍野，过镇中等18人侥幸活了下来。

回忆这段历史，过镇中总是泪花闪烁。他常常讲，在抗击日军时，中国将士士气高涨，为保家卫国，不惜血洒疆场。生活在今天和平时代的人，难以想象当年那种战火纷飞的情景。

王维本：铸就无法跨越的防线

1916年，王维本出生在浙江永康县象珠镇的一个农户家庭。

1938年，他进入黄埔军校三分校军官训练班8期学习。1941年至1942年，他参与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在预10师29团任中尉侦察排长并协助团副工作。1949年8月，随傅作义起义后参加解放军。

1942年，从元旦凌晨5时左右开始，王维本所在的国民党第10军预10师张越群团所在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正面防线，不但要经受日本精锐第3师团石野联队的地面进攻，同时还经常遭受日本飞机的扫射轰炸。

日军的飞机每次都是3至4架一批进行扫射轰炸，从早上到晚上基本就没有停过。当时情形十分危险，有一次，传来一阵机关枪扫射的声音，王维本感觉到头上一凉，帽子被打飞了。接着“轰、轰”几声巨响，王维本感觉到大地在震动，接着溅起的泥土打在头上和身上。他用手支起身子，将身上的泥土抖落，然后抓起落在一旁的帽子，帽子的顶部已经被飞机的机枪打了一个很大的洞，他拍了拍帽子上的土，戴上、扶正。

1月2日凌晨6时，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向3营所在地枫树山、雨花亭攻击，并以骑兵冲击3营阵地的制高点七里庙高地。鉴于战场形势，团指挥所从黄土岭当时的中央无线电机厂（现长

沙政治学院内）向黄土岭以西高地上转移，但从凌晨6时开始，就遭到了敌机的多次扫射轰炸。

上午约10时，不知是想看清点还是藐视中国军队没有高射武器，一架日军的侦察机以超低空进行盘旋侦察，低到甚至可以看见日军驾驶员的样貌。王维本看到敌机如此猖狂，怒不可遏，他背起一个枪榴筒来到扫把塘大道边的一个大石碑坊下，把枪榴筒架起来，在敌机掠过的时候开了火。敌机先是晃了晃，冒出一股烟，紧接着掉下了一块木胶片，向南歪歪斜斜飞去，不多时就看到机舱里跳出一个伞兵，后来就看到敌机坠毁了。后来，那个跳伞的日军侦察机机师也被俘获。

就在王维本打下日军侦察机不久，日军炮兵部队开始向29团指挥所所在的黄土岭覆盖轰击，日军的骑兵部队也开始向29团指挥所阵地突击。

团副曾友文命令警卫人员掩护团长先撤退，然后带着侦察排战士和部分警卫冲上了阵地，对进攻的日军进行阻击。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日军骑兵部队轮番进攻，由于地势的原因，日军的骑兵部队机动性不强，王维本和战友们用手榴弹和机枪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后来，日军开始用步兵炮轮番轰击，接着又向王维本所在阵地发射了烟幕弹和毒气弹。由于

措手不及，也没有防毒面具，很多战士吸入毒气都开始发晕，王维本命令一个战士收取各人的水壶及毛巾去打水，让战士们用湿毛巾护住口鼻，即便如此，还是有些战士失去了战斗能力。

3日开始，日军主力开始攻打冬瓜山、红头山一带防线。

王维本等人在阵地上修建了许多明暗工事，交叉的火力造成日军很大伤亡。为突破阵地，日军向阵地投掷了燃烧弹，燃烧弹把许多在明工事的战士卷入了火海，这些战士就被活活烧死。日军为了摧毁暗火力点，开始使用“肉弹”攻击：遇到阵地的暗火力点时，日军就出动敢死队，用烈性炸药绑在身上前仆后继地向前冲，直到炸飞这些暗火力点。高地被日军占领时，整个高地被削平了一截。

为了夺回阵地，王维本他们也组织了十几支敢死队，在集中20多挺机枪的掩护下，冲向冬瓜山。敢死队身绑炸药，趁着日军还没有稳固阵地时，向他们攻击。敢死队员看着人多的地方就冲上去，然后拉响炸弹，与日军同归于尽。当时，阵地上除了硝烟之外就只有残肢断臂，惨相如同修罗地狱。到整个战役结束为止，双方白刃拉锯11次，中方最终夺回了阵地。该处防线，28团除50余人幸存外，其余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不简单的陪都——抗战期间的重庆

□ 白孟宸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南北的大都市，如北平、上海先后沦陷，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南京已经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在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中，点明了“迁都”的意义：“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在此之后，重庆逐渐成为中国战时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经济中心、军工生产中心以及科教文化中心，也成为日军最希望夺取的中国城市。

但是，在八年抗战中，重庆虽然遭受长达5年多的恐怖大轰炸，但是日军地面部队从未接近重庆，这是为什么呢？

山高路远的陪都

1940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正式确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在这份命令中，也提到了重庆作为陪都的一些有利条件，如“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巩固西南，控扼双江，尤为国家重镇。”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

的交汇处，东临三峡，西近成都，南达滇赣，北接汉中平原，是川康锁钥之地，水陆交通方便。同时重庆又占有绝对的地利，它背靠青藏高原，东南北三面有巫山、娄山和大巴山作为屏障，这些山脉平均海拔均高于1000米，易守难攻。而且重庆段的长江两岸，高耸的峭壁夹着湍急的水流，使得使用江上舰队逆流而上发起攻击相当困难。

从宋末元初开始，要攻击重庆有五种路线。首先是从陕西越秦岭，走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蜀道向南直达重庆。第二个选择，是逆长江而上，经宜昌等地，一路走水路抵达重庆。第三则是走湘西入贵州，再抵达重庆。第四种选择，是走衡阳一路，先夺取广西，再入贵州和云南，包抄重庆。最后一个选择，就是从云南出发，先占领成都，再经嘉陵江顺流而下，抵达重庆。

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开始，日军的攻击，基本围绕以上五种路线进行。但是由于重庆深居西南群山之中，每一条路线，无论是翻山越岭，还是顺河作

战，都有大量可供坚守的天险，加上中国军队不惜代价，死守各锁钥要点，日军最终没能接近重庆。

在抗战开始后，日军曾图谋占领陕西，但是面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胡宗南掌握的重兵集团，凭借黄河和黄土高原建立的坚固防御，日军始终不能放手经由蜀道向川渝进攻。在长江方向上，中国海军和陆军沿江节节抗击，虽然在1940年5月丢失了宜昌，但是日军始终不能顺江而上。尤其是1943年5月至6月进行的石牌保卫战，15万中国军队依托石牌要塞，痛击妄图越峡西进的日军，创造了抗战中少有的大胜。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在此战之后将其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3年日军围攻石牌要塞，也是抗战期间日军对重庆威胁最大的一次进攻。

第三、第四两条路线，都要经过湖南和贵州，这两个省份的自然条件均是利守不利攻，而且民风彪悍，抗战意志强烈，特别是贵州，号称地无三尺平，特别限制在进攻中极度依赖重

装备的日军发挥战力或者展开快速迂回包抄。因此在抗战期间，虽然围绕长沙、衡阳等地进行了多次惨烈的会战，中国方面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是日军的进攻能力也被逐渐耗尽，直到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日军一举占领洛阳、衡阳、桂林等中国军队坚守多年的要冲，却再也无力向重庆扩展进攻，而是满足于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已。

从云南包抄大西南的战略，曾经在元初被蒙哥、忽必烈等蒙古大汗使用过，起到了惊人的效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日军曾险些攻占怒江上的交通枢纽惠通桥，但由于中国方面及时将桥炸毁，得以在千钧一发之际保住怒江防线。

由于重庆周边的天险众多，加上中国军队因地制宜，据险坚守，日军从五个方向上全都无法对重庆形成有效的威胁，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丧心病狂地使用恐怖轰炸方式，试图瓦解大西南军民的抗战意志，甚至试图通过空中入侵，毁灭重庆。

屹立不倒的城市

1938年12月，日军首次侵入重庆上空进行轰炸。从1938年底到1943年8月，重庆共遭到218次恐怖轰炸，日军前后共出动战机9513架次，投下21593枚炸弹。整个重庆有11889名军民遇



/ 抗战期间的重庆。



/ 重庆码头上运送物资的船只。

难，14100人负伤，17608栋房屋被毁。

1940年8月19日正午时分，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正在重庆街头拍摄一部有关中国抗战

的纪录片。但是，街道的平静突然被尖利的防空警报划破，斯科特抬起头，看到城内各制高点上挂出了代表空袭警报的红色警报灯笼。此时斯科特身处



/ 被轰炸后的重庆，消防人员在街头救火。



/ 长江对岸被轰炸的重庆烟雾弥漫。

的江北是重庆的工商业核心区，也是日军每次轰炸必然要重点袭击的地区。已经有了丰富防空经验的重庆百姓，一拨拨前往龙门码头，他们一边焦急地望着天空，期盼日机晚些到来，一边眺望码头，希望早些上船。

斯科特遭遇的，是1940年8月19日、20日日军分3个攻击波

次，8次对重庆核心区进行的恐怖大轰炸。根据重庆城志，8月19日凌晨日机已经开始轰炸，斯科特遭遇的这次轰炸中，134架日机向重庆投掷了262枚高爆炸弹和52枚燃烧弹。重庆辞其解等30多道街巷和胡同被完全焚毁。第二天，152架日机再次对重庆进行轰炸。据事后统计，

两天之中日军先后出动289架次飞机，投下670枚高爆炸弹和273枚燃烧弹，342名军民遇难，332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上万市民流离失所。

但就在这次规模和对城市的破坏度远超过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的灾难之后，《大公报》记者却在采访中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地处都邮街的“广东大酒店”已经被炸塌大半，但老板出门看着周围的废墟，并未痛哭流涕，而是认真地在门上贴出告示，广而告之“本酒家明日照常开业”。

面对日寇的恐怖轰炸，重庆的抗日军民并没有气馁，而是在废墟上逐渐尝试建立起近现代化的防空体系。在大轰炸开始前，重庆人并没有灯火管制的概念，从1939年开始，重庆进行了相当严格的灯火管制。当然，随着发电设备疏散和战损，从这时开始，重庆的大部分市民，甚至军工企业，都依赖桐油灯作为主要照明工具。

1939年5月，日机对重庆进行了大轰炸，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此时重庆还没有建立起民防组织，在大轰炸之后，只能临时从重庆六个补训处调来几万人进入市区帮助救灾。最初补训处不愿派人，卫戍司令部竟然提出重金悬赏，规定任何人从江中挑一担水，便奖赏1个

大洋，结果数万官兵踊跃挑水，却没人愿意深入火场。直到火势渐小，才摸进废墟，名为抢救伤员，实际是坐地起价，必须让伤员或者其家属交出真金白银，才动手救灾。

在吸取1939年5月大轰炸的经验后，为了能够及时救灾，重庆市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组织民防队，每当空袭结束，工厂开工，商人开市，学校开课。而民防人员则穿梭在瓦砾和烟火中，救火救灾，抢救伤员，赶修设备。集中在长江、嘉陵江临江河谷中的一大批兵工厂，甚至在日机临空的情况下，照常开工生产。

当然，与英国伦敦和苏联莫斯科相比，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在防空方面，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中，有些的根源在于中日工业基础的巨大差距，有些则源于国民政府和重庆市政府缺乏足够的执行力。

日益增强的空防

1937年9月1日，重庆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但是此时重庆的防空系统由刘峙控制，防空司令部形式上设立了通讯队、担架营、防护大队、工程大队、警报球台、对空联络哨等部门，但实际上各部门大多由重庆卫戍司令部借用，一套人马挂两



/ 庇护所外抬担架的士兵。



/ 轰炸重庆的日机。

套牌子而已。在这样的空投司令部“领导下”，重庆的防空完全处于盲目状态。除了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空军情报总台通过派驻武汉的情报分台，以及汉渝铁路沿线的地面瞭望哨传来零星情报外，别无任何有效的

情报来源。这样一来，在5月3日、4日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规模恐怖轰炸时，重庆全城预先毫无知觉，当5月3日下午日军27架轰炸机组成编队侵入重庆时，陕西街一代的繁华商业区人头攒动，结果这一片区域20多条街道中竟

有19条被完全炸毁。经过两天轰炸，重庆近半房屋被毁，据时人回忆，在未倒的电线杆上，经常挂有人肉残肢，死里逃生的人将亲人的尸体拖到马路上，趴在上面痛苦欲绝。

为了提高重庆的防空预警能力，1940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第6工作队正式成立，一面接受和破译日本航空兵的各种电文，一面搜集从日军基地到重庆沿线气象等方面的情报。从第6工作队建立开始，重庆防空体系拥有了“眼睛”和“耳朵”。当时，在工作队驻地浮图关徐家坡，与空军第1路上清寺指挥部间埋设了专线电话。每当日军出动大编队袭击重庆，第6工作队便会派出人员到空军司令部联合办公。

但是，即便有了一定的情报收集能力，重庆的防空仍然可以说是漏洞百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是重庆各级“蛀虫”拼命通过防空工程中饱私囊。1941年6月，由于日军有意识地延长空袭和防空警报时间，加上用作防空洞的大隧道在设计 and 建造中偷工减料，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最初是大坪朱家花园岩下防空洞，防空司令部为了修筑这座防空洞，拨款40万元。当防空洞开挖了3米以后，突然露出一个超大型天然岩洞，可

容纳上千人。此时恰逢贺国光接替刘峙担任防空司令，二人竟然商定，刘峙报销28万，贺国光报销12万，这些经费大部分落入大小贪官腰包，结果大隧道除了几个出口外，竟然缺乏有效的通风设备。

1941年6月5日傍晚，日军再次采用“疲劳轰炸”战术，用小编队甚至单机乘夜色轮番袭扰重庆，并长时间在重庆上空流窜，致使防空司令部不敢结束防空警报。这样一来，数万重庆军民长时间挤在长达数千米的大隧道内，十几个小时无法出洞呼吸。洞内人员为了冲出洞外呼吸空气，在洞口造成了踩踏事故。窒息加上踩踏，整个大隧道中几乎无人生还，事后从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等三个出口，清理出上万具尸体。

虽然与大隧道惨案有关的人员，包括刘峙在内，基本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但是重庆的防空系统，在1942年以后确实有所加强。第6工作队逐渐摸清了日军空袭集群的来袭路线，并测算出各段航程所需的时间，结合破译的电讯情报，指导防空司令部在重庆全城发布警报。

空袭警报包括四种，首先是通报日机起飞的预行警报，这种警报用三角形绿色灯笼表示，前后持续约1个小时。当日机经过宜昌地区后，防空司令

部在重庆全城发布空袭警报，并通知周边机场放飞所有截击机。空袭警报包括连续鸣放一长一短，持续三分种的汽笛声，以及上文提到的红色大型灯笼。在空袭警报响起后，市民一般会有1个小时的时间用于疏散和避险。当日机抵达重庆上空时，全城汽笛连续短促鸣放，持续3分钟，并挂起并排两个红色大型灯笼。在紧急警报发出后，行人应该迅速躲进最近的防空洞，5分钟后整个重庆除值勤人员外，任何人员和车辆不得私自行动。

1943年8月23日之后，日本轰炸机停止了对重庆的轰炸，此时重庆已经建立起比较可靠的防空预警和民防体系，普通市民也在防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轰炸并没有毁灭重庆，更没能打败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但是，对于抗战期间的重庆百姓而言，大轰炸并不是最难熬的考验。

压力重重的生活

在承受日军恐怖大轰炸的同时，重庆也在承受大量人员和单位涌入带来的压力，重庆的整个规划因此逐渐发生改变，开始向周边区域快速扩张。1937年抗战爆发前，重庆人口不足40万，1938年重庆人口增至53万人，到1944年重庆人口已经突

破百万。迁往西南的企业中有 1/3 落户重庆，这样一来，重庆一举增加了 400 多家企业，工矿企业总数达到 1690 家，职工总数近 10 万人。

这些迁到重庆的企业，被迫在极为恶劣的生产环境下开工生产，企业员工甚至是领导，都必须适应简陋甚至恶劣的生活条件。住房空间紧张，是战时重庆最大的问题之一。

1938 年 3 月 1 日，金陵兵工厂从南京迁到重庆江北簸箕石复工。在抵达重庆之初，全厂上下，上到厂长李承干，下到随厂家属，每人领到一定数量的竹木稻草等原料，自己动手修筑简易工棚作为宿舍。据当时在第 21 兵工厂（前金陵兵工厂）的职工回忆，简陋的工棚甚至连遮风挡雨都做不到，唯一的优点就是遭到日机轰炸破坏后，能够在半天之内重建起来。据统计，在 1939 年前，重庆突击建造了总面积达 195 万平方米的简易工棚，全市有近 1/3 居民住在工棚中。这些棚户区内部人口密度过大，卫生条件极差，疫病流行。到 1940 年，整个重庆已经成为一座总面积超过 320 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城市。

除了住房条件简陋外，大量人员涌入重庆，以及战时金融投机行为的存在，使得重庆的物价快速增长。在抵达重庆

之初，包括老舍先生在内的一大批北方人，纷纷表示重庆的物价是便宜的，“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但从 1940 年开始，重庆的物价已经让普通家庭被迫勒紧裤带过日子。根据统计，1945 年重庆的主要商品价格比 1937 年初提升了 1500 倍以上。

为了能最大限度从大后方剥削利润，国民政府对川康地区的粮食、糖、油、盐、烟草等生活必需品乃至鸦片，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专卖的方式。冯玉祥将军曾经在报纸上撰文，批判专卖制度：“听说这里（内江）的食糖设有专卖局，专卖局局长也是一位与特务有关系的人，大发横财，弄得全四川的人都起来反对……后来抢钱抢得太不像话了，这才把抢钱的局长换掉。”这位冯将军口中的“抢钱局长”就是孔祥熙的心腹，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局长曹仲植，他在 1943 年 6 月 7 日被迫辞职。

当然，对于后方的百姓而言，如果价格太高，买不起糖、烟草等商品，也还是能勉强生活，却不可能不吃粮食。在战时的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大后方，粮食供应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从 1938 年开始，川康滇等西南大后方人口从战前的 1.8 亿猛然增加到 2.3 亿。而且，1937 年川康地区稻谷歉收，若非 1938 年和 1939 年连续两年丰收，重庆

很可能在 1939 年便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即便如此，四川和重庆的粮价在半年内狂飙 5 倍，为了平抑粮价，重庆陪都民食供应处和四川另外 3 个供应处在一年内从周边县调粮 360 万石。

不过，当时的经济学家经过研究，认为重庆和四川粮价的暴涨，除了粮食供应问题外，更大原因是国民政府滥发货币造成。经过 1939 年的粮价暴涨，国民政府及时认识到粮食动员的重要性，一方面尽一切手段收集粮食，一面通过增加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提高粮食总产量。1941 年 7 月，国民政府全国粮食管理局升格为粮食部，除了负责军粮保障外，还要负责民事供应。由于军粮调配采用强征的方式，效率较高，因此在战时，重庆有相当多的市民，例如军工厂的职工，都是在使用军粮。

由于重庆本地产粮较少，所需军粮均要从四川的主要粮食产区成都平原调运。1940 年 10 月，搞水运起家的卢作孚作为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竟然为了 6 万石军米的运输问题，专门给四川政府发电，要求政府出面征用岷江木船，优先保证军粮运输。

当然，即便粮食运抵重庆，也不一定能够送上老百姓的餐桌。1941 年夏天，重庆第 21 兵工

香港国安法亮剑斩断“港独”“台独”合污黑手

□ 彭韬

2020年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签署了第49号主席令。当天晚上11时许，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签署实施令，并于当天刊发生效。

香港国安法的出台必要而及时

自2019年6月以来，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借和平游行集会之名，行“港独”之实，围绕反修例引发的政治风波和社会冲突，在幕后推手及境外反

华势力的操控下，发酵成暴力事件。暴力分子们非法集结，暴力冲击、打砸香港立法会和围堵中联办大楼，恶意损毁国旗、国徽、区徽，肆意打砸私人财物、破坏公共设施，蓄意瘫痪地铁、机场等公共交通，禁锢、欺凌、殴打普通民众，用毒性化学粉末、汽油弹等危险工具攻击警察，甚至连游客、老人和儿童都不放过……严重破坏了社会安定，严重挑战了“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国家权威，严重危害了中国的主权完整以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国际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2019年7月31日，全国政协

副主席董建华在团结香港基金午餐会上致辞时表示，围绕近期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和暴力事件，幕后推手或是外部势力介入，种种迹象都指向台湾和美国。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制度性官方沟通渠道中止，两岸协商停摆，加之其内务外事治理无能，司法经济荒腔走板，选人用人任人唯亲，导致民进党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大败，蔡英文也被迫辞去党主席一职。在民进党内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初选中，蔡英文面临内部派系整合压力，

厂的一船军粮，运抵簸箕石河码头待卸。这船粮食共有2000石，足够让全厂近4万张嘴吃一阵子。但是此时，码头工人却因为躲避空袭而逃散一空，无人帮助卸船。眼看粮食随时可能因为空袭或者下雨而损失在码头上，时任第21兵工厂厂长的李承干振臂高呼，带头冲上运粮船扛下满满一担米。在厂长的感召

下，第21厂的职工，甚至是厂里的儿童，都参加了卸船运米的工作。不过，由于第21兵工厂卸船速度太快，竟然引起了第50兵工厂等单位的不满，他们纷纷向兵工署投诉，批评李承干花高价雇人抢运粮米，以至于其他兵工厂的粮米无人卸船。

虽然战时重庆的生活并不容易，要抵抗日军的轰炸，要忍

耐恶劣的生活条件和飙升的物价，但抗日军民最终克服一切困难，保卫了重庆，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6年4月，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还都令》中对重庆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重庆襟带两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胜，故能安度危艰，获致使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遭遇赖清德的“逼宫”，一度选情堪忧。虽然蔡英文政绩惨淡，却擅长操弄统“独”议题，利用香港爆发反修例冲突，多次声援争取“民主”的港人。台湾从人力、财力、物力以及舆论资讯上对“港独”分子进行广泛支持。据媒体报道，“台独”政党“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黄捷就曾为“港独”分子公开募集口罩、防毒面具等物资。另外，“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朱凯迪、姚松炎、罗冠聪等多次窜访台湾，与时任民进党主席卓荣泰、秘书长罗文嘉、副秘书长林飞帆就港台之间谋求“独立”的学运、社运和政党派别之间的串连、协作进行磋商。“港独”“台独”合体让原本低迷的民进党选情有所提升。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蔡英文当局选战策略就是别有用心地将香港事件与台湾联结，高调介入香港问题，一方面是要搞乱香港，以此污名化“一国两制”，为其推行“拒统求独”的分裂图谋寻找借口。另一方面是将揽炒香港事务作为提振蔡英文选情的“提款机”，转移岛内民众不满其执政不佳的焦点。蔡英文此举不但巩固了绿营基本盘，笼络了不少年轻选民，还推升民调支持率，谋取选举利益，最后成功连任。

一年来，境外反华势力以及“港独”与“台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滋扰生事，导致香港经济受到重创，营商环境受到冲击，百业不振，民生凋敝，社会严重撕裂对立，严重影响了香港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生活，给香港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和巨大的伤害。在此背景下，香港国安法这部维护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的法律出台显得尤为必要和及时。

香港国安法以国家宪法及香港基本法为依据，分为6章66条，在框架体系上，除总则和附则外，分别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罪行和处罚，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规章、执行体系、保障机制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该法一方面从国家立法角度确保国家主权及治权在港受到严格保护；另一方面确保香港在“一国两制”大背景下国家安全能够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弥补了此前香港国安方面的立法缺失，填补了相关法律漏洞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前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制度范围等方面的缺位。主要针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

主义活动、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等四类违反国家安全罪行给予精准打击，既维护了法律权威，也遵循了法治精神，凸显了立法智慧。

香港国安法是斩断“港独”“台独”合污的正义之剑

香港国安法的出台有效打击了“港独”和“台独”势力，将有效解除长期以来“港独”与“台独”勾结及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台独”“港独”之所以长期在港兴风作浪，就是因为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处于真空地带。凭借香港国安法，“港独”勾结“台独”等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黑手将被斩断。

就立法内容而言，例如该法第六条规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第二十条至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个人、团体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等四类违反国家安全罪行，将依法受到严惩。第三十六条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船舶或者航空器内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也适用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

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上述法规也理所当然适用于“台独”势力身上。“台独”分子在大陆及香港之外触犯违反国家安全的四项罪行，理所当然会被依法追究刑责。特别是2020年7月6日，以维护国家安全执行机制的7条《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在香港生效，内含为搜证而搜查有关地方，限制受调查的人离开香港，向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要求就涉港活动提供资料等内容。既达到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目的，也同时符合香港国安法总则下对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依法保护各项权利和自由的要求。

再就机构设置而言，7月3日，郑雁雄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同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承担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7月22日，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蔡展鹏履新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一职，专职处理相关工作。上述机构设置体现了国家对香港国安立法的高度重视，强有力的政治安排也确保了香港国安法的落地实施。

台湾民进党当局对香港国

安法的出台显而易见反应强烈。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陈明通7月1日称：“这不但是香港和台湾，更是全世界都必须关注的法律，是天朝帝国对世界子民发出的律令。”7月2日，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直接建议台湾民众非必要避免过境或前往大陆与港澳。7月6日，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在“四十三条细则”生效当天“表达强烈不满与谴责”，蔡英文甚至扬言“会考虑反制措施”。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帆则称：“面对香港危局，我们要做最坏打算，最好的准备和最强大的后盾。”为反制香港国安法，民进党当局不但设立了支援香港的“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项目”，还专门设立了“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这也实锤了民进党当局之前一直通过将黑手伸进香港，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后援，“台独”“港独”互相勾结，操作危害国家主权、安全以及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勾当。

一直以来，民进党当局甘当美国反华马前卒，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大陆和港澳同胞。从2020年3月滞鄂同胞返台事件到禁止“小明们”（在陆台湾二代）返台，从污蔑香港警察严正执法，谴责香港警察“执法过度”到对美国政府镇压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的视而不见。再到民

进党为堵塞“国安”漏洞，强推天怒人怨的“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处处暴露其虚伪冷血、无耻偏执的一面。

与此同时，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前一天，乱港头目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退出政坛，李柱铭宣布与暴徒划清界限，“港独”团体“香港众志”核心成员黄之锋、罗冠聪等宣布退出组织进而宣布解散团体。台湾地区驻港办事处代理处长高铭村、服务组组长周家瑞、综合组组长李晋梅及一名经济组秘书共4人因不愿意签署“一中保证书”，未获港府续签签注而返台，充分显示了该法的威慑力及打击力。

正如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所说：“香港国安法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4种犯罪行为的构成及其刑罚做出明确规定，必将斩断民进党当局乱港的黑手，并严正警告民进党当局，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行径都是徒劳的，必将自食恶果。”

香港国安法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尚方宝剑

香港国安法的出台充分体现了“一国”和“两制”的统一、中央对港全面行使主权和特区高度治权的统一、维护国家安

全发展理念和保障香港市民合法权益的统一。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导致“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受到严重挑战，中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此形势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稳定已经上升到与维护香港经济发展同等高度。

香港国安法保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国安法从维护香港的现实和具体情况出发，针对的只是四类有意图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及活动，不会对香港遵纪守法的普通市民产生不良影响，香港国安法也不会影响有关单位及机构的正常交流活动。换言之，只要是在合理合法框架下的正常活动，一切将受到法律保护，香港的繁荣稳定由此更有保障。这也是重振香港，香港再出发的根本保证。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唯有保持对“港独”组织、乱港分子的高压态势和有力打击，才能切实止暴治乱，清除祸国害港的毒瘤。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保障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和人身自由，才能保障香港最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秩序及公道正义。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才是根基，香港繁荣稳定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等利益的核心要素，反对“港独”“台独”合体，抵制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分裂国家，打击

暴恐活动，凸显出香港国安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香港国安法维护了香港的优势地位。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信任与支持，将继续有效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香港拥有庞大稳定的外汇储备，在全球汇率和税率方面的优势依旧无可替代，阿里、京东、网易纷纷赴港上市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香港的独特地位与优势又将积极服务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形成和国家、特区的良性互动，保障了香港的利益权属与长治久安，令香港明天更美好。在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消除后，香港自身的各种优势也将充分发挥，积极融入到“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不竭动力，成就一个更加兴盛美丽的香港。

香港国安法为筑牢“一国两制”方针强基固本。香港国安法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一国两制”的核心是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是前提也是主导，是实现“两制”的保障。“两制”应服从和服务于“一国”这一大原则。在“一国”前提下，“两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正

确把握和处理“一国”与“两制”的辩证关系，也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髓。香港国安法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也体现“两制”准绳。既强调“一国”根本，也兼顾“两制”区别，正确处理了中央与地方，外部与内部的关系，同时反映香港700多万市民的诉求，亦包含了全国14亿人民的共同利益及愿望。最大程度维护司法公正、保证法律实施、保障市民权利自由，将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必将推动“两制”台湾方案实施，对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动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

国家安全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国家安全底线是不容挑战和不可触碰的，香港国安法斩断“港独”“台独”合污黑手，恰逢其时，深得民心。东方之珠，重整出发，未来可期！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0年6—7月

□ 吴亚明

6月

海外统促会组织纪念《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

海外统促会组织通过发表声明、网络会议等各种形式，纪念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

“赖声川专属剧场”在上海恢复演出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而暂时关闭的“赖声川专属剧场”——上剧场，2日晚在上海徐家汇恢复演出。

学生团体要求台当局尽快开放境外学生入境

台当局日前决定暂缓讨论开放境外学生来台，引发校方和境外学生的强烈抗议。民间团体“境外生权益小组”5日代表境外学生向台当局教育事务主管部门递交陈情书，呼吁尽快开放境外学生入境。

福建前4月利用台资大幅增长，闽台经贸合作稳中向好

今年前4个月福建省实际利用台资同比增长近九成，贸易总额也呈现逆势增长，闽台经贸合作整体呈现稳中向好趋势。

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机飞越台湾上空

针对有媒体报道6月9日美国一架C-40A军用运输机飞越台湾上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日应询表示，美方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国台办：“台独”分子胆敢以身试法必遭严惩

针对岛内一些“台独”政党和团体近来不断鼓噪“修宪”“正名”，并妄图推动制定所谓“新宪法”，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2日应询指出，近一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加紧勾连外部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不断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两岸关系更趋复杂严峻。岛内一小撮“台独”分裂势力利令智昏，借机生事，大肆鼓噪并加紧推动一系列谋“独”活动，企图把两岸关系推向危险边缘，把台湾同胞推向灾难深渊。我们正告这些“台独”分子必须悬崖勒马，胆敢以身试法，必遭严惩。

台湾大健康产业联盟协会成立，冀开拓大陆市场

台湾大健康产业联盟协会13日在台北成立。约50家台湾医疗院所、生技公司，约150名企业负责人出席协会成立大会。协会希望为台湾大健康产学研医建立交流平台，携手开拓大陆及东南亚市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军机穿航台湾岛答记者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15日指出，美军机未经中方允许飞越中国领土，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极端错误和危险的。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一切挑衅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以台制华”和挟洋自重的做法都是没有出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坚决挫败任何制造“一中一台”的图谋。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针对陆生和两岸婚姻家庭歧视性措施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8日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陆生和两岸婚姻家庭的合理需求，尊重他们希望返台就学、实现家庭团聚的正当要求，尽快取消歧视性措施。

国台办：“台独”“港独”合流破坏“一国两制”和分裂国家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针对民进党当局日前公布所谓“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项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援助行动”再次暴露其插手香港事务、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政治图谋。为“黑暴”和乱港分子提供庇护并引入岛内，只会继续祸害台湾民众。“台独”“港独”合流破坏“一国两制”和分裂国家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国台办：希望中国国民党明辨是非，坚持积极的大陆政策

中国国民党改革委员会两岸论述组提出大陆政策建议案，交由改革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日应询指出，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希望中国国民党明辨是非，坚持积极的大陆政策，珍惜和维护两党既有政治基础，妥善处理两岸政治分歧，相向而行，与我们一道继续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增进同胞利益福祉而努力。如果丢弃长期坚持的正确理念，背离事关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不仅会损害互信基础，而且会给两党及两岸交流合作造成障碍。

2020海峡两岸共祭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新北市举行

2020年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

22日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7年跨海同步共祭伏羲。当日大陆公祭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伏羲广场举行。

国台办：苏贞昌恶毒攻击大陆再次暴露其顽固谋“独”本质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2日应询表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借美国公布所谓“中国军力评估报告”恶毒攻击大陆，挑动两岸对立，刻意混淆“台独”与台湾，再次暴露其顽固谋“独”的本质。

台湾失业率连续4个月上扬

台当局统计部门22日公布，5月失业率达4.07%，连续第4个月上扬，为近8年来同月新高，较上月上升0.0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

国防部：美方想通过“切香肠”的方式危害中国主权完全是痴心妄想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4日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方频繁打台湾牌，想通过“切香肠”的方式危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再添“千金”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28日下午1点53分顺利产下雌性幼崽，喜获“二胎”。

7月

居港台胞台商举行联谊活动庆回归、贺立法

香港台湾工商联合总会1日邀请在港台胞台商和香港工商界人士一起，在香港共同举办“庆回归

贺立法 再出发” 维港联谊活动。

线上推介洽谈助力台资企业拓内销

由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全国台企联等单位主办的“台企拓内销”线上推介对接系列活动首场对接会3日举行。据商务部披露，此次活动促成有效配对一千余场次，达成意向签约金额近10亿元。

台湾出口“四连黑”对大陆出口创新高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7日公布，台湾6月出口271.3亿美元，同比减少3.8%，连续4个月负成长；进口222.9亿美元，同比减少8.6%。大陆（含香港）仍是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台湾多个团体纪念全民族抗战83周年：汲取历史教训，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今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3周年。台湾多个团体在纪念这一重要日子时呼吁两岸中国人汲取历史教训，团结起来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这样才不愧抗日先贤先烈的牺牲奋斗。

湖南省成立“涉台审判法官工作室”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9日共同揭牌成立“湖南省涉台审判法官工作室”，旨在打造湖南涉台审判专业化队伍。

内地学者：香港国安法精准规制“台独”势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撰文指出，香港国安法是一部维护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的全国性法律，为反制“港独”而立，对“台独”可以构成相当程度的法律威慑力和实际规制力，可有效切断长期以来“台独”与“港独”勾结及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江苏出台11条意见助力台企健康发展

江苏省台办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促进台资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推出11条意见，服务引导台企妥善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

国台办：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针对美国国务院批准一项6.2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4日应询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反对台美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不会得逞，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给台湾人民带来更大灾难。

家长呼吁台当局尽快准许滞留大陆孩童回台

部分两岸婚姻家庭的孩童今年寒假赴大陆探亲，至今仍被民进党当局以疫情为由禁止返台，造成骨肉分离。这些孩子的家长14日再次呼吁台当局尽快准许孩子们回台。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办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7月17日在广东中山市开幕。论坛以“弘扬中山精神、共谋民族复兴”为主题，举办了“台商一起来 融入大湾区”主题活动、中山精神与民族复兴研讨会、两岸青年研习营、“中山杯”大湾区台企慢投全球邀请赛、孙中山文化史迹游等系列活动。

广东发布落实惠台政策措施办事指南

在17日晚开幕的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上，广东省发布了《2020年广东省贯彻落实相关惠台政策措施办事指南》，着力为台资企业、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助力台商台胞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上半年台资赴大陆投资金额大增逾52%

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投资审议委员会20日公布，今年1月至6月核准对大陆投资件数为245件，同比减少13.12%；核准投（增）资金额31.7亿美元，同比增加52.49%。其中，6月份赴大陆投资件数31件，同比下滑6%；投资金额4.97亿美元，同比大增186%。

台湾对大陆市场出口依存度创十年新高

据台湾当局财政主管部门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 displays，2020年上半年，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达668亿美元，同比增长9.8%，为台湾主要出口市场中增长最快的地区；对大陆出口占台湾总出口比重上升到42.3%，创近十年新高。

国台办发言人就民进党当局呼应蓬佩奥对华讲话进行批驳

针对7月24日民进党当局对外交往部门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日讲话提及台湾表示“感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应询表示，关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外交部发言人已充分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对其提及的我国台湾问题，我需强调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我们要求美国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台独”没有出路，民进党当局无论以任何方式、借任何名义、通过任何手段谋“独”，都不会得逞。

国台办驳陆委会关于在陆台生和两岸宗教交流不实说法

针对台陆委会称，近期有在陆就读的台生因疫情等原因想转学返台就读，但遭到大陆学校阻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7日应询表示，据了解，大陆高校没有收到过台湾学生的转学申请。有记者

问，据报道，针对有传言称大陆近日销毁包括台湾宗教团体出版的佛书，台陆委会称对两岸关系毫无帮助。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回应，有关说法与事实不符。多年来，台湾宗教界人士或团体的著作在大陆依法出版发行是顺畅的。我们将继续支持两岸宗教文化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大陆籍运砂船澎湖海域翻覆 4人遇难4人失踪

台湾“海巡署”27日发布消息，该部门舰队分署7月26日19时许接获通报：大陆籍“宏翔”运砂船于澎湖七美西南48海里处翻覆，船上有9名船员，其中1人已被救起，8人失踪。舰队分署派出海巡队参与搜救。截至27日10时06分，寻获4名遇难人员遗体，尚有4人失踪。

国台办：对毛铸伦、王晓波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0日应询表示，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毛铸伦先生，前副主席、《海峡评论》前总编辑王晓波先生心怀民族大义，矢志不渝推动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令人敬佩。我们对他们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国防部：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30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军派员赴台开展演训交流，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是蓄意的挑衅行为。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挟洋自重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徒劳。

台湾当局前领导人李登辉病亡

据台北荣民总医院消息，台湾当局前领导人李登辉30日在台北病亡，终年97岁。

航母大科技 (下)

□ 石稼

航母“弹射弓”

2017年11月6日,中国海军少将尹卓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中国海军歼-15舰载机在电磁弹射方面已经弹射了成百上千次。尹卓还透露了一个重大突破:中国航母不用核动力也能电磁弹射,而且使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的能量转换效率更高!

显然,对发展中的中国航母而言,辽宁舰和第一艘国产航母采取的滑跃式起飞,仅仅是中国航母起步阶段为解决舰载机顺利起飞、总结航母作战经验等问题不得已而采取的阶段性方案。

滑跃起飞的典型代表是苏联生产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这种起飞采用的甲板称为滑跃式甲板。相比二战中的平直甲板,滑跃式甲板最大的特征是甲板前部有一个向上的坡度,也就是俗称的“翘头”。这样,舰载机在“翘头”上以向上倾斜的角度起飞。

滑跃起飞虽然技术难度较低,却也存在瓶颈:在战机滑行距离一定的情况下,由于最终速度有限,单纯依靠增加甲板仰

角,对升力提升也有限。当战机重量过大时,凭借现有甲板长度,单靠发动加速,难以获得足够的升力。因此,目前歼-15在辽宁舰上的起飞,还不能做到全负载,即不能完全满载武器、弹药、油量起飞。这对于歼-15在远海的实战是一个制约。第一艘国产航母虽然对甲板的仰角作了一些调整,但并没有有效解决滑跃起飞的固有瓶颈问题。

像弹弓一样把舰载机弹射出去,无疑解决了舰载机滑跃起飞带来的诸多限制。航母每次出航装载燃油6000—9000吨,可供舰上飞机起飞6000多架次,依靠弹射起飞每架次可节省燃油近200千克,总共可节省300多吨。

如果从效费比上评价弹射器,该装置可能是效率最高的航空支援设备了。目前世界范围内使用的较为成熟的弹射器是蒸汽弹射器,它也是目前西方航空母舰的主流弹射设备。美军航母上的蒸汽弹射器是按起飞重量40吨飞机设计的,采用的是双缸。

对于中小型航母,如果是

搭载20吨级飞机,则可以采用单缸,重量就可以下降到220多吨。要是为起飞10吨级飞机设计弹射器,则重量更有可能降低到80吨以下,当装置的尺寸大幅度降低后,像储汽罐和支撑盖板这样的结构件重量会有更大幅度的下降。

从美国海军的实践看,无论从工程技术还是从实战的角度看,舰载机弹射起飞都比滑跃起飞具有更多的优越性。

从总体上来说,弹射器只有一个弹射活塞,是运动部件,而舰载机弹射起飞过程是一个可控的过程,航母的航速、风向,飞机的起飞重量、弹射时的压力等都是可以事先确定的。决定可靠性的关键时刻是在弹射开始后两秒的时间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弹射活塞是不会出问题的,弹射阀的开启速度也不易出故障,充其量弹射的过载波动大一些。

因此,弹射起飞的安全性甚至要比从陆地上起飞还要高一些。

世界上最早的弹射器是由美国海军上尉西奥多·埃利森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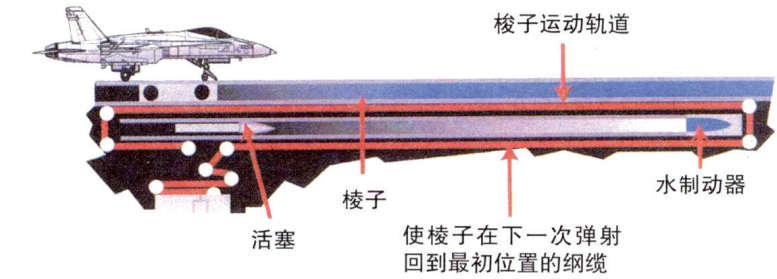
1911年研制成功的。这种原始的弹射器由3条绳索和1块砵码组成，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埃利森又对这种原始的弹射器进行改进，研制成功压缩空气弹射器，于1912年11月12日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弹射起飞。

1951年，英国海军航空兵后备队司令米切尔率先研制出蒸汽弹射器，并装备在海军“莫仙座”号航空母舰上。此后，美国海军购买了这项专利，成为美、英、法等国航母的标准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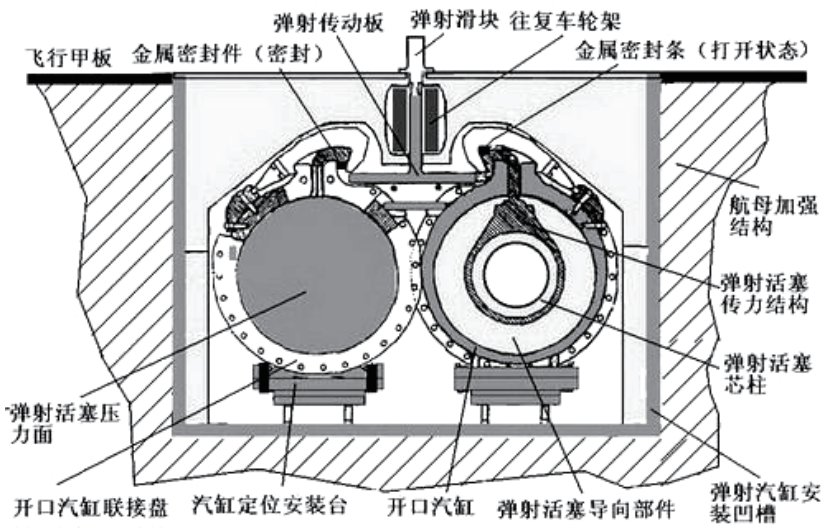
俄罗斯航母研发较为滞后，但也在1982年开始蒸汽弹射器的研究，计划在90年代服役的“乌里扬诺夫斯克”级核动力航母安装蒸汽弹射器，可惜这款航母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夭折。

蒸汽弹射的基本原理和弹弓差不多。在战机起飞前，用位持器钢圈“拽住”战机的前轮，前轮附近的牵引杆则用滑梭钩住。战机前面的甲板下则有两个平行圆筒，每个至少长45米，筒中的活塞连接滑梭。蒸汽则由母舰上的锅炉输出，在增压后输入滑梭。

舰载机起飞时，开足马力，同时蒸汽弹射器启动。发动机加上蒸汽压力，形成巨大推力。与此同时，前轮又被钢圈拽住。这样相持片刻，当可怕的推力终于拉断钢圈的时候，就好像玩弹弓的孩子松开皮筋，飞机以极大



/ 航母弹射器构造示意图。



/ 美国航母上使用的弹射器开口汽缸组件截面示意图。

的加速度往前猛冲。短短45米内，时速能达到250公里，从而弹射起飞。这种弹射称为前轮弹射器，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具备生产这种弹射器的成熟技术。

另一种是拖索式弹射，就是用钢质拖索牵引飞机加速起飞，这种弹射方式比较老，性能也不好，只有巴西的“圣保罗”号航空母舰使用。

蒸汽弹射器实际就是一台往复式蒸汽机，只不过其动力

冲程很长。

蒸汽弹射器由发射系统、蒸汽系统、拖索张紧系统、润滑及控制系统等部分组成。工作时，由锅炉产生高压蒸汽，并把这种高压蒸汽储存在蒸汽室里，弹射前，用拖索将舰载机钩在往复车上，一旦将高压蒸汽充入汽缸筒，蒸汽的巨大压力推动活塞，活塞带动往复车，往复车带动舰载机飞速向前滑动，从而将飞机弹射出去。如美国的

C-13型蒸汽弹射器，可将36.3吨重的舰载机以185节（即339公里/小时）的高速弹射出去。

目前，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弹射一架飞机仅需30秒钟。

开口汽缸是弹射器的核心，就是由它和活塞共同产生的约束力把高压高温蒸汽中的热能转化成飞机离舰时的巨大动能。

如图所示，开口汽缸组件由两个汽缸组成，每个汽缸内有一个活塞，两个活塞都通过伸出汽缸开口的传动板与往复车相连，为防止漏汽，用汽缸盖和密封条把汽缸的开口密封起来。开口汽缸在弹射一定次数后，变形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大，需要拆下来进行校正，以延长使用寿命。但这个变形是有规律的，而且不是一下子就会使弹射器失去弹射力，在海战的关键时刻是可以不考虑这一点的。

为与发射系统配套，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还设有喷气偏流板。这种安装在弹射台后方的偏流板又称为燃气导流板。

飞机在起飞前，将支起这个偏流板，用以挡住起飞时马力开得最大的喷气式舰载机向后喷射出的高温燃气流，以防对人员和甲板造成危害。每个弹射器后面有一组偏流板，共3块。单发动机舰载机起飞时需支起3块偏流板。

为防止高温燃气烧坏挡板，

挡板还装有供循环冷却水流动的格状水管。目前美国使用的这种水冷式喷气偏流板，当正在升起时能承受94.4千牛的喷气推力，若完全升起后，能承受400千牛的喷气推力。

该板放下后与飞行甲板齐平，能承受31.572吨重的飞机在中等海况下，从上面通过或静止不动地压在板上。在恶劣情况下，飞机一般不允许压在该板上。

由于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并未预留弹射器的空间，故而在辽宁舰上装弹射器，改动工程过大，甚至影响整个舰体的稳定性。因此，目前辽宁舰还是单纯的滑跃起飞模式。

蒸汽弹射器至今使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也存在缺陷。

主要是蒸汽弹射器存在运行维护成本高、体积庞大、消耗大量蒸汽等缺陷。据报道，单纯的维护、运转蒸汽弹射器的费用，就占到了整个航母全部设备维护资金的80%！

美军一艘核动力航母上，需要整整500人来专门维护运转蒸汽弹射器。

对于弹射器的重量和体积，媒体的说法不一，最高的达千吨，800立方米，有的说是800余吨。目前看，比较权威的说法是525吨。

弹射器的储汽罐是个重量大户，美航母上的C-13弹射器

用的储汽罐直径2米，长为20米，如采用轻重量的制造方法，两个罐的重量也可能在200吨左右。两个汽缸组件加上往复轨道和支撑盖板等也可能在200吨以上。

飞行甲板上为安放汽缸留出的凹槽截面积可以从航母照片中大致推算，如果是1.6乘1.8米，则这部分的体积是300立方米。两个罐占据的舱室容积也在200立方米以上，再加上输汽管道等装置占据的地方，总体积就到了600立方米了。从以上推测可以看出，弹射器的重量体积确实大得惊人。

同时，蒸汽弹射器的技术要求很高。核心是高温高压材料，各个部分都要频繁承受蒸汽的冲击，如何保证各系统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稳定工作是最大的难题。而且，蒸汽弹射器要消耗大量的淡水。

美军航母弹射一架飞机，要消耗一吨淡水。

此外，现在美军的蒸汽弹射器的长度和气缸容积几乎达到极限，很难再提高能量，无法满足新一代战斗机尤其是更重舰载机的要求。

针对蒸汽弹射器自身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缺点，美军开始了电磁弹射器的研制与生产。

事实上，美军关于电磁弹射的研究非常早，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海军即进行了相关研

究。当时因为技术不成熟，研发成本也高，很快就放弃了。

到70年代末，随着舰载机的重量和速度不断增加，蒸汽弹射器逐渐不能满足需求，美军又从1978年重新开始对电磁弹射器进行开发。

2010年6月1日至2日，成功弹射 T-45“灰鹰”舰载教练机，6月9日至10日，成功弹射 C-2“灰狗”舰载运输机，12月18日美国海军在莱克赫斯特海军航空兵工程站成功弹射 F/A-18“大黄蜂”战斗机。

2011年9月27日，成功推出 E-2D“先进鹰眼”舰载预警机。

2011年11月18日，成功弹射 F-35C“闪电 II”舰载战斗机。

2013年5月8日，第一套电磁弹射器被安装在当时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上。

接下来，美海军将集中进入电磁弹射器的海上试验阶段。

所谓电磁弹射器，简单说就是利用电磁感应力进行弹射的装置。它分为两种：电磁线圈弹射器及电磁轨道弹射器，分别采用交流直线电机和直流直线电机。

电磁弹射器包括强迫储能装置、大功率电力控制设备、中央微机工控控制及直线感应电机等。其中最核心的是强迫储能装置，可将发电机在一个周期（约45秒）内发出的能量积蓄起

来用于一次猛烈的弹射。

据估计，最大的舰载机起飞需要消耗的能量不超过120兆焦耳，而功率4兆瓦的充电设备则能在这段时间积蓄140兆焦耳（存在消耗）以上的能量。

“福特”级航母拥有4部电磁弹射系统，同时充电时总功率可达16兆瓦，再加上升降机以及未来的电磁轨道炮、激光，航母总功率可能需要60兆瓦以上。

相比蒸汽弹射器，电磁弹射器有许多优点。

首先是准备时间短。军事专家张召忠有一段形象的描述：

“电磁弹射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准备时间短，你不用把凉水烧热。……战场上打仗是分秒必争的。你那水还没烧开呢，不能弹射，结果敌人飞机来了，把你航母炸沉了。而电磁的东西，一通电马上就能开始调节了，整个系统的准备时间也就10分钟、8分钟的，在系统完全冷态条件下，电磁弹射系统启动时间也就只需要15分钟。”

其次是电磁弹射器的精度高。对于弹射力量的控制，仅仅需要通过控制电流大小就能做到，推力大小可调节，这样航母不但可弹射有人战机，还可以弹射无人机。

再次是维修工作大大简化。据估计，可以比蒸汽弹射器节省劳动力成本30%以上。还有就

是电磁弹射器的重量和体积大约只有蒸汽弹射器的一半。电磁弹射器与未来海军的“全电力系统”能更好融合，将弹射器的控制对接到全舰的其他动力系统中，便于统一操纵。

另外，蒸汽弹射器的极限弹射能量不到100M焦，而电磁弹射器则可以达到122M焦，从而突破了前者的瓶颈。

当然，电磁弹射器也有一些缺点。高功率电磁电动机会产生电子干扰，而高速旋转的机械也对材料的刚性提出更高要求。

美国一航母工程师针对海军发展电磁弹射器的计划指出：“蒸汽弹射器拥有高可靠性，迄今为止，没有一架飞机在近千万次的弹射起飞中因装置本身的故障而出事。”说明蒸汽弹射器是非常可靠的，言外之意是怀疑电磁弹射器的可靠性。

对中国电磁弹射器的发展，国内外都非常关注。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海军工程师马伟明的带领下，中国已克服传统动力的航母动力不足、无法安装电磁弹射的弊端，开发了一款全新的供电方式，中压直流输电网，取代了传统交流电，这使得中国军队即便不研发核动力航母依然也可以安装电磁弹射，这相比电磁弹射本身更有价值。

2018年1月1日，日本《产经

新闻》的一篇报道，迅速成为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竞相转载的新闻。该报道称，中国将建造第二艘国产航母，代号为003型，该航母是一款采用了常规动力装置的电磁弹射型航母。到2030年，中国将建造第三艘国产航空母舰，即中国的第四艘航空母舰，代号为004型航母，采用核动力装置并且装备电磁弹射器。据披露004型航母长度337米，宽度77米，吃水深度12米，满载排水量达到10万吨，最大航速30节。一旦成功建成，004型航母将在性能上同美国的“福特”级航母不相上下。

因此，当军事专家尹卓称，中国已经进行了上千次电磁弹射试验也就不足为奇了。

被称为中国电磁弹射器之父的马伟明院士明确指出：“中国在军用电磁领域领先美国，国产航母采用电磁弹射技术不是问题。”并称：“中国的电磁飞机弹射系统技术比美国‘福特’号核动力超级航母上所使用的系统更先进更可靠。”

据国产电磁弹射器研发团队介绍，中国在电磁弹射器领域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要远远低于美国的投入，但却保持着与美国相同的研发速度。可以说，中国在电磁弹射领域的技术已成熟，基本突破所有难关，上舰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



/ 中船重工专题研究航母发展问题。

尹卓判断，如果中国航母安装电磁弹射器和搭载固定翼隐形舰载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航母的作战能力与美国“尼米兹”级航母相差无几。

美国《防务新闻》在评价中国的船电领域获得突破时毫不讳言，美国的技术鸿沟正在被中国科研人员以各种手段加以缩减，这才是美国最应该警惕的中国海军！

电磁弹射技术作为航母核心技术之一，目前只有美国在“福特”号核动力航母上装备，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掌握此项技术的第二个国家。

要看到，虽然目前中国掌握了电磁弹射技术，但电磁弹射技术研制的成功并不代表电磁弹射就能上舰。

从美国的经验看，“福特”号航母早在1992年就进行了电磁弹射的概念研究，1998年造出原理试验样机，到2010年才成功试验定型，2013年才正式安装，一共花了21年。

因此，中国从掌握这项技术到上舰，也要经历技术攻关—研制缩比尺寸原理样机—研制全尺寸试验样机—试验定型—安装上舰等这样一个阶段和过程。

2018年6月20日凌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官方微信号发布了最新的新闻资讯，报道了中船重工党组书记、董事长、重点工程总指挥胡问鸣专门就舰艇高质量发展等军工科研生产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和检查的消息，配发图片是悬挂着一张三艘航母齐聚的画像。这三艘航母“一平二翘”，居中的是一艘平甲板弹射型航母，分列两侧后方的是滑跃型航母，与中国现有的辽宁舰及正在试航的首艘国产航母相吻合，再后方的背景则是十余艘护航舰艇。

至此，中国航母发展的方向不言自明。

航母“绊马索”

相较于舰载机的起飞，飞



/ 飞机降落甲板时拦阻设备“拖拽”住飞机尾部。

机如何在有限的航母甲板上安全降落也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难题。但其原理却非常简单，就是冷兵器时代“绊马索”的现代翻版。

中国自古就有绊马索，战争中交战双方经常使用，即在敌方骑兵经过的地方突然拉起绳子，绳子绊住马腿使骑兵从马上向前摔下。

历史上的此类公案举不胜举，孙权用此物捉到了关公，唐代颜真卿用绊马索阻止了安禄山的叛军进攻，《水浒传》中秦明、邓飞被祝家庄绊马索绊翻活捉，等等。

有趣的是，这种既古老又另类的兵器在航母上有了用武之地，产生了专绊飞机的阻拦索。阻拦索，顾名思义，就是在航母上设置一些拦阻设备，使高速行驶的飞机在航母甲板上降落时，通过甲板上的拦阻设备拖拽住飞机尾部的钩子，使得其速度迅速降低，并在指定的区域内停住。

看似简单的阻拦索其实是个复杂的大工程，其阻拦装置涉及机械、电气、液压等诸多高新技术。阻拦钢索需要直接承受舰载机尾钩的冲击力和阻拦力，又要具备较高的抗疲劳连

续工作性能，硬度和韧性的要求对阻拦索材质工艺提出严苛要求。

为保证飞机着舰安全，提高飞机尾钩的勾索率，飞行甲板上通常都设有4-6道阻拦索。第一道阻拦索一般设在距飞行甲板尾端36—51米处，每道阻拦索之间的间隔约为12—18米。拦机网设在最后一道阻拦索前面。拦机网平时并不设置，一旦着舰需要，甲板人员在两分钟内即可支起阻拦网，飞机冲进拦机网后迫使其停下来。

当飞机即将降落时，首先放下起落架和襟翼，同时，将装

在舰载机上的尾钩放下。飞机俯冲着舰，其尾钩就会钩住间隔布置在甲板上的多根阻拦索中的一根，通常第二、第三根阻拦索的拦机率最高。飞机尾钩勾住阻拦索继续向前滑跑，阻拦索给飞机施加向后的作用力，使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小，之后安全停在甲板上。在飞机停止的瞬间，绳索中存在的应力使飞机向后滑动很小一段位移，阻拦索会自动从飞机的尾钩上脱落，失去拉力的阻拦索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为下一架飞机的降落做好准备。

如果着舰时没有钩上阻拦索，飞机则加大发动机油门采取逃逸复飞措施，低空飞行后重新着舰。

美军航母普遍采用 MK7 液压阻拦系统。当舰载机尾钩挂上阻拦索后，拉动滑轮索，带动主液压缸的活塞，将主液压缸里的油液经过控制系统，挤压进蓄能器。这个过程中产生压力损失，从而使飞机逐渐减速，在冲跑的末端，控制飞机完全停止。

MK7 的主要缺陷：结构复杂，体积较大，日常维护保养困难，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这与未来新型航母控制人员规模、加强自动化水平和模块化操控的趋向矛盾；拦阻力量较生硬，不能精确控制，容易导致舰载机的尾钩及与尾钩相连的机体部件疲劳老化。

未来阻拦系统的发展，主要是提高系统性能，加强通用性、机动性，使得对飞机的阻拦过程更加平稳，使系统能适应大范围的飞机（主要是重量更大、速度更快）降落。同时，还要寻求缩短停机距离，减少设备使用的客观条件限制，便于快速部署、转移、安装等。因此，美军在加快航母现代化全电力推进系统研究时，也将液压阻拦系统改造成电磁式阻拦装置。

目前，美国最新一艘航母“福特”号使用的是通用原子公司的涡轮电力阻拦（AAG 电磁阻拦系统）。该系统比 MK7 领先了一代，体积更加紧凑，自动化水平更高，具有明显优势。它通过采用更轻的合成电缆系统和电机，扩展了舰载机着舰重量和着舰速度的范围，可以满足质量更大、速度更快的新一代舰载机着舰需求。同时，这个系统可根据舰载机的不同，自动设定拦阻索的张力峰值，精确控制舰载机尾钩负载及舰载机在甲板上的停留位置，实现了精确控制，有助于延长舰载机使用寿命，并可以回收无人机。

除此之外，涡轮电力拦阻系统还具备自我诊断和维护提醒功能，内置程序能自动跟踪拦阻索磨损情况，帮助舰员及时发现和修复系统故障，显著提升拦阻装置的可靠性，并且仅需

要4名操控员即可完成回收作业，减少了40多名操作和维护人员，有效降低了系统的全寿命费用。

阻拦索既是航母舰载机的“生命线”，也是“夺命刀”。舰载机着舰不成功，就有坠海的危险。

2003年9月11日，美军在举行纪念“9·11”演习时，“华盛顿”号航母上的一架 FA-18“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在降落时出现事故。飞机成功钩住了阻拦索，谁知阻拦索突然断裂，已经部分减速的飞机一头栽进海里。飞行员在坠海前成功弹射获救，然而甲板上的人就惨了，“大黄蜂”重达30多吨，它的冲击力量大部分被阻拦索吸收，蕴含了强大势能的阻拦索断裂后，如两条巨蟒一样，迅速横扫甲板。从当时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有位身穿黄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灵敏跳跃，避开了夺命钢索，但有12人被钢索扫倒，其中数人双腿被扫断。

2016年11月14日，在叙利亚地区反恐的“库兹涅佐夫”号接连出现事故。数架俄军舰载机依次在甲板降落，第一架成功着舰，第二架虽然勉强着舰，但在着舰时，拉断了第二道阻拦索，最后勉强钩住第四道阻拦索停下，但已经导致了几道阻拦索纠缠在一起。这时原本排序着舰的第三架米格-29战机，只好在空中盘旋等待。最终，来不

及等到阻拦索修好，就因燃油耗尽而坠落大海。

同样做着航母大国梦的印度也吃过阻拦索的亏。2014年6月，印度飞行员驾驶米格-29K战斗机在“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上降落时，原本计划钩住三根阻拦索中的第二根，但实际操作中却闹了乌龙。这架飞机错过第二根后，挂上了第三根阻拦索。滑稽的是，飞行员认为自己着舰完全失败，加速启动复飞。于是，这架米格-29K先是高飞数米，接着就被第三根阻拦索直接拉下来，生生砸在了航母甲板上。

中国海军网曾在2013年3月报道，中国在研制第一套阻拦机时，舰载机飞行员在陆地模拟拦阻系统上进行了数千次降落，其中也有拉断钢缆的情况，导致阻拦索在空中横扫，击中了歼-15舰载机的尾翼。

中国航母的阻拦系统虽然起步较晚，但却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直追美国电磁拦阻着舰系统。

2011年，加拿大《汉和军事杂志》曾称：俄罗斯为了报复中国“山寨”苏-33战机自行研制歼-15舰载机，拒绝向中国出售航母拦阻系统，并称由于俄罗斯不给中国提供拦阻索，辽宁舰将成为废铁，中国舰载机将无法在航母降落，只能用于起飞训练。

随后，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

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就进行了驳斥，“俄罗斯拒绝对华出售阻拦索装置”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并称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建设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原则，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制和生产。中国航母平台的主要系统装备包括阻拦索在内，都是自主研发和改装的。

2012年11月25日，中国首次舰载机阻拦着舰试验取得成功，从舰载机尾钩与阻拦索“拉钩”开始到飞机停下，全程只用了2-3秒！

2016年12月，央视新闻联播曾报道，中国新一代航母阻拦装置可拦阻瞬时载荷超过150吨的舰载机。

2017年10月，辽宁舰退役女雷达兵古丽帕丽参加电视节目，讲述她在航母上的三年经历时，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秘密：“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阻拦索），也曾经狂妄地说中国不能造出合格的阻拦索，但事实证明我们不但做出来了，而且让俄罗斯的海军专家看了之后评比说，比现在俄罗斯唯一一艘在役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阻拦索更先进。”

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中国的该项技术与美国在“福特”号上采用的电磁系统大致处于相当水平，某些方面还超越了美国。

例如，用新型结构代替美制的锥形大卷筒，横向尺寸缩小三分之一，重量减少三分之二，进一步改装了阻拦装置的阻尼特性。

中国著名的舰船动力与电气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士马伟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中国成功研制航母电磁弹射阻拦装置仅用了美国1/5的时间，并且中国研究的电磁阻拦技术更高明，更高级。

常规动力到核动力是必由之路

2018年2月27日，中船重工在官网和官微发布的《新时代中船重工高质量发展战略纲要》将中国航母未来究竟维持常规动力还是发展核动力的谜底揭开。《纲要》在重点提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海上现代作战体系时提出：“加快实现核动力航母、新型核潜艇、安静型潜艇、水下无人智能对抗体系、水下立体攻防体系和海战场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等攻关突破，增强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为海军2025年实现走向深蓝远海战略转型提供高质量武器装备。”

军事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国官方首次确认核动力航母计划的存在。实际上，一个国家发展航母选择核动力或常规动力，不单纯是个技术和经济问题，它更多的是由国际和地缘政治

形势、国家海洋战略、军事战略、国防工业实力和造船能力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目前，全球现役航母共有三种动力，即蒸汽动力、燃气动力和核动力。蒸汽动力是航母使用最早、最多的动力。主要原理是把水烧开，形成蒸汽，然后让高压高温的蒸汽推动叶片旋转。蒸汽动力现在仍有一些国家在使用，最有代表性的是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它采用的是KVG-4增压锅炉，与之配套的是TD-12-4型蒸汽轮机。增压锅炉的主要优点是尺寸小、重量轻、经济性高、工作平稳、噪音低和生命力强（10万工作小时）。目前航母使用的蒸汽动力装置，单机最大功率为7万马力，并可建造12万马力的机组，机炉配置一般采用2台锅炉配1台蒸汽轮机。“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采用8台锅炉、4台蒸汽轮机和驱动4部螺旋桨。辽宁舰和第一艘国产航母采用的也是以蒸汽轮机为动力。

除了蒸汽动力，也有一些航母采用燃气动力。燃气动力出现的比较晚，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技术，主要代表是英国的“伊丽莎白”级航母，采用的是MT30燃气轮机。燃气轮机的工作方式与蒸汽轮机不同，先由压气机（压缩机）连续地从大气中吸入空气并将其压缩，压缩

后的空气进入燃烧室，与喷入的燃料混合燃烧，成为高温燃气，推动涡轮叶轮旋转。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中小型航母之所以采用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这种常规动力，主要原因首先是国家的实力有限，烧不起核动力。同时，也因为其战略利益多是区域性的，对航母的续航能力要求不高，部署区域不象美国那样横跨整个地球。再者就是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这两种动力系统的主要缺陷是航行时间较短，续航能力弱，占用空间比较大。

针对常规动力无法避免的缺陷，核动力就成了一些大国航母的发展方向。迄今为止，世界上共有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研制过核动力航母，但真正取得成功并批量装备的只有美国。美国现在服役的10艘“尼米兹”级航母都是核动力的，马上就要服役的“福特”级航母也是核动力的。

苏联曾在1984年立项发展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并在1988年11月25日开工建造，但由于苏联解体，1991年11月彻底停工，停工前实际完成45%。当时其同级2号舰也已经开工建造（但没有命名），1992年2月4日被拆除。

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未来航母发展到底是常规动力还是

核动力，一直争论不休，但由常规动力走向核动力，将是中国航母战略发展的必由之路。

常规动力解决的是有无的问题，是中国特色航母战略发展的前奏和第一步。这是由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军事战略需求所决定的。

2011年7月，《瞭望》杂志社组织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的战略和军事专家就中国发展航母的战略意义采写了一系列文章，突出强调拥有航母的必要性和海军要具备远洋作战能力。提出：“随着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日益拓展，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理应具备保护中国海上交通线和海外利益的能力，中国必须具备远洋机动与远洋作战的能力。”而具备这样的能力，仅仅依靠常规动力航母显然是满足不了战略需求的。

核动力航母的动力来源于核反应堆所产生的热量，例如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主要工作原理是两座压水核反应堆，通过核子裂变产生的能量。除此之外，还有蒸汽轮机备用动力。

与常规动力航母相比，核动力航母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一是动力足。核动力的输出功率巨大，美国“尼米兹”级航母采用的A4W型压水堆，每舰2堆，每堆推进功率14万马力，全舰总功率达到28万马力，可以说是动

力惊人。

二是续航能力强，号称无限航程、无限高速航程。即将服役的美国“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长度为330米，宽41米，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依靠核动力，其动力高达28万马力，可以在30节的高速下航行100万海里。考虑到维修和保养等因素，这么持久的巡航能力对于航母来说几乎是等于无限的。

三是寿命长。目前美军的核动力反应堆堆芯的寿命能达到与航母同寿，即运行50—60年不用填装燃料。而常规动力航母每隔一个星期就需要补充1次舰用燃料。

四是维护简便。与常规动力航母需要大量的动力维修人员不同，核动力航母因填充一次燃料可以50多年不换，不仅使维修变得简便，大大降低了维修成本，而且所需维修人员也比常规动力航母少得多。美军最新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使用的是舰堆同寿技术。也就是说，这种新航母在服役期间将不需要进行任何更换核燃料的工作，从而可节约大量的修理时间和相关的配套资源。

这些优点使核动力航母的优势在服役中开始逐步显现出来：

一、核动力航母无需携带自用燃油，可以携带更多的航空

燃油。“尼米兹”级航母携带350万加仑航空燃油，而“肯尼迪”号携带的是180万加仑航空燃油和240万加仑船用燃油。

二、核动力航母可以部署在更安全的后方，无需靠前部署。

三、核动力航母因为速度快，同样航程比常规动力航母能更快到达战区。

四、核动力航母有更多的储存空间留给战机用的航空燃料和弹药。

核动力航母最大的缺点是造价太高。例如美国“尼米兹”级航母造价高达45亿美元，而且在后来服役的50年，光是维持费用就有120亿美元之多。

一艘核动力航母的核动力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更换一次，但是更换一次难度大、费用高。美国曾做出一个对核动力航母和常规动力航母的花费比较，相同情况下，核动力航母比常规动力航母支付费用高了3000多万美元。

事实上，航母究竟采用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美国国内一直存有争议。美国政府设计局（GAO）综合各方数据分析得出结论：

核动力航母和常规动力航母均能够满足前沿部署、危机响应和作战要求，在许多技战术性能上没有明显区别；核动力航母和常规动力航母，舰载机联队

和舰载机均能充分发挥作战效能；核动力航母在投资、运行、维护、退役等方面比常规动力航母的费用更高。

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和常规动力航母均有参战。美国海军评估后得出结论：在此类强度的局部战争中，核动力航母和常规动力航母在保证舰载机联队作战能力的发挥上，未表现出任何区别。

尽管美国国内一些机构和部门把核动力航母和常规动力航母的作战功能说得如此相近，其核动力航母的发展之路也长期充斥着总统、国会、国防部以及海军之间的较量和博弈，但这些都从没有从根本上撼动美军的核动力航母之路。因为这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

未来，随着“尼米兹”级航母相继退役和“福特”级航母陆续服役，美国航母的“全核动力化”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据评估，“福特”级航母的作战能力相当于“尼米兹”级航母的1.2—1.5倍。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美国的世界第一航母大国地位没有谁能撼动。

2017年3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视察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福特”号时称，该航母是一艘“无可匹敌”的航母，是美国实力的体现，代表着美军的未来。

争论是茶壶内的风暴，一旦需要决策了，美国人在发展核动力航母方面一点也没有犹豫和拖沓。关于这一点，才是中国在发展核动力航母方面最应该看清和警醒的。

在美军不遗余力地发展核动力航母的同时，号称“中国通”的一些美国军事专家却通过各种方式，千方百计说服中国不要走发展核动力航母的道路。理由是：

其一，核动力航母花费过高。从研制到后期的维护起码要花上几千亿美元，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军事战略，发展常规航母就足够了。

其二，中美国情不同。美国之所以会发展核动力航母，因为美军有着全球战略的利益，所以核动力航母的研发能够及时维持海上常规力量，而中国核心利益主要在周边海域，常规航母作战群加上陆基导弹、战斗机以及雷达等，足以应付近海作战。

其三，警惕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军事上一味和美国争霸，其中也包括不顾国力，强势研发建造核动力航母“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军备竞赛的结果使苏联在经济上无法支持军工业的继续发展，最后拖垮了苏联，称“适合美军的装备并不一定适合中国解放军，请不要走苏联的老路”。

美国海军智库甚至认为：短期内中国造不出核动力航母，中国建造核动力航母需要至少10年！

尽管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对中国未来的航母建造究竟是继续采用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一直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比较激烈的争论，但国际社会对中国最终将选择走核动力大型航母之路似乎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们关注的不是中国会不会发展核动力航母的问题，而是究竟第几艘、什么时候会装备核动力的问题。

美军发布的有关中国未来发展航母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国的航母计划是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及资源、技术准备之后才开始实施的，因此中国在2025年之前将能够拥有6艘航母，其中可能会有2艘核动力航母。这一效率已经能够和美军相提并论了。

美国《大众科学》网站发表文章称，随着中国海军从辽宁舰和001A型航母获得更多海军航空经验，中国海军将着眼于更先进的未来航母，如计划装备弹射器的002型和采用核动力的003型航母。

该网站还危言耸听地说，大约再过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海军的实力将能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海军相抗衡，这将意味着，日本和俄罗斯海军将在太平洋退居其后，而主要玩家将会是中国

和美国，这也可能是中国海军独霸太平洋的一个开始。

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称，中国计划建造两艘拥有几乎无限续航力的核动力航母，显示中国有意朝远洋积极发展。

韩国《韩民族报》报道称，中国在建造常规动力航母的同时，正在建造排水量接近美国核动力航母“里根”号的9万吨级以上超大型核动力航母。

俄罗斯之声网站称，中国目前正在为水面舰艇研制自己的核反应堆，未来将其安装在核动力航母上。目前中国拥有为潜艇生产和利用核动力装置的经验。

印度对中国发展大型核动力航母也一直深信不疑，印度媒体认为，中国正在建造一艘核动力航母，体积大得足以挑战美国海军最大的航母，这是新一轮重大军事竞赛的第一波。

显然，不管中国国内如何看待发展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航母，世界已经没有人会相信中国不会走核动力航母之路，他们预言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随着中国在核动力、歼20、电磁炮、电磁弹射等技术上的日臻成熟，以及其他相关关键性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中国拥有自己的核动力航母似乎只剩下决心和魄力了。这也是中国军队抢占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的必由之路。

罗瑞卿在抗大 (下)

□ 陈宇

学习挖土窑洞 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第2期学生结束学业，分配到抗战的各个部队、各个部门。

8月1日，抗大第3期开学，共有学员1272人。其中红军干部795人，占学员总数的63%，包括：王树声、李先念、曾传六、李志民、卢冬生、郭鹏、丁秋生、罗舜初、程世才、李天焕、曹祥仁等。知识青年477人，占学员总数的37%。

8月25日，陕北红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分别担任第115师、第129师师长，率部出征抗日。抗大还为前线输送了1000多名抗日精英。送别战友，罗瑞卿开始全面主持抗大工作。

这年秋天，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奇袭阳明堡、广灵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提高了八路军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加上八路军驻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办事处和设在广州的八路

军通讯处先后成立，各地的知识青年通过办事处以及各地党组织等各种渠道纷纷来到延安。

有学生在诗中写到：“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真经，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他们表示：“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理想信念的力量，牵引着爱国青年冲破重重阻碍，投入抗大的怀抱。

为了接纳日益增多的知识青年，中共中央决定，除抗大外，再创办一所陕北公学，并要求抗大让出部分校舍。抗大校舍本来就不宽裕，再要让出一部分，住所就更加紧张。而且从趋势来看，还将有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抗大势必会有更大规模的发展。解决校舍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罗瑞卿向毛泽东请示：“学员太多住不下，招生是不是要有所限制？控制一下人数。”毛泽东决断地说，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没有窑洞，我们还

有两只手啊！

罗瑞卿听了毛泽东的话，马上行动起来。然而，盖房子要砖和木料，这些都是稀缺资源。经过调查研究和实地勘察，了解到陕北群众自古以来就有利用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有利地形，修建窑洞作为住房的风俗习惯，罗瑞卿确认开挖窑洞是解决校舍困难的好办法。他和抗大其他领导人带着工作人员上门拜当地群众为师，开始学习挖窑洞。试验成功后，罗瑞卿号召全校教职学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计划15天内在凤凰山开挖窑洞150孔，每一孔窑洞长2.5丈、宽8尺、高9尺。他在动员大会上说，现在爱国的知识青年不断来到延安学习，他们都是慕名而来，要参加八路军的。我们怎么办？当然要热烈欢迎。现在最困难的是校舍不足。大家从各地来到延安学习，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挖窑洞。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校园，创建新型大学。并具体讲了如何组织、如何施工以及对窑洞大小的要求。

动员大会后，罗瑞卿扛起



／罗瑞卿(左)给毛泽东介绍我国自制的半自动步枪性能。

一把老镢头，率领1000多名教职学员，来到凤凰山工地，在清凉山下挖下了第一镢。一时间，沟里沟外，山上山下，人头攒动，到处是挥舞铁锹和镢头的人们。大家干劲十足，嘹亮的歌声、劳动竞赛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呈现出一片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的场面。挖窑洞也是一门学问。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有蛮劲可挖不出想要的形状，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挖几下手上就打出了血泡。罗瑞卿就用从老乡

那里学来的经验，手把手地教大家镢土、起拱、掏窗。

10月23日，毛泽东得悉抗大取得了挖窑洞的新成绩后，致信抗大：“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在毛泽东的关心和鼓励下，抗大全体人员更加焕发出冲天的干劲。

突击劳动半个月后，沿凤凰山山坡，共挖成175孔崭新敞亮的窑洞，比原计划超额完成25个。这些新式窑洞，虽然建造时间短，但建筑质量好，成为宝塔山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窑洞内建有土炕、土写字台，洞口安上门窗，窗户糊有白纸，四壁用白灰粉刷，不仅光线充足，冬暖夏凉，而且便于防空袭。当地老乡评价说：“抗大规模大、窑洞多，挖的窑洞最讲究”。

罗瑞卿还组织大家建设和美化新校园，在门前屋后种起了树和草。抗大门前，上下山坡的道路泥泞，许多地方高低不平，甚至有些水沟下雨成溪，大家又一鼓作气，动手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多米的盘山“抗大公路”。

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宛如高楼，特别壮观。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窑洞大学”。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这里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只有这一家”。

11月14日下午，罗瑞卿主持召开抗大新校舍落成典礼。多年后，罗瑞卿在1964年3月《中

《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青年战士成长的道路》一文，回顾说：“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青年跑到延安抗大，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自己动手挖窑洞。毛主席给抗大的学生讲话说，吃小米，打草鞋，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要求培养抗大学员德、智、体全面发展。罗瑞卿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强化这个要求：每天学校供水都是学员轮流到延河去挑；春天，罗瑞卿带领大家挖野菜补充粮食不足；秋后，带领学员磨米挑粮；冬天，组织学员翻山越岭去背炭挑柴。毛泽东对于罗瑞卿创立的这些特殊的教育方式给予高度肯定。

1938年1月28日，抗大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战6周年运动大会，进行军事、政治、体育和娱乐方面的竞赛。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并在闭幕式上讲话，宣布罗瑞卿为抗大副校长，主持抗大的全面工作。

4月，抗大第3期学员经过8个多月的严格教育后毕业，奔赴抗日前线。

4月16日，抗大第4期开学。这一期，多数是从全国各地到延安的青年，学员队伍迅猛扩大，总数达5562人。其中八路军、新四军和白区地下党派来的干部907人，还单独成立了一个



/ 罗瑞卿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3周年大会上讲话。

女生第8大队。校址也相应扩散，北至蟠龙、瓦窑堡，南至洛川，向西远至甘肃庆阳。不仅如此，当年夏天，仅从八路军驻武汉、西安等办事处介绍来的革命青年就多达2288人。6月初，抗大成立2周年，罗瑞卿在纪念大会上自豪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这句话后来成为鼓舞抗大师生的一句响亮口号。

罗瑞卿还主持编写了《抗大组织条令》，条令以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为指导思想，明确了抗大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教育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内容，使抗大的工作有章可循，向前迈进了一步。

8月，第4期部分学员经过几个月的短暂学习，提前毕业，其中1400多名学员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血战。后来的著名烈士张露萍就是这一期的女学员。

1939年1月28日，罗瑞卿主持了抗大第5期开学典礼。全校学员总数达到1.3万余人，是抗大历届学员中最多的一期。

这时，国共关系逐渐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安到延安不到400公里的道路上设立重重关卡，阻拦出入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还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一时间，边区经济形势陷入紧张。罗瑞卿大手一挥：抗大不等不靠，响应党中央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广大师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掀起了突击生产高潮。

对于生产自救，罗瑞卿给党中央、毛泽东提交了报告，写道：“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种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合情合理。抗大决心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结合，知

识和劳动结合。”这个报告，不仅仅是抗大的办学思想，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也为新中国开展人才教育和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6月1日，抗大召开成立3周年紀念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3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毛泽东的话，是对抗大和罗瑞卿在延安办学的阶段性总结，这“很大的功劳”里自然也有罗瑞卿的一份。

罗瑞卿也在《纪念抗大三周年应有的认识》一文中总结道：“本着时代的要求，抗大创立了一套崭新的教育制度，并掌握了最合理的教育方法和学习方法。它表现着许多优良的特点与作风，诸如教学之间的一致、理论与实际联系问题的真正解决。它特别着重于实际的锻炼与实际的教育，特别着重于培养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作风，以及广大学生在自觉的基点上一面学习，一面劳作。可以说它已经在企图开始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现象。所以这一切世界上除苏俄以外，都是任何其它学校所寻找不出来的。”

驻延安美军观察团看到抗大学子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快乐地劳动，表示感到不可思议。世界学联派出柯乐满、鸦德、雷克难、傅路德等人来到延安，

恳请作为名誉学员加入抗大。抗大授予这些学联代表“名誉博士”学位，他们离开后，在世界青年大会上广泛宣传抗大精神，同时代表世界学联发来贺电，赞颂抗大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事业。

到敌人后方去办学

1939年上半年，国民党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胡宗南的军队三面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层层封锁，关卡林立，因此，投奔延安的青年相应减少了。而在黄河对岸，日军不停地炮轰边区吴堡县的黄河渡口宋家川。严峻的形势，又一次考验着抗大。中共中央决定，按照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实行“敌进我退”的方针，组织大批青年学生跨过黄河，到晋察冀等敌后去办学，“把学校放到战场上去办，把学员放到战火中去锻炼”。

6月21日，罗瑞卿主持召开抗大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宣布党中央《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并指出，“抗大上前线，是给日本法西斯蒂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答”，“抗大上前线，是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抗大上前线，是给反共分子、摩擦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抗大上前线，也在日寇面前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

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抗大上前线，将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一个有力条件”。

罗瑞卿奉令率领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等挺进晋东南，深入敌后办学。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激昂嘹亮的歌声，响彻延河两岸。

7月10日，延安万人空巷，为抗大送行。抗大总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师生8000余人，组成八路军第5纵队，也就是后来称作的青年纵队，在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率领下，分成3个梯队，开始了向敌人后方的进军。回顾此次经历，罗瑞卿戏称：“大长征困难，小长征太烦。”为了便于行军、作战和迷惑敌人，抗大总校改用野战军番号，按照部队建制进行编队。他们要途经陕西、山西、河北3省25个县的地区，渡过黄河天险，徒涉水流湍急的汾河、滹沱河，翻越吕梁山、云中山、太行山，穿过敌后日、伪军据点林立的地区，通过日、伪武装严密封锁的铁路线。

罗瑞卿在学员中大力开展“勇敢加技术”的运动，沿途组织大家“练心、练胆、练战术、练耐力”。在过同蒲路等封锁线时，他总是站在铁路封锁线上，鼓励说：“同志们，大家要跟上，

听到打枪也不要停，两边有部队掩护，我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大胆走吧，不要掉队！”罗瑞卿镇定自若的神态和语调，感动和鼓舞了学员们，也教育了各级领导。后来，每当通过封锁线时，各级领导都站在封锁线上帮助大家通过。

挺进敌后的第三梯队通过封锁线时，天已寒冷。学员们没有棉衣，又遭到日军袭击，少数区队被敌人冲散，部分同志被捕。在这生死考验的关头，学员表现得无比坚贞：有的用砖头砸死敌人逃离虎口；有的在被敌人解押途中，冒着生命危险跳离火车脱险；有的被捕后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1940年1月1日，罗瑞卿在行军途中主持了抗大第5期毕业典礼，13个连队的毕业学员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工作，极大地充实了八路军部队的干部结构。

这次历时两个半月，行程约3000余里的迁校行动，粉碎了日军妄图在途中消灭抗大的阴谋。2月20日，罗瑞卿率领抗大师生抵达武乡蟠龙一带，胜利地完成了挺进敌后晋东南的任务。

3月25日，罗瑞卿在《新华日报》发表《论建立抗大在敌后方的意义》文章，对迁校行动总结。他写道：抗大之转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罗瑞卿。

移敌后，大大增强了敌后抗战力量，将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干部，去解决坚持敌后抗战的支柱——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干部的需要。同时，再一次证明，抗大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校始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对于这所培养抗日火种的学校，日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侵华日酋冈村宁次声称：宁可拿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生；用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4月15日，抗大第6期举行开学典礼，这也是罗瑞卿主持的最后一届开学典礼。他在讲话中指出：“抗大今后的方针，主要为我党军队培养干部，应在我党军队建设上起着骨干作用。因此，抗大今后不仅有初级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上级干部之培养；不仅有一般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各种特殊技能干

部之培养，应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使之与整个党军的建设适应起来。”这段话反映了罗瑞卿的办学思想。他在抗战时期即已经提出了我军高级院校办学的目标、方向、结构和规模，为发展我军军事教育提出了鲜明的导向。

深入敌后办学，抗大各分校一边学习、一边战斗。

5月底，出于战争需要，罗瑞卿不得不离开抗大。他在得知即将到野战部队任职后，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份抗大工作报告，就抗大成立4年来的发展概况、成绩和缺点及当前的现状与任务等，作了忠实而详尽的汇报。

6月1日，时值抗大成立4周年纪念大会，彭德怀宣布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6月15日晚上，罗瑞卿处理完第二天要做的事，一直到深夜才睡觉，这是他在抗大工作与战斗的最后一天。次日清晨，他骑马赶路去学校向抗大师生告别，他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过的同事、教员和学员们，一直到天黑才往回赶。结果由于过度劳累，在马背上打瞌睡时重重地摔倒在河滩上。回到家里，他还乐呵呵地对郝治平说：“看来我是不该离开抗大呀！”

罗瑞卿离开了抗大，但他

参与创建抗大和主持领导前7期教学管理工作的功勋，永远留在了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留在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史上。

从1936年1月至1942年5月，抗大总校共招生36012人。

第1期，1936年6月开学，3个科1065人；

第2期，1937年1月开学，14个队1362人；

第3期，1937年8月开学，3个大队1272人；

第4期，1938年4月开学，8个大队5562人；

第5期，1939年1月开学，5个大队13300人；

第6期，1940年1月开学，4个团1个大队2个女生队4900人；

第7期，1941年1月开学，2个科2551人；

第8期，1942年5月开学，2个科9个队6000人。

罗瑞卿离开抗大后，接任校长滕代远“罗规滕随”，在华北敌后频繁的战斗中，先后在晋察冀、晋东南流动办学。1940年11月4日，抗大总部移驻冀西邢西县（现邢台县）浆水镇。

1942年5月1日，抗大总校第8期在浆水镇正式开学，大多数是八路军、新四军送来的干部。1943年1月24日，抗大总校奉命迁回陕北绥德办学，储备干部，准备战略反攻。军事学院（原抗大三分校）和抗大第二分校、



/ 1959年国庆节，罗瑞卿在天安门城楼上。

第七分校并入抗大总校，扩大了规模。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第8期学员毕业，分赴各个抗日战场，参加了对日最后一战。第8期是抗大总校接受分校学员人数最多、学习时间最长的一期，历时3年多，也是抗大的最后一期。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日益扩大，急需成千上万的军政干部去加强部队和根据地建制，抗大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并不断发展壮大，扩大建制。从1936年6月红大成立，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抗大在历时9年零4个月的办学期间，先后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创办12所分校，共培养10多万名优秀的军政干部。还创建了

5所陆军中学、3个独立大队和1所附属中学。

1945年10月16日，抗大总校一部分奉中央军委命令，向东北挺进。1946年2月10日在吉林通化改名东北军政大学，为解放战争继续培养军政干部。抗大至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抗大，这所在战火中建立并成长起来的学校，把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培养成为抗战的先锋、新中国的脊梁，被誉为“烽火熔炉”和“将星摇篮”。在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有元帅7人（朱德、林彪、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大将10人、上将29人、中将105人以及少将366人。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其他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邓小平高度赞誉抗大，是建设抗日军队的火车头，是军事政治科学的领导者。抗大的应时而生，推动了我军院校建设史上又一次重大教育转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巨大贡献。

百岁黄埔同学张鸿茂

□ 吴龙龙

张鸿茂，河南舞阳人，1920年12月23日出生，黄埔18期生。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现居住在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学府路，育有三个子女。

当谈起上个世纪那场全民抗战时，已经100岁的张鸿茂立马来了精神，佝偻的身子挺直了许多，思绪回到了那个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年月……

投身抗战，参加台儿庄战役

1938年3月，为响应保家卫国的号召，不到18岁的张鸿茂与同村伙伴一同报名参军，被分配在第2集团军（抗战爆发前是26军）30师孙连仲部。由于年龄小，他被分到卫生队任担架兵。入伍不到20天，便参加了山东枣庄的台儿庄战役。

“当时没发枪，只发了两颗手榴弹。”张鸿茂说，“台儿庄战斗非常惨烈，日军凭借精良的装备占有火力上的绝对优势，我方伤亡很重，我和战友们积极抢救前线受伤的伤员。由于战况紧急，人手紧缺，打到最后的时候，包括炊事员、马夫、警卫员、卫生员等后勤保障人员都集中上了第一线。”张鸿茂



/ 张鸿茂。



/ 青年时期的张鸿茂。

的左手食指断了一截，就是这场战役给他留下的印记。他说：“当时在麦田里，只看到子弹在身边穿梭，我不知道自己受伤了，

不知道痛。我方士兵大量受伤倒地，抬都抬不过来。”

在这场历时1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约29万人参战，毙伤日军约2万人，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次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最大胜利。张鸿茂由于奋力抢救伤员有功，得到了部队的褒奖。

考取黄埔军校，弃暗投明参加起义

1938年底，张鸿茂随部队到达离家不远的河南舞阳附近，请假回乡探亲，谁知后来与部队失去联系。1939年初，经人推荐，他同村里另一个伙伴前往河南郑州，加入孙桐宣的第3集团军，编入学生营任勤务兵。由于年龄小、肯干，没过多久，便被孙桐宣送到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学习，成为第18期22中队工兵科学员。“两年半的学习，文化课学了一年，第二年白崇禧就带着考卷从南京过来。考试很严格，一人一桌，还分单双号。

录取率不高，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没有考取。通过一年的学习，原本只读了两年小学的我，通过了考试，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正式学员。”毕业后，张鸿茂在部队担任见习排长。之后，奉调四川，编入14师（整编后为66师）。1949年8月，他被调往长沙，担任197师工兵参谋。面对腐败堕落的国民党，他心向光明，不愿同室操戈，带兵随陈明仁将军起义，加入解放军。张鸿茂回忆：“当时有好多部队面临选择，有的团还想继续当国军，向师部围攻施压。但是我认为国民党已经是病入膏肓，我决定跟着部队起义。后来起义成功，我如愿加入了解放军。”

参加解放军后，张鸿茂来到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军政委调派了50名干部参加湖北省的抗洪救灾，张鸿茂被编入建筑工程8师21兵团，担任工程部长。后来，张鸿茂到海南岛修公路，到东北修机场，之后又被调回河南郑州，参加了两三个月的整训。1954年，他随部队到了洛阳，次年转业到洛阳拖拉机厂。1959年为支援江西，到南昌从事建筑工作。1963年调入宜春地区建筑公司工作，一直到离休。

舍小家、顾大家，参与抗洪抢险工作中，张鸿茂总是吃苦

在前，享受在后。儿子张金柱回忆道：“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夏天，宜春丰城地区遭遇特大洪水。接到任务后，作为建筑公司的工程骨干，父亲二话不说就带领同志们上一线抗洪救灾。”当时，张鸿茂家中有年迈的老人和三个年龄尚小的孩子，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几天后，洪水淹到家门口，张鸿茂的妻子决定带着家人去城里高处躲避洪水。滂沱大雨中，一家老小沿着铁轨出发。道路泥泞湿滑，加上晚上光线昏暗，张鸿茂的女儿不小心掉进了水坑。好在巧遇一位好心的学徒工，跳进水坑，把她救了回来。一家人走了大半个晚上，才走到安全地带。而这一切，远在抗洪一线的张鸿茂并不知情，他仍在忙着巩固堤坝、修复损毁的道路、给老百姓修补冲坏的房子……等洪水退去回到家里，他才得知家中的困难。张鸿茂很愧疚，但妻子安慰他说：“你在前线守住集体和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家里有我在就行。”

每当组织上给予他荣誉和照顾，他总是推辞，希望组织照顾其他更困难更有需要的同事。有一次，单位要调动他回省城工作，他又一次把机会让给了一个需要解决两地分居的同事，说他家里有困难应该优先被照顾。

乐于助人、严于律己，优良家风代代传

女儿张爱民说：“在家里，父亲的话不多，但他的言传身教，让我们从小就明白了为人要诚实善良，多做好事。”有一次，张鸿茂偶遇一位正深陷困境而一筹莫展的农民，二话不说，出手帮他度过难关。农民深受感动，此后经常看望张鸿茂。后来，张鸿茂一家搬到宜春市，尽管交通不便，农民仍然特地从丰城赶来看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鸿茂基本上在江西工作和生活，但他始终不忘家乡河南的亲人，直到离休后，他仍坚持每年给他们汇去生活费。此外，张鸿茂对同事和邻居的困难能帮就帮，还常常带着家人帮扶困难群众，为他们送生活物资，并把家庭困难的孩子接到家中照顾。

张鸿茂孝敬长辈，把他的老父亲从河南老家接到江西悉心照料。女儿张爱民说：“父亲恪守着那个年代的传统孝道，每日三餐开饭须得爷爷第一个动筷子，其他人才能开始吃饭。”

而对自己的孩子，他严格要求。儿子结婚那年，缺少家具木料，张鸿茂作为宜春地区建筑公司材料供应科副科长，负责各类工程木材的采购，却不肯为此开一点小灶，并说公是



/ 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张继钦(左二)带领机关干部走访慰问张鸿茂(左三)。



/ 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张继钦(左)看望张鸿茂(右)。

公，私是私，决不能利用工作便利为自己家庭谋取好处。后来，家里的孙辈们陆续工作了，张鸿茂时常找他们谈心，让他们好好工作，不要怕吃亏，吃亏就是福。良好的家风成为儿女们一生的精神财富，也对孙辈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他们家个个学有所成、工作表现优秀，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和谐大家庭。

弘扬黄埔精神，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进，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这首黄埔军校的校歌，张鸿茂读黄埔军校起就开始唱。如今，他还常唱起校歌，感受当年的热血青春。遥想当年，在歌声激励和黄埔精神感召下，他和一群意气风发的黄埔学子，投身到与日寇的殊死搏斗中，最终赶走了侵略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黄埔精神继续鼓舞着他们参与到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中。张鸿茂先后前往东北、湖北、海南、广西和江西参与祖国建设，并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和劳动模范。60岁时，他已到离休年龄，单位却希望他继续留任发挥余热，但按照当时的政策，不能发在职工资。他二话不说，又干了3年。正式离休后，张鸿茂一如继往关心祖国建设。儿子张金柱说：“2008年5月汶川地震，

父亲收看新闻时泪流满面，要求我们代他向灾区捐款捐物。”

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张鸿茂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张鸿茂说，每当看到自己珍藏的纪念章，都倍感欣慰，感慨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更无悔当初投笔从戎就读黄埔军校的选择。

作为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他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并常常告诉大家要珍惜现在的和平幸福生活。在他的百岁生日宴会上，张鸿茂动情地说：“我活了100年，一辈子经历过很多事情，感觉和平才能幸福。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全体华夏儿女都能安享和平，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

非常之人

——记兰州市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组长王进华

□ 张遵道

2002年年初，我开始协助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兰州市七里河区联络组编辑《黄埔情选编》一书。6月，应邀参加联络组组织召开的第一次黄埔二代座谈会。从此，便与黄埔前辈结下了不解的情缘，至今已有18个年头。这些看似极为平常的老人，其实一点都不平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投身过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而英勇奋斗，无怨无悔地奉献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当我置身于这个英雄群体中，总是被他们的爱国情怀所感动。尤其是他们的排头兵——联络组组长王进华，当属我最为敬佩的黄埔老兵之一。

初识王进华老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那时我还没退休，他常来我家找我父亲，有时与黄埔老人孙天笠一起来，三个人总是兴致勃勃地对一些文稿材料进行讨论，一谈就是好久。每次他们走后，家父便伏案写个不停。出于好奇，我问父亲在忙碌什么？他随手拿起一叠油印材料让我看，原来那是由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编印的名为



/ 王进华。

《黄埔情》的油印小报。读后，立刻被它刊载的内容所吸引。特别是看了黄埔老人回忆自己参加抗日战争时亲历、亲见、亲闻的文章，我不由自主地被他们的爱国激情所感动，对这群黄埔老兵肃然起敬。从此，我成了这份小报的热心读者。我问父亲，你们这位组长王进华是个什么样的人？通过家父的介绍，才知道这位黄埔老兵是位很不一般的离休干部。他多年如一日地扑在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的工作上，凭着不怕艰苦、勇往直前的执着，带动七里河区几十位黄埔同学贯彻黄埔军校同学会宗旨，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优异成

绩，获得区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

1921年8月7日，王进华出生于甘肃省临泽县蓼泉乡双泉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半耕半读，直到17岁才勉强读完小学。1942年，酒泉肃州师范毕业后，恰逢国民政府军训部部长白崇禧视察西北，在酒泉的民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详谈了抗日前线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战斗，大后方众志成城支援前线的感人事迹，号召热血青年踊跃参军，保家卫国。时年21岁的王进华被深深打动，回到学校，他立刻联络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决心报考黄埔军校。他们写好申请书，找到白崇禧，表明心志，受到白崇禧的称赞。白崇禧亲自给黄埔军校教育长万耀煌写了推荐信，让他们奔赴成都报考黄埔军校。他们在行署曹专员的帮助下，以押运汽油名义，搭乘了玉门矿务局的拉油车，颠簸月余，到达成都，进入黄埔军校19期工科学习。1945年，王进华军校毕业，被分派到青年军206师进发新疆，后又历任178旅排、连长，驻守哈密机场。1949年9

月随军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哈密抢劫事件”中，因保卫机场有功，受到嘉奖，随后被选送到新疆兵团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分派到6军炮工团8连任副连长。

1954年，王进华转业到甘肃省商业厅基建处。1962年，调到省商业厅商业通用机械厂负责基建事务。30年来，他恪尽职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被大家称为“老先进”。1984年光荣离休。1989年1月，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1990年，他加入同学会。1996年，任七里河黄埔联络组组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联络委员会委员。两次被评为省优秀会员，一次被评为优秀通讯员，还被推选为省黄埔同学代表，参加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他所领导的七里河区联络组，4次被评为先进联络组。

——牢记黄埔军校“亲爱精诚”的校训，任劳任怨当好联络组的管家和勤务员。不论组内哪位同学生病住院或在家疗养，王进华都要约上副组长登门看望，送去温暖。同时，积极为黄埔同学排忧解难。一次，组内有两位黄埔同学患病住院，无力承担医药费。王进华及时

向区委有关部门反映，有关部门领导立刻到医院看望，并多次出面与有关各方联系协商，解决医药费。这样的关爱也给了两位黄埔老人莫大的精神鼓舞，他们病愈后加倍努力做好黄埔联络组的工作。碰到组内同学逝世，他及时报告省同学会并去逝世同学家中吊唁，安抚亲属。每年春节，他都到各位同学家拜年。每逢组内同学80、90寿辰以及每年老人节，他都要张罗举办庆祝活动，并邀请省同学会及区委有关领导和黄埔同学的亲属、子女参加，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2000年老人节，他组织了18对黄埔伉俪在兰州友谊宾馆举行金银婚佳禧庆典活动。宾馆的经理、员工特别制作了大型蛋糕赠送给这些黄埔老英雄。那天，恰逢几位到兰州旅游观光的台湾同胞住在友谊宾馆，他们看到这一场面，赞叹不已，纷纷拿出相机拍照，并说回到台湾后，一定要广为宣传。上述各类活动举办累计已达200多次，如今已成为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的传统得以保持，极大地增进了全组的凝聚力。王进华接任组长时，已是75岁的老人，但他往来于居住分散的同学家进行访问、联络、调研、送书刊资料等，经常都是骑自行车甚至步行，有时一天行程近百里，但从从不叫苦。因经常联系同

学，他家里的电话费用高，组里要给他适当补助，被他谢绝。同学们称赞他是联络组的“黄埔牛”。

王进华抓好同学生活的同时，不忘抓同学的学习。他把每月一次的集体学习制度化：学习前认真做准备；学习中安排中心发言，开展交流讨论，并组织专题报告会，邀请专家进行答疑解惑，有时还与兄弟联络组联谊交流，采用学习问答、通报同学动态等形式，活跃学习气氛。在他的精心组织和带动下，全组同学都非常珍惜每次学习机会，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认识，紧紧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参加学习的人数一直较多，甚至经常出现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同学，让子女或老伴陪送前来参加学习的感人场景。七里河区委有关领导称赞联络组黄埔老人的政治学习活动“雷打不动，风雨无阻，是全区相关系统各组织中坚持最好的单位”。

——宣传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秉承徐向前元帅“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统一尽力”的教导。1990年，加入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后，王进华便积极投入《黄埔情》的印刷、装订、分送工作。1996年担任联络组组长，作为《黄埔情》的主编，他带头写文章，认真组稿。在他的带



王进华在整理稿件。

领以及编辑组几位黄埔同学尽心竭力的操持下，小报逐步从手刻蜡纸油印变为打字复印，印数增加，栏目增辟，送阅范围扩大，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多年来一直被黄埔同学争相传阅称赞，也成了联络组凝心聚力和鼓舞士气精神源泉。

2002年春，在几位同学的倡议下，联络组决定组成以王进华为首、平均年龄82.4岁的5人编委会（其中有我父亲）。他们的目标是要从已经刊发了24期、约30多万字的《黄埔情》小报中精选出一批佳作，同时再发动联络组黄埔同学和黄埔二代撰写新的有关自己的奋斗经历和

缅怀父辈的文章，自费编辑出版一本具有黄埔史料价值的书，作为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30位尚健在的黄埔同学向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我曾担任过科技杂志编辑乃至主编十余载，也参与过数十种科技书籍的编著工作，但不曾见过全由耄耋老人组成的编辑组。他们这种蹈励奋进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当他们邀请我帮助完成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时，我便义不容辞地加入到这个特殊的行列中。这件事得到七里河区委有关部门和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领导的支持、鼓励和资助。经过半年的辛苦

付出，编辑组终于在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前一个月，将一本分列12个栏目，载文130篇（包括诗词作品32首）、照片12幅，共12万字的《黄埔情选编》印刷出版。该书出版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有人称赞说：“这是在全国开创了一个小小基层黄埔联络组坚持编刊出书的先河。”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王身璋说：“它不仅是我们黄埔同学珍藏的文史纪念品，也为当代和后世留存了一份宝贵的黄埔精神财富。”93岁的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曹叔希说：“七里河区联络组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各地黄埔老兵都能这样干，为当代和后代留一点遗篇，将是功在当代、泽及后代的盛举，而我们黄埔军校爱国革命的精神也会昭垂史册，与世共存。”时任《黄埔》杂志社社长的李庚起还为此发表了一首《特殊啊特殊》的诗，诗中赞扬这些黄埔老人“特殊的感情特殊的爱，特殊的记载特殊的根，特殊的精神特殊的笔，特殊的向往特殊的印”。从此，《黄埔情》小报成了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的“名片”。2009年，为纪念黄埔军校建校85周年暨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20周年，编辑组又出版了一期《黄埔情》特刊，作为礼物赠送给在兰州参加庆祝大会的与会者，

引发了一片赞叹。

此外，王进华还充分发挥黄埔同学的特殊优势，做好台湾及海外黄埔同学及亲属的联络工作，为祖国统一尽力。他不仅自己千方百计与在台的同学、同乡写信联系，还鼓励联络组成员给台湾及海外黄埔同学写信，介绍祖国辉煌建设成就，宣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经济困难者的邮寄费用由联络组报销。多年来，组内有20多人通过写信、打电话，寄赠诗词字画、贺年卡，交换文艺作品等方式，与在台湾或海外的黄埔同学联系达数百次之多。2005年4月，部分黄埔军校19期同学在成都举办毕业60周年纪念联谊活动。不巧的是，王进华因病住院不能前往，当他得知有20多位在台湾及海外的黄埔同学也要去参加时，立即组织其他同学将40本《黄埔情选编》送到他们手中。台湾及海外的黄埔同学感动不已，表示一定要把这份珍贵的礼物带回去认真拜读、传阅。联络组同学还积极接待来兰探亲访友、观光旅游的台湾及海外黄埔同学和亲友30多次。王进华常说：“不要小看我们黄埔老兵做的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情，只要诚心坚持努力，终会水滴石穿、集涓成河的。”

——带动联络组的黄埔同



/ 张淑菊(中)与黄埔同学合影。



/ 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寇永杰看望王进华。

学关心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发展建设，积极参政议政，演绎了一段多党合作的动人故事。他担任区政协委员期间，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调研、座谈、评议、

视察、考察、政情通报等活动。他在政协会议上谏净言、献良策的提案，两次被评为优秀提案。此外，他还发动联络组黄埔同学就群众反映的热点、难



/ 七里河区联络组庆贺十八对金银婚暨同学八十寿辰联谊会。

点问题，向政府口头或书面提出过近百条意见或建议，大部分都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采纳。他本人被评为优秀政协委员，被推荐进入区政协提案委员会，还被聘为区环保监督员。

1997年，兰州市七里河区委为切实贯彻党中央、省委的有关政策精神，制定了一个关于四大班子领导与民主人士“交朋友”的对口联系制度。时任区委副书记的张淑菊，早就听说七里河区有个受人尊敬的黄埔联络组，便主动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的交友对象。经多方询问，她由龚家湾街道干部领路找到王进华组长家登门造访。从此，两个对事业同样忠诚执着的人开始了忘年交。张淑菊十分关心黄埔联络组的工作开展和学习进步，多次参加联络组的学习交流座谈及其他活动，为黄埔

同学辅导政治学习，解答疑难问题，及时通报政府工作信息，认真听取意见。她还在王进华老人的陪同下走访了多个黄埔老人家庭，探望生病住院的黄埔老人。往来多了，日久知心，张淑菊和联络组的黄埔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上世纪90年代，张淑菊从联络组赠送给她的《黄埔情》油印小报上，看到他们自费办报的艰苦情况，便主动向联络组提出每年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200元，帮助他们把这份催人奋进的小报办好。多年来，这项资助累计已近5000元。在走访黄埔同学家庭的过程中，见到一些贫病的黄埔同学依然无怨无悔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张淑菊被深深感动，毅然把自己每年的年终奖金、稿费收入等，捐献给七里河区生活困难的黄

埔同学。15年来共慰问资助了近300人次，累计金额达3万多元，大家称赞她是“党的好干部，黄埔贴心人”。其实，张淑菊2004年春已经调离了七里河区。在离开七里河区的10余年时间里，她5次易职。但她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心系这个小小的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仍然抽空参加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举办的各种活动。遇上黄埔同学的生日，她还不忘给老寿星带上生日贺礼，就算来不了，也要托人把礼品送到会场。2012年6月15日，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在王进华的精心组织下，举办了一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88周年的联谊会。张淑菊特意赶来参加。她一进门，就与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寇永杰副会长和在场的黄埔同学相拥握手，就像久别的亲人相见。10多年来，这样的场面我已经很熟悉，但每次看到都感慨万千。

——重视做好联络、带动、团结黄埔后代的工作，给联络组增添活力。王进华自担任七里河区黄埔联络组组长后，看到组内同学多已到或临近耄耋之年，组织开展活动常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加上自然减员不断，联络组的工作面临严重挑战，必须想方设法解决。他吸取部分省（市）黄埔军校同学会

做黄埔后代联谊工作的宝贵经验，经组内黄埔同学的帮助，逐个摸清了在七里河区工作、生活的黄埔二代的基本情况，然后有意识地与20多位黄埔二代建立了联系，并邀请他们参加黄埔联络组的活动，以启发教育他们积极支持父辈事业，继承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贡献。

2002年6月2日，经区委有关部门和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同意，他以黄埔联络组的名义，召开了省内第一次黄埔后代代表联谊座谈会。会上，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主要领导前来参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王进华还特意安排蜚声陇原的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埔军校16期学长欧阳造极给大家上了一堂黄埔军校史的知识课。与会的黄埔二代们心情激动，踊跃发言。我是头一次参加黄埔联络组的活动，也在发言中许下诺言：“我现在已退休在家，有的是精力和时间，如果省黄埔同学会需要我，我当义不容辞，履行使命。”座谈会后，七里河区的不少黄埔后代，在前辈们的感染熏陶和带领下，积极参与联络组的活动，并为之献计尽力。联络组还先后将我和边强同志推荐给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受聘为《甘肃黄埔》杂志编辑。多年来，我们



/ 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姚慧珍慰问王进华。

在“为黄埔同学立言”的编刊、著书工作中尽力不负寄望，发挥了应有作用。

近10年来，王进华笔耕不辍。2012年6月，他历经4年辛勤撰写的《我的黄埔情节》（共15万字、116幅照片）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18年，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将多年来撰写的散文、诗作悉心整理成15万字、80幅照片的《进华文集》奉献于社会，再次展现了他永不停息的昂扬斗志和爱国情怀。

如今，王进华已是99岁的鲐背老翁了，但他依旧秉持黄埔

军人那种砥砺奋进的牛劲，精神矍铄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立下誓言：“永远履行黄埔军校同学会‘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生命不息，前进不止，黄埔军人，奋斗终生，只有倒下，没有退下。”曾经，我问父亲王进华是个什么样的人。如今，我有了自己的答案：他是一个用心血做好每一件事，用真情对待每一个人，用行动团结带动他人向前的非常之人！

血战黄河大铁桥

——纪念外公詹化球诞辰 119 周年

□ 邬霄勇

外公詹化球名孝严，字恩沐，号克帝，1901年6月16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西店镇老詹家村。外公的父母均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从小就教育外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常讲述一些英雄人物保家卫国的故事，要外公以他们为榜样，为国家民族尽忠出力。

1914年，外公被送进县城正学高等小学读书，该校命名“正学”是为了纪念宁海明代先贤方孝孺。学校教师均为当时宁海名儒，要求学生“正心修身”，以方孝孺为楷模，方孝孺的生平事迹和作品是学生的必读科目。在老师的教导下，外公更加坚定了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而奋斗的远大抱负。

1919年秋，18岁的外公从正学高等小学毕业，来到省城杭州，恰好遇上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招生。该校是为了继承辛亥革命先烈秋瑾遗志而创办的，因此偏重军事训练。1920年春，外公被录取。体校学制三年，除必读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科目外，还开有专业课，如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体育学、



/ 詹化球。

兵器学、国术、实弹射击等。在校学习期间，外公受孔壩老师的影响最大。孔老师是宁海人，不但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还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述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事迹，给外公留下了深刻印象。1923年秋，外公从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遵从母命，回家结婚（妻子姓邬），暂时留在家乡小学任教。

1925年年底，黄埔军校第5期招生，外公告别了母亲和新婚妻子，只身前往广东报考，被录取为工兵科学员。为了表明自己要在革命大熔炉中冶炼、彻

底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外公改名“化球”，字“赤生”。次年3月入学，经过一年半紧张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训练，1927年8月15日，外公通过了考试，以前三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军校规定：每一届前三名毕业生可留校工作。外公留校，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任宣传员。随后参加了北伐，历任第9军第3师军区处上尉指导员、总司令部特务营上尉副连长、两浙盐务缉私局第3营营部稽查员、缉私局特务队队长等职，后转入税警团。

1936年上半年，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保障铁路安全非常重要。因此，11月开始从原来的交通兵团中抽调一部分人员，组成铁道兵团，外公也名列其中，在当时培养专业干部的干部教导连（学员都是一些有专业知识的少尉军官）任少校连附。

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平津，即兵分四路向华北扑来，其中一路由平汉路进攻河南。沿平汉路南下的是日军土肥原贤二率领的侵华主力14师团。该师团按作战计划须在1938年2月8日

以前攻取河南新乡。新乡位于平汉、道清铁路交叉点，北制安阳，南扼郑州。郑州黄河大铁桥则是南下的咽喉，所以新乡是豫北的重要战略据点。日军连日用飞机轰炸新乡、黄河大铁桥。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殊死抗击强敌，粉碎了土肥原贤二2月8日前攻取新乡的美梦。

随着敌人的不断增兵，1938年2月10日，第一战区长官程潜命令新8师开赴郑州黄河铁桥防守，并命令在河南境内新组建的铁道兵团即刻奔赴前线，一面修复被炸的黄河铁桥，让中国军队物资和人员得以通行，一面准备在万不得已时炸毁黄河铁桥，阻止敌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郑州，直下鄂湘大地。先行执行防守黄河大铁桥任务的是外公带队的铁道兵团中最优秀的干部教导连，约800人。2月10日，外公带领的兵团干部教导连星夜急行军至大桥南岸，马上投入桥梁的抢修工作。经过2天2夜奋战，完成抢修任务。13日，从北岸来的列车又开始从大桥上驶过。但一个十分不利的消息也随着大桥的畅通传来：日军的一个联队（一个团）尾随列车向大桥扑来。在大铁桥两岸只有外公率领的一个兵团干部教导连，加上原一个连的警戒部队，总共约1000名官兵。而日军是3000多人，双方力量实在相



/ 1919年，詹化球（中排左四）的小学毕业合影。



/ 中国黄河第一铁路桥遗址。

差悬殊。外公急忙向正在向大桥进军的新8师师部报告请示，得到回答：“大部队以最快的行军速度，也要一天一夜后才能赶到。”蒋在珍师长在电话中斩钉截铁地说：“你们现在一定要把这个缺口堵住，这关系到整

个武汉会战的胜负，我们已派小部队快速增援你们，只要能守住大桥一天半日，就是胜利，纵余一兵一卒，亦不得擅自撤退！”外公回答：“请师座放心，只要我们还有一个弟兄在，大桥就决不会放弃！”



/ 1940 年，国民政府给詹化球颁发的褒奖令。

外公其实明白，双方不仅兵力相差悬殊，武器装备也相差极大。铁道兵团除了自卫武器外，弹药不多，重武器缺乏。而敌人武器精良，士气正旺，想要在大桥上堵住他们，实在是难上加难。但已没有退路，他马上下令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挖好掩体和战壕，收集原守卫部队留下的所有武器弹药，集中在桥南岸。外公想：目前只能利用狭长的空间，层层阻击来

对付装备精良的日寇。外公站在大铁桥上向全体官兵说明目前的实际情况，并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已到了为国尽忠的最后时刻，已经没有后退的路，身后都是一些需要尽快转移的老百姓和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日寇过桥，誓死守住大桥，中国不会亡！”

官兵齐声喊道：“誓死守住大桥！中国不会亡！”宏亮的声

音，仿佛黄河滚滚波涛，在怒吼，在咆哮！

战斗在午前打响，日军组织了一次次冲锋，妄图占领桥南岸，但外公凭借有利地形，沉着指挥，一次次将其打了回去。日军寸步难行，死伤数百，速战速决的部署一时间难以实施。由于摸不清守桥的中国军队人数，不敢贸然行动，日军就一味地用炮轰。部分士兵被日军炮弹击中，伤亡不在少数。另有

一些士兵被炮弹掀起的土掩埋，但炮声一停，他们又抖落泥土，拿起枪，向冲上来的日军射击。就这样来来回回，一直打到傍晚，日军始终无法突破大桥南岸。但我军也伤亡过半，弹药已消耗殆尽。

夜幕很快降临，日军又一次冲过来。外公上好刺刀，纵身跳出掩体，高喊：“弟兄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死也要守住大桥！”然后，第一个冲上前与日军拼刺刀肉搏，剩下的士兵也紧跟而上，日军被中国士兵的英勇气概所震慑，纷纷后退，铁桥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血肉拼杀。鲜血染红了黄河第一大铁桥……日军向北岸退去，南岸仍飘着中国旗！

当天夜里，新8师李昌容的一个团终于赶到，只见大铁桥南岸到处是敌我双方士兵的尸体，鲜血在铁桥上已凝结成厚厚一层。掩体里除了几名奄奄一息的重伤员，还意外听见一个小女孩的哭声，李团长连忙将大衣裹住小女孩，问：“你是谁？”小女孩的耳朵已被震聋，听不到声音，再三询问后才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回答：“我是詹……化球的女儿，叫若娟，父亲……还在桥上……”李团长走上大桥，只见外公面朝北岸，背倚着栏杆圆睁着双眼，全身满是枪眼，早已停止了呼吸。李团长



/ 郝柏村(右二)为詹化球题字。

摘下帽子，深深地向外公鞠了一躬，叫人将外公抬回南岸安葬。随后，李团长将外公8岁的女儿（我母亲）带回后方，交给后勤人员抚养并送入遗族学校读书。

1940年3月2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发对外公的一级褒奖令和抚恤令，追晋他为陆军中校，牌位送南京英烈祠。1947年12月，外公被编入《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浙江省宁海县卷）》。

郝柏村来到大陆时，为殉国在黄河大铁桥的外公挥笔题写了“英烈千秋”四个大字。

我的母亲詹若娟已于2013年去世，享年83岁。生前除了耳朵听不清（当时被日军的炮弹震坏）外，身体健康，曾经多次带我去黄河大铁桥遗址祭拜外



/ 詹若娟。

公，并反复告诉我：“你外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牺牲的，为的就是要守住母亲河上的这座大铁桥来掩护老百姓和重要物资的转移！”

耄耋老人的一封家书

□ 葛辉

家父赵昌然，“一生充满传奇般的经历，饱经忧患又结局完美”。他年轻时满腔热血，为保家卫国，投笔从戎，从上海交大肄业，考入黄埔军校16期。抗战期间，家父参加过宜昌会战、上高会战和远征军在缅甸的同古会战，后考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学习飞机设计及制造技术。解放后，他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校、南京航空学院、华东交通大学等院校，从事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热能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40余年。离休后，他仍热衷社会活动，担任过华东交通大学外经学院副院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会长等职务。

家父既是一名黄埔抗战军人，也是一名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一生待人宽厚真诚，在生前身体还硬朗时，时常和亲朋好友鸿雁传书，传递着问候、寄托着感情，滋润抚慰收信人的心灵。

父亲处事认真严谨，华东



/ 赵昌然。

交通大学、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举办活动时经常邀请父亲致辞或发言，父亲常常伏案撰写发言稿直至深夜。因为家父的写作习惯，我们得以拥有了一笔丰厚的“家产”，并在他身后仍能学习、传承其风范和精神。

2012年春节，由兄长晓源牵头，我们五兄妹把父母亲写下的一些文字资料，包括家书、发言稿、随笔、诗词等，整理

汇编成册，取名《墨漾华彩 纸蕴亲情》。庚子初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处专门为《黄埔》杂志“黄埔家书”栏目来电约稿。这不由地让我想起，家父生前对《黄埔》杂志的喜爱。他常常一收到杂志，便取出眼镜，从封面至封底一页不落地阅读，还会用笔在空白处做标注。我不敢辜负省同学会的诚意，动笔写稿。翻开《墨漾华彩 纸蕴亲情》，把父母亲的书稿一篇篇重新读来，其中有写给第三代孩子、给我们兄妹的信件，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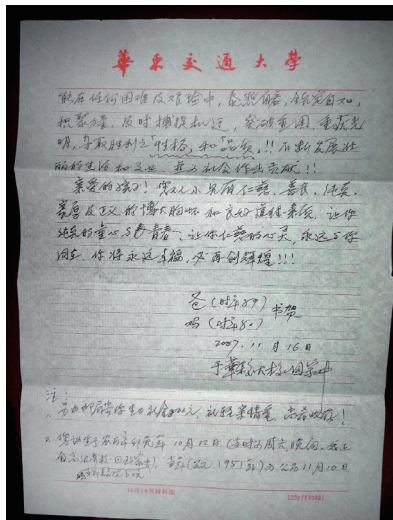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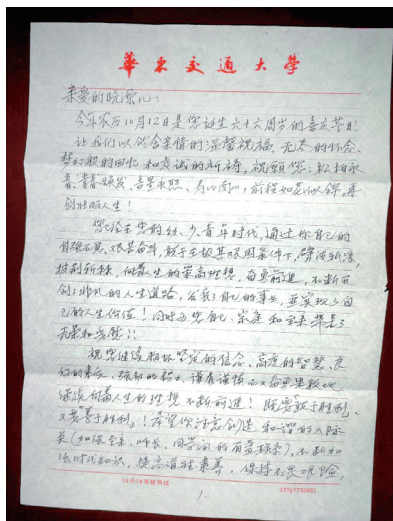
致旅台黄埔学长、单位领导的书信，等等。或谆谆教诲，或万千叮嘱，或叙情析理，言语从容而舒缓，读来让人口齿留香。想到家父离开我们已有两年，又不禁潸然感怀。

在此，摘录一封家父致兄长晓源的信件。其时，兄长已过知

天命之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但因定居于合肥，远在南昌的耄耋父母仍多有牵挂。此封家书读来让人无比动容。



/ 赵昌然夫妇部分文稿汇编《墨漾华彩 纸蕴亲情》。



/ 赵昌然家书原稿。

亲爱的晓源儿：

今年农历10月12日是你诞生五十六周岁的喜庆节日！让我们以饱含亲情的温馨祝福、无尽的怀念、梦幻般的回忆和虔诚的祈祷，祝愿你：松柏永青、“青春”焕发、吉星永照、寿比南山，前程如花似锦，再创壮丽人生！

你已经在你幼、少、青年时代，通过你自己的自强不息、艰苦



/ 2009 年国庆，赵昌然在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举办的庆祝活动上致辞。

奋斗，敢于在极其艰困条件下，劈波斩浪，披荆斩棘，向着人生的崇高理想，奋勇前进，不断开创了非凡的人生道路，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并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为你自己、家庭和至亲带来了光荣和安慰！！

祝你继续胸怀坚定的信念，高度的智慧，良好的素质，强韧的毅力，谦虚谨慎而奋勇果敢地继续向着人生的理想不断前进！既要“敢于胜利”、又要“善于胜利”！希望你注意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至亲、师长、同学间的有益联系），不断加强时代知识学习，提高道德素养。保持不畏艰险，能在任何困难及艰险中，泰然自若，镇定自如，积聚力量，及时捕捉机遇，突破重围，重获光明，夺取胜利之“性格”和“品质”！！不断发展壮丽的生活和事业，并为社会作出贡献！！

亲爱的孩子！你从小具有仁慈、善良、纯真、宽厚及正义的博大胸怀和良好道德素质，让你纯真的童心与青春，让你仁慈的心灵，永远与你同在。你将永远幸福，必再创辉煌！！

爸（时年89）、妈（时年82）
2007年11月16日
于华东交大校园家中

兄长晓源曾在一篇回忆家父的文章中写道：父亲所写的各类文字，无不体现着他丰富人生的积淀。他善于从琐事中领悟生活的哲理，从日常中看出生活的本质。他善于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高度去把握、预测、筹划人生。过去，我们以为这是大道理，是场面上的话。现在，我们才理解，在这些看似平淡的文辞之后，深含着数十年的沧桑阅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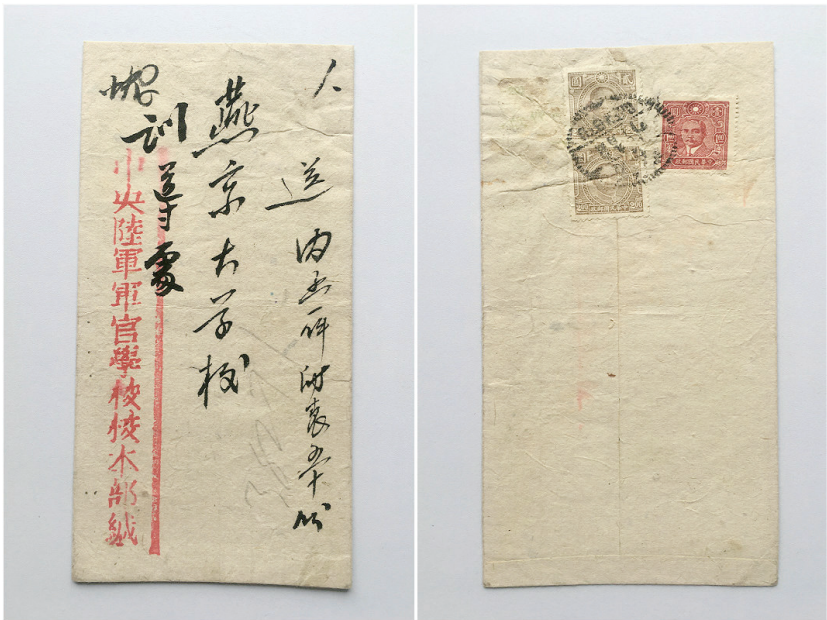
中央军校致燕京大学实寄封

□ 单补生

实寄封是经过邮政投递后的信函封套，一般贴有邮票或其他邮资符志，盖有收寄局及投递日戳。实寄封是时代的纪录，承载了比邮票更多的信息，对印证有关事项的史实，起着重要作用。

成都集邮轩专营实寄封及邮政史料，店主老刘是行内资深集邮研究者。笔者在其店购得一封民国实寄封，封套尺寸18*8厘米，封面文字竖向格式，寄信方为一号宋体红色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本部缄”，收信方为“燕京大学校训导处”，旁注“送内函一件，附表五十份”，左上方墨书“快”字，右边上方墨书数字“1”，意为首送校序。

健谈的老刘向我介绍了成都燕大校史，他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燕京大学遭日寇封闭。次年10月2日燕京大学正式在成都复校，开学上课，并决定12月8日为复校纪念日。校址选在成都陕西街华美中学，旁边启华小学为女生宿舍，何公巷文庙为男生宿舍。燕京大学与成都华西坝之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齐鲁



/ 中央军校致燕京大学实寄封。

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均为基督教大学，时称华西坝‘五大学’，声誉最高者为燕大。成都燕大坚持办学到抗战胜利，于1946年师生复员回北平燕园。”

听其一席话，获益匪浅。我又请他解读实寄封年份，他娓娓而谈：“中央军校和燕京大学都在成都，实寄封属本埠邮件，邮戳为成都戳，唯‘九月’二字清晰。邮资是贴了计5元的邮票，1944年3月至1945年9月成都本埠邮费是5元。准确时间因内函缺失，无法佐证，但凭附

表50份，可推断为1944年9月。而1945年9月正值抗战胜利，燕大准备复员回北平，双方已无暇顾及了。”老刘如此抽丝剥茧，令人信服。不过，让笔者牵肠萦心的是那50份附表的内容：一、是军训计划吗？不肯定。尽管训导处军训教官出身黄埔，却不隶属中央军校。二、是入伍生登记表吗？有可能。凡陆军、空军各军校录取生都要到中央军校接受入伍生教育，以视黄埔统一。三、是招考英语译员登记表吗？估计是。当时美军援华人

员过万且增加，急需英语译员。到底是哪一种附表，有待进一步考证。总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本部”实寄封现身民间，已属凤毛麟角，它为研究黄埔军校同大学训导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物证。

民国训导与军训

何谓训导？释义为教诲开导，是教育学名词，但不是新名词，它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按明代县学置教谕、训导，这“训导”是官名，主要掌管教育事务；清代仍设置，直到清末才废掉。魏书刁雍传著教戒二十余篇，以训导子孙；由此可知“训导”二字含有“使个人行为合乎当代正轨标准”的意义。复次分释“训导”的字义，诗云：“四方其训之。”书云：“是训是行。”这“训”字是“顺从”的意思；周礼之士训诵训，书之注解谓训，这“训”字是解说的意思；古训经训，这“训”字是法规的意思。故“训”字含有“教诲、顺从、解说、法规”的意义。再就导字，书孟子云：“则君使人导之出疆”，这“导”字是“引”的意思；“导”字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启迪开导的意思。

训导和训育，其名虽异，而实则相同，盖两者的目的，具



/ 1933 年岭南大学之军训。

在陶冶学生的品性，不过因为民国中小学的学生身心发育尚未健全，智德基础尚未巩固，一切行动有待教师训之育之入于正轨，故中小学用训育的名词可谓得当。至于大学生则因身心发育已健全，智德诸育具已奠定相当基础，关于德育方面可导之扩展，不必再绳之以法规，故大学用训导的名词，也可谓得当了。用现代的术语来讲，训育的顺序有二，前期的训育在于良好习惯的培养，后期的训育在于自治自律精神的扶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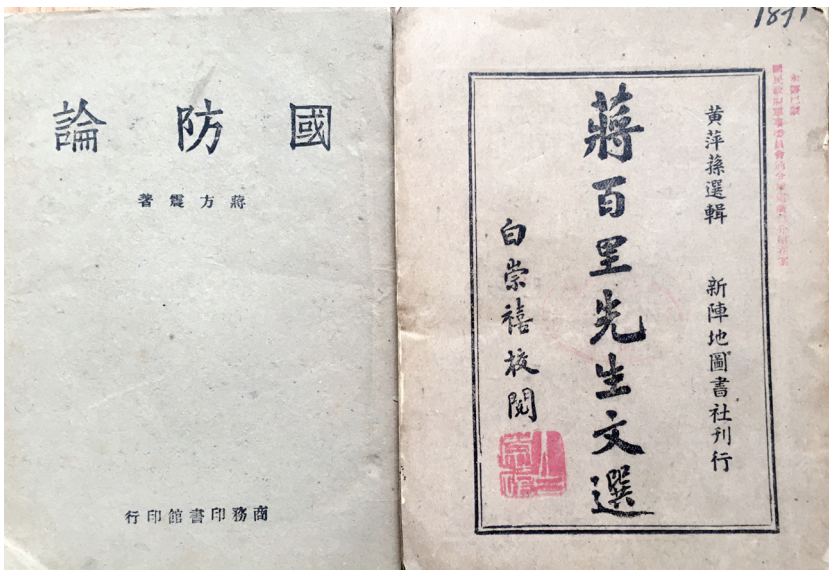
1941年，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王裕凯，针对当时大学训导情形著书《大学训导之理论与实施》，其在书中合理指出：

大学的训导应发展其自治自律的精神；但事实上则不然，因为中国的大学生，在中小学时代没有受过严格的规律训练，所以

良好习惯的基础尚未巩固，若全任其自动自律而不加以规律的训练，则容易酿成一种放荡不羁的现象。故大学的训导仍应兼重规律训练和自律训练两者的任务。换言之，大学训导的全部作用中，必须具备“绳之以法”和“导之以理”两种任务，并且两者时时刻刻地相互为用，相辅而成，然后才能收获训导的效果。否则，如果只用“导之以理”的作用，而无“绳之以法”的作用以济其穷，则往往使自由过甚而秩序荡然。在另一方面，如果只用“绳之以法”的作用，而无“导之以理”的作用以救其偏，则往往使行动呆板而生活单调。这样各走一端的方式，均非训导的真正之道。真正的训导之道，就是配合“导之以理”和“绳之以法”两类作用。但这里所说的“绳之以法”，不能以书云：“补作教刑”来作，譬如，更不能以满清私塾

的体罚之事实相提并论，而是说实施训导须有严密的纪律，务使训导的精神严肃，在严肃的精神中，配合着“导之以理”的作用，使其心顺意服而潜移默化，则严肃的精神才能永久保存。

关于校园军训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代西周官学，《礼记》《周礼》中均有对学生进行军训的记载，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只略谈民国军训。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在各省努力推行兵学家蒋百里的《军国民教育》，意为军事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1929年3月，参谋本部呈准公布《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其中第一、五条规定：“凡大学、高级中学及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并其他高中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其修习期间均定二年。”“军事教育之时间：一、每年度每星期实施三小时。二、每年度暑假期间连续实施三星期极严格之军事训练。”至1935年1月，为实现训练总监部军训计划，教育部发布通令：实施军训三个月，所有普通学科应一律提前结束，高中以上学生本年暑假仍照常举行暑假军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施学校集中军训。军训的内容，男生需要进行基



蒋百里所著《国防论》。

本军事技能和军事常识的训练，女生则进行医护培训。集训结束时，照例举行毕业典礼，有分列式、长官检阅等模式。

1929年3月，参谋本部还公布了《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官任用简章》，其中第一、二条规定：“凡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官，均由训练总监部审定资格，加以考试分别任用。”“军事教官考试之资格：一、正式陆军学校毕业，曾充营连排长一年以上，深明党义者。二、品行端正，确无嗜好者。三、身体强健，素无暗疾者。”考选军训教官，由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奉总监部之命进行，其初试课目计有：国文、典范令、史地、党义、口试、实兵指挥、体格检查等，将初试录取者，送请训练总监部社会教官复试

委员会复试，当然凡黄埔出身者优先录用。

1943年，四川大学《训导概况》记载：“训导处军事管理组人员简历：1. 军训主任教官陈曼青，36岁，四川庐县人，中央军校7期毕业；曾任排连营长，复旦大学教官，中央大学主任教官。2. 教官段同伦，30岁，四川武胜人，军校11期毕业；曾任北京大学、河南大学军训教官及中央军校特别班教官、代理科长等职。3. 教官张志一，29岁，河北天津人，中央军校毕业生；曾任区队长、队长、教官等职。4. 教官萧冠彭，32岁，江苏盐城人，军校高教班毕业；曾任排连营长、团附等职。5. 教官刘汉魂，31岁，四川安岳人，军校高教班毕业。曾任排连长、参谋、团附、副官、队长等职。

6. 教官王明智, 31岁, 四川峨眉人, 军校12期毕业; 曾任中央军校17期1总队副队长、军校教官。7. 助教叶乃成, 27岁, 四川成都人, 军校10期毕业; 曾任排连长、参谋等职。8. 助教梁凯风, 39岁, 四川夹江人, 成都分校1期毕业; 曾任排连营长、团附等职。”军训教官在校服务期间, 应遵守《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官服务条例》, 实行军事教官专为担任校中军事学术科之教授, 此外概不担任; 军事教官不得无故干预校务; 军事教官应将教练情形按月报告训练总监部以备查考。

民国军训进入校园, 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含义, 军训制度形同法律条文, 未受军事教练者不得毕业。1937年, 蒋百里所著《国防论》出版, 重叙《裁兵与国防》一文中提到: “是故欲立义务民兵之基础, 其在中国只须简章明瞭之两律: 其第一律曰, 自今以往, 凡师范中学校之学生, 非受过三年间共六个月(每年二个月)之军事教练者, 不得毕业。其第二律曰, 自今以往, 无专门学校以上毕业之文凭(已受过六个月军事教练者), 不得为常备役之官长。无论今日学校若何之不完备, 今日军队若何之不整顿, 能够将军队与学校之界限中, 沟通一条道路, 则民兵制之于将来自能逐

步发达。此二基础不立, 则虽有繁密之法律, 恐亦无所用之也。”1938年11月, 蒋百里竟病故于陆大任上。斯人已逝, 生者长思, 如何将其《国防论》扉页题词“万语千言, 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 中国是有办法的!”变成现实。

抗战初期, 前线作战部队连排长伤亡较多, 急需补充初级军官, 为此中央军校招考学生分甲乙丙三级。甲级生为已取得军训毕业证书者, 可免去入伍生教育6个月, 直受军官教育6个月, 考试合格即可毕业出校, 分发各部队担任排长, 率领士兵与日军作战。同时, 学校在精神教育中, 坚持训导与军训相结合, 以提高学生的国防意识和军事技能, 为国家储备军事人才, 争取抗战胜利。1944年秋, 国际反法西斯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国民政府为了在中国战区储备反攻力量,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由于军训制度的推动, 很快就组建了具有精良装备的中国青年远征军。随之, 最著名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也载入了抗战史册。

燕大逸事几则

(一)

1942年10月2日, 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开学。这天恰逢美

国总统特使威尔基来到成都, 向基督教五大学师生联席大会发表演讲。大会在华西大学足球场举行, 草坪上临时搭了一个木板讲台。燕大师生由陕西街校部整队出发, 前面校旗引导。当到达会场时, 友校师生掌声四起, 乃是表示欢迎燕大加入五校阵容的热情流露。讲台前五校列队完毕, 威尔基快步走向讲台, 他穿着咖啡色西服, 陪同他到场的有五大学各校长。成都燕大代理校长是梅贻宝博士(其兄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 他穿着深灰色中式布长衫, 被公推为这次威尔基讲演的翻译, 台下的燕大学子无不为此而感到自豪。威尔基讲演很有风趣, 梅校长的翻译也非常流利、通畅。威尔基讲演一开头就说: “今天, 我能向这么多的大学生讲话, 我感到很高兴, 尤其是由中国很有名的大学校长为我讲话作翻译, 我更感到非常荣幸。”当时会场出现了一个有趣情景, 每当威尔基讲过一段话, 总是有很多燕大的同学已作出了反应, 或发出笑声, 或纷纷鼓掌, 而其他各校同学还要等到听完梅校长的翻译之后才有反应。譬如他讲到如何抱起在幼儿园里的一个苏联小姑娘, 一面亲她, 一面和她说“我连你的话也不懂呢”, 就有不少燕大同学笑了, 而友校的同学等梅校长



/ 抗战时期成都学校之军训。

翻译后才笑，由此可见燕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很高。成都复校的燕大能以威氏演讲为第一课，亦是殊足纪念的趣事。

（二）

成都燕大教学有方，课程较严，因其传统，对英文要求尤高。华西坝五大学举行了一次英语演讲比赛，前三名中第一名、第三名来自燕京大学，第二名为齐鲁大学，足见凡在燕大受过几年英语训练的学生，英语水平要比成都其他学校的同学们略胜一筹。时成都附近修建机场，进驻一批美军，急需英语翻译，燕大积极响应，第一次就去了21人，当时全校男女同学不过300人，是个不小的比例，此举轰动了教育界。

之后，陆续有数十人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及空军军官学校与日作战。成都燕大学生钱季光回忆：

1943年春，我只身到重庆军委会报考译员，一位少将接待了我，并给我一张英语考卷。卷面大部试题还可对付，但有一段英文中有几处用了新型直升飞机一词，对这种飞机，我从未见过也没听说过，不知该如何翻译，偏偏又多处出现，勉为其难。答完交卷后，少将看了看卷子皱着眉头，叫我回去等候。一个多月以后，我初次穿上军装，登上军用飞机，去昆明炮校为美军顾问当实习译员。次年夏天，我被任命翻译队长，奉令同50名译员先去美国纽约，再转丹佛轰炸机机场，为中国空军培训人员当翻译。从此跟着他们东飞百里投个弹，西飞千里照张相。乘坐飞机型号不断更换，特别是B-25战斗轰炸机，震动最大，每次训练回到基地，浑身像散了架子似的，实在难受；但想到自己是在为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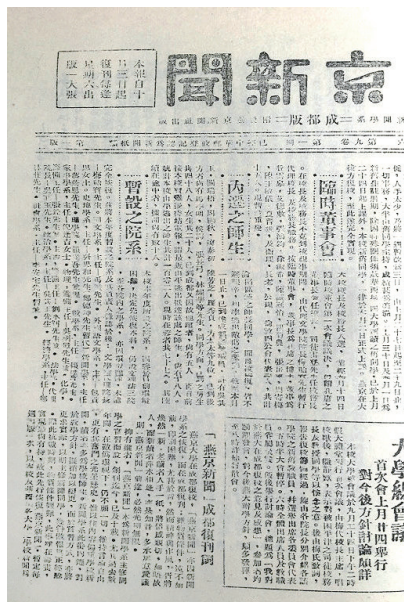
为打倒法西斯尽力，又觉得苦中有乐。世界二次大战突然结束，全球一片欢腾，我也复员考入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能成为美国大学的学生，有赖于在燕大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

（三）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校领导告诉大家，老校务长司徒雷登从北平日本监狱里出来了，要到成都来看望燕大同学。为了迎接他，特意在校门内立了一幅司徒雷登大画像，并告诉传达室的谢大爷一看见这个人来就敲铜脸盆。过了几天，谢大爷看见司徒雷登来了，就用一根棍子使劲敲打一只铜脸盆，并在院内不断高喊着：“老校务长回来了！老校务长回来了！”顿时全校沸腾，师生们涌向教学楼前，紧紧将老校务长围在中间，唱着早已准备好的一首歌：《司徒雷登博士，我们敬佩你》（Dr.



/ 成都燕大学生李肇基(又名万歌)等人译著《中国解放区印象记》。



/ 成都燕大校刊《燕京新闻》。



Stuart, Weadoretthe)。很多同学一面唱歌，一面凝视着老校务长，泪珠情不自禁地滚了下来。当时老校务长用汉语对师生们讲演，还不时引用中国典故，“之、乎、者、也”屡见叠出，让第一次见到他的同学感到很新鲜，没想到这个外国人的汉语说得这么好！

(四)

成都燕大学生李肇基(笔名万歌)，上海人，1943年以插班生资格进入新闻系，并在成都美国新闻处兼职。1945年冬天，李肇基弄来一本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 Forman)写的通讯集《来自中国的报告》(Report From Red China)，是如实报道解放区军民抗击日本侵略事迹的好书。他把这本精装书拆散，

约集了胡火、戴永福、张渠、丁露等8名同学，每人分担几章，齐头并进，很快译成中文，书名《中国解放区印象记》，由他联系北平认识出版社，于1946年4月出版。该书介绍了抗战时期延安、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和军民团结杀敌的英勇斗争，揭露了日寇的种种暴行，还有作者对国共重要军政人物的采访。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代序中说：“给当时研究中国革命的人们开拓了一个新纪元。”该书不仅是外国人眼中中国解放区的真实记录，也是抗日战争史重要的参考资料。1948年1月，李肇基赴美国进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当研究生，1951年学成回国，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遗憾的是他在参加万隆

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新闻系还有一个插班生叫严庆澍，江苏人，毕业后一直活跃在港台新闻界、文化界，用唐人的笔名以长篇巨著《金陵春梦》知名于世。

燕园对联趣闻

1943年12月8日是北平燕园遭劫两周年，也是燕大在蓉复校的一周年纪念日。燕大虽为教会学校，但严禁男女混杂，彼此都不得进入对方宿舍逗留，惟纪念日例外。这一天是校方规定的男女宿舍开放日，供来宾参观，少不了各室事先布置一番，并备茶点招待。女生宿舍在陕西街校本部的启华小学楼里，女同学两人一屋，兼之天性



/ 成都燕大女生在文庙合影。

爱美好洁，一间一间的小房，除了干净而幽美外，再加以精细的布置，真使男同学们见而羡慕。“禁宫开放了！”男同学们挤了进去，中间还有梅校长和教职员们。仿佛第一任务倒不在于参观，而是匆匆忙忙，钻来钻去，手脚不停在搜寻：哪里有糖果？哪里最丰盛？有的寝室摆着茶点在桌上，维持的时间最短；有的寝室虽然摆着茶点，却有人守着，要唱个歌才能吃。最高明的是买了精美丰盛的茶点却藏了起来，等大家抢过，有了秩序，然后再拿出来请客。混乱中，有人说她的洋囡囡不见了，有人在打听镜框的下落。宿舍开放的规模虽不及北平，但热闹则完全一样。最值得一提的是天灯巷新生宿舍，那些古老破旧的房子，被打扮得美丽堂皇，这里

表现了同学们的合作精神，大家看了赞声不绝，梅校长还说要奖励呢！

男生宿舍是在何公巷文庙，大门上书“圣域”两个字。往日神秘的文庙，一些好奇的女生禁不住要来一探究竟。男女同学平时互相爱慕者，也可借机从个人生活的角度，了解一下意中人的文化，大多用旁敲侧击法，事先探得其宿舍室号床位，以便届时观摩一番，然后予以评价。当然，这天许多男生都会赶紧打扫宿舍，突击整治脏、乱、差，以迎接心中女神的光临。

女同学一进门，就不知不觉地被红纸标语引导到第6宿舍去了。男生宿舍共计10间，每间住20来位同学。第6宿舍在进门的首间，去年曾拿清洁

锦标，今年仍不示弱，前一天即大加布置，气象一新。他们的茶点，是花了本钱的，精致而丰盛。伴随着留声机的音乐，来宾都挥笔签名，一边吃茶点，一边赞美着，然后缓缓离去。至于其他的寝室，亦各有特点，有的略加收拾，有的仍英雄本色。某室同学爱文学，与一女学友投契，但女方有洁癖，不料这位同学被检出铺盖夹层有臭袜多双未洗，次日二人感情告吹，以致投契不投缘，一切成追忆。

男生宿舍门外多半都贴上一副红纸对联，表明他们的风格。有的写道：“大丈夫应小节不拘，何必铺床叠被；独身汉叹内助无人，谁为收拾衣裳。”横额为“鰥庐”。有的是：“一群单身小伙，全体半文不名。”横批：“又穷又脏。”还有的挥洒写道：“养天地正气，爱绝世佳人。”横联是：“征求内助。”某室全是懒而不好整洁之青年才俊，是日床被仍旧零乱未叠，仍有对联曰：“铺床叠被乏人，寻芳问柳有意。”主其事之室长，灵机一动，干脆把门窗一关，房门一锁了之。门前置一小桌，陈设纸笔，桌前垂一醒目红纸条，上书：“应征留名。”有女同学在其上留言云：“室长有便，请到训导处茶叙。”参观者一一浏览，师生共雅，为之莞尔。 



1926年3月25日， 陈铭枢、白崇禧作为广州国民政府 代表抵达长沙，与唐生智举行会谈

□ 贾晓明

1926年3月25日，陈铭枢、白崇禧作为广州国民政府代表抵达长沙，与唐生智举行会谈，坚定了唐生智彻底归附国民政府的信心。鉴于此次会谈对于推动国民革命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参加会谈的陈铭枢、唐生智和白崇禧均对黄埔军校的发展做出过特殊贡献（如陈铭枢曾任南京中央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唐生智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校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开办黄埔军校湖南长沙分校；抗日战争时期，白崇禧曾在桂林黄埔军校第六分校内设回民大队），特在此将本次会谈的背景和内容做一梳理。

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消灭了广东内部的反革命军阀势力，统一了军权财权。3月，两广统一完成，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新桂系统治下的广西，正式成为了广州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辖区。国民政府重新组建国民革命军，并在国民革命军中先后推行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政治部，大大地提高了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广西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由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两广的军政统一，进一步增强了革命阵营的力量，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客观上彻底解除了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后顾之忧，也对其他地区的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两广军政统一逐渐完成之时，全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北方的国民军在冯玉祥的率领下，其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25年年底，国民军势力不但控制了京、

津地区，夺取了河北、热河，且直逼山东，而北洋军阀因为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而日趋衰弱。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日益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为防止中国全面“赤化”，帝国主义开始积极策动张作霖与吴佩孚的联合，妄想“先扑灭北方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期实行全国之刷新”。为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吴佩孚、张作霖两大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迅速化敌为友，结成一个“讨赤”大同盟。蒋介石据此判断，“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无疑”，“是故北伐出师，必须在未达上述所料状态之前”，“见诸实行”。

吴佩孚、张作霖虽然表面联合，由于其内部矛盾重重，从一开始便明争暗斗，即使在直系军阀内部，如吴佩孚与孙传芳之间，也因联奉、反奉问题貌合神离。受其影响，其他一些地方势力内部，如湖南省长赵恒惕及其部将唐生智的对立也日益显著。赵恒惕名义上附北，受正驻节武汉的吴佩孚的节制，但他一再提倡“联省自治”，南抗北拒（1922年孙中山自广东北伐时，曾借道湖南，因赵恒惕的反对只得改道江西），引起吴佩孚的不满。

赵恒惕之下，有湖南省防军4个师，唐生智任第4师师长，并兼任“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由于唐生智控制湘南富庶的水口山铅锌矿，经济实力雄厚，唐生智的第4师也成为湖南省防军中训练和配备最精良、人数最多的一师。唐生智在湘南期间，实行开明统治，对广州国民政府及共产党、国民党人采取友善合作的态度，对农工运动也表示

支持。早在1922年11月27日，水口山矿3000多工人在蒋先云等领导下举行罢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为镇压工人运动，赵恒惕曾决定“以武力整饬水口山”。然而唐生智接任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后，却接受了工人所提要求，派与共产党有联系的邓寿荃担任局长。唐生智屯兵湘南，采取亲粤政策，客观上为广州国民政府取得了北邻平静与安全的保证，为东征、平叛以及统一两广做出了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应孙中山邀请参加改组国民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夏曦、刘少奇受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委托，回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推进湖南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中共湘区委曾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名义，与唐生智联络，唐生智大体接受赞同，并送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两千元作为活动经费。黄埔军校成立后，唐生智还特地保送一批学员（包括其四弟唐生明）前往广东，入黄埔军校深造。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把唐生智看作倾向革命的力量，苏联顾问鲍罗廷甚至说：“在湘南驻扎着一支友好、颇有实力的部队——唐生智的第4师；如果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派到那里去做宣传工作，那么湘南是很容易夺到手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吴佩孚退驻湖北后，为图再起，积极插手湘局，企图暗中扶植唐生智势力，接济枪械，对省长赵恒惕进行牵制。但吴佩孚也担心唐生智坐大，就示意赵恒惕扼制唐生智，准备乘双方内讧之际，乘机吞并湖南。而赵恒惕也难容唐生智的长期独立存在。在得到唐生智接近广州国民政府，联络共产党、国民党的情报后，随即大举“裁兵理财”：提出裁兵原则为“一人一枪”，并派唐生智兼任点验枪支委员会委员长，让唐生智“领头率先执行此一人一枪的决定”；还准备收回水口山矿务，借此把多年来不能统一的财权收揽在自己手里。赵恒惕的这些举动更加深了唐生智与他的矛盾。

唐生智开始策划取代赵恒惕，并向两广争取支持。但由于他与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谭延闿、第6军军长程潜结怨在先，不好直接与广东方面联系，于是先与广西方面接近。1925年12月，唐生智致电黄绍竑，表示愿服从三民主义。1926年1月，经黄绍竑以中间人身份从中撮合，唐生智派其心腹幕僚刘文岛为代表赴广州，与国民政府联络合作事宜。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促使唐生智进一步明确归附国民政府，决定加紧工作。而此时，赵恒惕也派其旅长叶琪为代表到广西活动，劝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与他一起搞“联省自治”。叶琪与黄绍竑、白崇禧及广西许多高级将领都有同学之谊，在湘军刘钊第2师任旅长。叶琪到来后，转达赵恒惕的“合作”条件，并提出湖南可帮助广西夺取广东，如广西不同意，至少在广东和湖南发生战争时，采取中立态度。广西方面一面将叶琪的来意详细密告国民政府，一面开动报馆、通讯社等舆论机器，大力宣传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说叶琪这次回广西，是来商讨湘、粤、桂合作问题的，以此恶化唐生智与赵恒惕、吴佩孚之间的关系，弄得叶琪有口难辩。1926年1月，当汪精卫、谭延闿等国民政府要人为实现两广统一来到广西访问时，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更特意把正在广西的叶琪也拉到梧州与汪精卫、谭延闿等见面；不久，白崇禧前往广州商讨两广统一的具体事宜，又拉叶琪一起去了广州，对外仍宣传叶琪是湖南唐生智的代表。叶琪在广州受到极盛大的欢迎。此消息一经透露，长沙“便满城风雨地传说湖南政局将有变动”。

在此期间，在国民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湖南人民掀起了反帝讨吴驱赵运动。1926年3月2日，湖南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9日，按照中共湖南区委的部署，国民党省党部在长沙召开市民大会，通过打倒赵恒惕、启封被赵恒惕封闭的革命团体等主张，成立湖南人民临时政府委员会，领导反帝讨

吴驱赵斗争，并要求唐生智配合行动。唐生智审时度势，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一面调动部队配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大会，令所部向长沙逼进，一面派人向两广转达其输诚革命之意，以为后援。李宗仁接到唐生智的电报后，表示愿意出兵支援。同时，李宗仁也发电给广州国民政府，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表示：由于湖南挂上了一块阻南拒北的“自治”招牌，多年来一直是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重大阻力。而近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在北方受挫，元气尚未恢复，是北洋军阀中比较脆弱的一环，且当时吴佩孚致力于“讨赤”大战，其精锐部队已开赴华北对抗国民军，湖北空虚，如联合唐生智为前驱乘机北伐，可以一鼓而下武汉，继而席卷长江，问鼎全国。他的建议得到国民政府的赞同。

3月11日，赵恒惕见大势已去，遂宣布下野，并接受叶琪的建议，任命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行省长职权。3月16日，唐生智进入长沙。值此前后，帝国主义为支持“讨赤”大同盟进攻国民军，公然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挑起“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对要求“巩固大沽国防”“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请愿群众开枪，酿成“三一八”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长沙群众连日举行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暴行。

3月25日凌晨3时，唐生智在保定军校时的同期同学、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师长陈铭枢和新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参谋长白崇禧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奉命抵达长沙，受到热烈欢迎。

到达当日，陈铭枢、白崇禧不及休息，就立即和唐生智进行会谈，催促唐生智公开表示归附国民政府。为坚定唐生智的决心，陈铭枢和白崇禧代表国民政府向唐生智保证，如果唐生智坚决归附国民政府，湖南之军政完全由唐负责，如吴佩孚率兵南下，国民政府将出兵帮助唐生智，并保证曾和唐生智有矛盾的国民革命军2、6两军不会进入湖南。白崇禧甚至还单独向唐生智保证：国民革命军2、6两

军如有不利于唐生智的行动，广西的第7军将出兵帮助唐生智。

有了国民政府的明确支持，唐生智即于25日当天宣布接任代理省长（后又接受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委任），还给国民政府发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愿竭诚拥护，奉行国民党党纲；决定与国民政府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北方军阀。约在此时，吴佩孚也派人来到长沙，威胁唐生智接受他的命令宣布“讨赤”，或率部回驻湘南，恢复赵恒惕离湘以前的状态。唐生智回答说：“吴子玉不要小视湖南，他有陆军海军，可以分为三路五路进攻长沙，我却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直取武汉！”

湖南政局变化后，长沙国共两党的机构已由秘密转为公开，湖南人民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此后，陈铭枢、白崇禧在长沙接连出席群众集会，鼓动革命情绪，甚至带头公开喊出了“支持国民革命”“打倒吴佩孚”等口号。陈铭枢、白崇禧还向长沙民众表示：“我等到了长沙，即如国民政府实力到了长沙，就是湖南民众之革命运动成熟的时机。但现在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互相勾结，宰杀民众，我等主义是求革命。革命工作以民众为基础。希望本日到会诸先生、各组织、各团体，齐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一致努力革命工作，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如果湘政府与吴佩孚联合来打我们，我们是欢迎的。因我们之来，绝不是一种妥协的，是为革命的。”4月3日上午，陈铭枢和白崇禧离湘返粤，唐生智及湖南各界四五千人到车站欢送。欢送会主席夏曦在致辞时吁请国民政府“速即出兵到湘北伐”。4月15日，陈铭枢和白崇禧到达韶关，因土匪破坏铁路，行程受阻。他们急于向国民政府汇报，不得已，请第2军派兵护卫，绕道南下，于19日夜间到达广州，第二天一早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赴湘接洽情况。当天，蒋介石（已于16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故没有出席会议，陈铭枢和白崇禧于22日又赶到黄埔军校，向蒋介石进行汇报。

海内外公开发行 综合性双月刊

2021 年《黄埔》杂志征订启事

《黄埔》杂志自 1988 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统一尽力”的办刊宗旨，把为海内外黄埔同学提供一份不可替代的精神食粮作为办刊人不懈的追求。2021 年，《黄埔》杂志将在内容与形式上继续创新，以更鲜明的主题和丰富的内容满足读者需求。

《黄埔》杂志 2021 年征订工作继续进行。

全年 6 册，定价（人民币）：中国大陆 /150 元（单册 25 元）；台湾、香港、澳门 /300 元（含邮资）；国外 500 元（航空）。

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 20 号

邮政编码：100075

收款人：《黄埔》杂志社

银行汇款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铁匠营支行

开户户名：《黄埔》杂志社

帐号：0200000409200014061

为避免差错，望订户在汇款时注意：

一、**订户姓名、联系电话、详细地址、邮编**，书写工整，字迹清楚。

二、在汇款单上必须注上“订 2021 年杂志”字样。

三、由经办人（汇款人）代多人征订并需要本社直接寄给订户时，请在汇款时另函告订户姓名、详细通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四、**个人订户最好邮局汇款，并写清姓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邮编。**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电话：010-58336326 传真：010-58336326 联系人：常红

订户报销凭证

收款单位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 20 号		邮编	100075
订户单位或姓名							
订数	全年人民币 150 元		每册单价 25.00 元				
金额	人民币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汇款方式	银行		邮局				

说明：此凭证必须与汇款凭证合并，金额相符方能作为报销凭证，否则无效。